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 BIBLIOTHEQUE F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Michel Foucaul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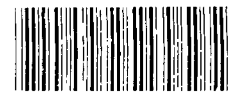
米歇尔·福柯著

知识考古学

谢强 马月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BIBLIOTHEQUE DE FRANCE



527080

法 · 国 · · · 丛 · 书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知识考古学

米歇尔 · 福柯著

谢 强 马 月译 顾嘉琛校

Michel Foucault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考古学/(法)福柯著;谢强,马月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6 (1999.3重印)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ISBN 7－108－01170－0

Ⅰ.知… Ⅱ.①福… ②谢… ③马… Ⅲ.知识学:考古学 Ⅳ.G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05709号

丛 书 名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书　　名 知识考古学
作　　者 [法]米歇尔·福柯
译　　者 谢　强　马　月
校　　对 顾嘉琛
丛书主编 王东亮　杜小真　罗芃　孟华(以姓氏笔划排列)
责任编辑 倪　乐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1998年6月北京第1版
1999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 8.625
字　　数 157千字
印　　数 08,001－15,000册
定　　价 12.80元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总序

法兰西使人发现她是这样一个民族，人们可以凭藉精神与情感——犹如凭藉种族——归属于她。

勒维纳斯《困难的自由》

法兰西之独特魅力源于她的灿烂文化。当今西方文化学术领域诸多重要思潮及流派均可溯源于法兰西。故欲了解西方文化、促进中西文化沟通，不可不对法兰西文化作深入、中肯的研究。然而，当代法国诸多文化学术重要作品于国内介绍甚少，更因所译作品多系英、德文转译，有碍读者对原作之正确理解与认识，甚而造成某些理论不实与失误。故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法语学术著作的译介，确是当务之急。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组织翻译了《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意在向广大读者译介法兰西文化学术精品，促使法兰西文化学术译著规模化、系统化。丛书所选，以当代法国名家名著为主，从文化角度收入当代法国哲学、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历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等领域的优秀代表之作，分五个系

列编辑。企盼《丛书》能够成为既具学术品味又具普及性的书库，有助读者凭藉精神与情感感受法兰西文化，实现中法文化学术之真实、深入而持久的交流与对话。是所望焉。谨为序。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

目录

第一章
引　　言

迄今，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们对长时段予以了更多的关注，犹如他们从政治事件的变幻不定中和有关它们的插曲的背后揭示出一些稳固的难以打破的平衡状态、不可逆过程、不间断调节、一些持续了数百年后仍呈现起伏不定趋势的现象、积累的演变和缓慢的饱和以及一些因传统叙述的混乱而被掩盖在无数事件之下的静止和沉默的巨大基底。为了进行这样的分析，历史学家们拥有两种手段：一种是改造过的，另一种是传统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商品流通的定量分析、人口发展和减退的剖析、气象及气候变化的研究、社会学常数的测定、技术调整及其传播和保持的描述等。这些方法使历史学家们能够在历史范畴中辨别各种不同的沉积层。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从政治的多变性到“物质文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变得多种多样：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

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透过这部动荡的由各届政府、无数次战争和饥饿写成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缓坡历史,诸如航道史、麦子或金矿史、旱灾和灌溉史、轮作史、人类的饥荒与繁育的平衡史。那些传统分析老生常谈的问题(在不相称的事件之间应建立什么样的联系?怎样在它们之间建立必然的关联?什么是贯穿这些事件的连续性或者什么是它们最终形成的整体意义?能否确定某种整体性或者只局限于重建某些连贯?)如今已经被另一类型的问题所替代,应当将什么样的层次相互区分开来?应该建立何种类型的体系?对这些体系中的每一个体系应采用什么样的历史分期标准?什么样的关系系统(等级、支配、重叠、单一决定、互为因果)是可以描述的?能建立什么样的体系中的体系?应在多长的时间范围内确定事件的各自不同的发展?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那些被称为观念史、科学史、哲学史、思想史、还有文学史(它们的特殊性可暂时不管)的学科,不管它们叫什么名称,它们中大部分已有悖于历史学家的研究和方法。在这些学科中,人们的注意力却已从原来描绘成“时代”或者“世纪”的广阔单位转向断裂现象。今天,人们正力图在人类思想长期的连续性中,在某一精神或某一集体心理充分的和同质的体现中,在某一竭力使自己存在下来、并且在一开始即至善至美的科学的顽强应变中,在某种类型、某种形式、某项学科、某项理论活动的持久性中,探测中断的偶然性。这些中断的地

位和性质多种多样。巴什拉[1] 曾这样描述过“认识论的条条框框与界线”：它们推迟了各种认识的不确定并合，打破了这些认识的缓慢的成熟过程，迫使它们进入一个崭新的时空，把这些认识从它们的经验论的根源和它们原始的动机中截取下来，把它们从它们的虚构同谋关系中澄清出来，因而它们在历史分析中就不再意味着追寻静默的起始，无限地上溯最早的征兆，而是意味着测定合理性的新形式以及它的各种不同的效果。冈奎莱姆对概念的位移和转换的分析可以成为分析的模式，他的分析说明，某种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这个概念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这个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使用规律的历史。冈奎莱姆[2] 还对科学史的微观范畴和宏观范畴作了区分。在上述两个范畴中，事件及其后果不是按照同一方式安排的：因此，一个发现、一种方法的制订，乃至一位学者的研究和失败并不具有同样的偶然性，而且也不可能在它们各自的层次上被用同一种方式描述出来，因为它们无论在哪一点上，被讲述的并不是同样的故事。只有像历史这样的科学，才具有循环往复的再分配。随着历史的

---

① 巴什拉(1884—1962年)，法国哲学家。

② 冈奎莱姆(1904—1995年)，法国哲学家，科学家。本书除注明外，均为译者注。

出场而变化，这种再分配呈现多种过去、多种连贯形式、多种重要性、多种确定的网络以及多种目的论：以至历史的描述必然使自己服从于知识的现实性，随着知识的变化而丰富起来并且不断地同自身决裂。〔塞尔（Serres）在数学领域中刚刚提出了这种现象的理论。〕正像盖罗特（Guéroult）对系统的构造单位所分析的那样：把影响、传统、文化连续性作为描述的单位是不妥当的，而内部一致性的、合理性的、演绎链和并存性的描述才是合理的单位。总之，最彻底的断裂，毋庸置疑，是那些由理论转换的研究实现的割裂，即在这种理论转换的研究"使科学脱离它过去的意识形态并用这种把过去作为意识形态来表现的方法建立某种科学"[①]之时。除此之外，当然还应该补充一点：今后，文学分析不是将某一时代的精神或感觉作为单位，也不是"团体"、"流派"、"世代"或者"运动"，甚至不是在将作者的生活和他的"创作"结合起来的交换手法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作为单位，而是将一部作品、一本书、一篇文章的结构作为单位。

因此，如此历史分析将要面临的——正面临的——重要问题也就不再是弄清连续性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建立起来的；某种惟一的，同样的意图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维持并对众多的不同的和连续的思想构成一种独一无二前景；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和什么样的支点包含着转让、回

---

① L·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68页。——作者注

收、遗忘和重复的游戏;起源是怎样在其自身之外扩大其统治并且达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完美的。这不再是传统和印迹的问题,而是分割和限界的问题;不再是基础遭到破坏的问题,而是导致基础的创造和更新的转换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大堆展开的问题,其中有些是我们所熟知的,而历史的这种新形式正是要试图通过这些问题制订它自己的理论:如何阐述那些使人联想到不连续性的各种不同的概念(界限、决裂、分割、变化、转换)?以什么样的标准区分这些我们涉及的单位: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作品?什么是理论?什么是概念?什么是本文?怎样使我们可以涉身的层次多样化?这些层次中的每一个都具有自己的断裂和自己的分析形式:什么是形式化的合理的层次?什么是解释的层次?什么是结构分析的层次?什么是因果性的确定层次?

总而言之,思想、知识、哲学、文学的历史似乎是在增加断裂,并且寻找不连续性的所有现象,而纯粹意义上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却似乎是在借助于自身的无不稳定性的结构,消除事件的介入。

* * *

但愿这种交错倒置不至引起错觉。我们不能只凭表面现象就想像一些历史学科是从连续过渡到不连续,而另一些则是从不连续的密集变为不间断的一致性的一统天下;不能以为在政治、制度或者经济的分析中,人们对

整体的确定越来越敏感，而在思想和知识的分析中，却越来越关注差异问题；不能认为这两种重要的描述形式相互交叉起来却又互不相识。

其实，这些与前面提到的问题是同一性质的，只是在表面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对文献资料提出质疑。请别误解：显而易见，自从历史这样的学科诞生以来，人们就开始使用文献了。人们查询文献资料，也依据它们自问，人们不仅想了解它们所要叙述的事情，也想了解它们讲述的事情是否真实，了解它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说，了解这些文献是说真话还是打诳语，是材料丰富，还是毫无价值；是确凿无误，还是已被篡改。然而，上述这些问题中的每个问题，以及这种对考证强烈的批判性的担忧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在这些文献所叙述的事情的基础上——有时是只言片语——重建这曾经是文献的来源，而今天却远远地消失在文献背后的过去。文献过去一直被看作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的印迹虽已微乎其微，但还是有幸可以辨认出来的。然而，历史通过某种并非始于今日，但显然尚未完成的变化改变了它相对于文献的位置。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体系、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因此，对历史说来，文献不再是这样一种无生气的材料，即：历

史试图通过它重建前人的所作所言，重建过去所发生而如今仅留下印迹的事情；历史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体系和某些关联。应当使历史脱离它那种长期自鸣得意的形象，历史正以此证明自己是一门人类学：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历史乃是对文献的物质性的研究和使用（书籍、本文、叙述、记载、条例、建筑、机构、规则、技术、物品、习俗等等），这种物质性无时无地不在整个社会中以某些自发的形式或是由记忆暂留构成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自身也许享有充分记忆优势的历史来说，文献不是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就一个社会而言，历史是一种赋予它与之不能分离的众多的文献以某种地位并对它们进行制订的方法。

简而言之，就其传统形式而言，历史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变为文献，并使这些印迹说话，而这些印迹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东西的，或者它们无声地讲述着与它们所讲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今天，历史则将文献转变成重大遗迹，并且在那些人们曾辨别前人遗留的印迹的地方，在人们曾试图辨认这些印迹是什么样的地方，历史便展示出大量的素材以供人们区分、组合、寻找合理性、建立联系，构成整体。曾经有段时期，考古学作为一门探究无声的古迹、无生气的遗迹、无前后关联的物品和过去遗留事物的学科，与历史十分

相似，它只有重建某一历史话语才具有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不妨作一个文字游戏，历史而今却与考古学十分相似——它对历史重大遗迹作本质的描述。

由此产生了一些后果。首先是我们已经指出过的表层效果：在观念史中的断裂的增加和在确切意义上所说的历史中出现的长时段。事实上，后者就其传统形式而言，旨在确定事实之间或者过去的事件之间的关系（简单因果关系、循环确定关系、对立关系、表达关系）：体系已经建立，就得确定各个因素之间的邻界。今后，问题的所在是建立体系：确定每一体系的各自的成分，规定它的界线，揭示它特有的关系类型，找出它的规律，并且更多的是描述不同体系之间的关系，以便建立体系中的体系或是某些"范围"：由此产生了层次的增加、层次的脱节、时间的特殊性和这些层次特有年代的特殊性；由此产生了不仅要区分重要事件（及其一连串后果）和那些无足轻重事件的必要性，而且要区分属于截然不同的层次的事件类型的必要性（哪些是瞬间的，哪些是中等时间的，例如技术传播或货币减少；哪些是属于慢节奏的，如人口的平衡，或者逐步调整经济以适应气候变化）；由此产生了使罕见的或者重复事件构成的粗测系统出现的可能性。当代历史中长时段的出现不意味着向历史哲学、世界的洪荒时代或者向由各种文明的命运所规定的那些阶段的返归，它的出现是在方法论上慎重制订体系的结果。不过，在观念史、思想史和科学史中，同样的变化却引起了相反

的结果:这种变化分解了由意识的进步,或者理性的目的论,或者人类思想的渐进所构成的漫长的体系,它对聚合和完成的主题提出了疑问,并对整体化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这种变化还导致了对不同的体系的个体化,这些体系或并列,或前后相连,或交替,或相互交错,而不可能把它们简化为线型模式。这样,在这部理性的连续的编年史,这部人们一直追根溯源直至开天辟地的编年学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些有时是短暂的,互不相同的,背离独一无二的规律的阶段,它们经常负载着各自特有的历史类型并且是某种正在获得、进化和回忆的意识的普遍模式所不可缩减的。

第二个后果是:不连续性的概念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就古典形式的历史而言,不连续既是已知的,又是不可想像的:那些以分散的事件形式呈现出来的东西——决策、偶然事件、创举、发明——和那些通过分析,为了使事件的连续性显现出来而可能被回避、被抑制、被消除的东西。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它在历史分析中身兼三种职能:首先它构成历史学家有意识的行为(而不是历史学家勉强从他所要研究的材料中接受的东西),因为历史学家应该,至少是作为一种系统的假设,区分分析的可能的层次,适用于每一层次的方法,以及适合所有层次的历史分期。不连续性还是历史学家描述的结果(而不是历史学

家的分析要删除的东西),因为历史学家要发现的东西正是某一过程的界限,某条曲线的转折点,某种调节运动的倒置,某一摆动的界限,某项功能的极限,某一循环因果性不规则的瞬间。不连续性最后是研究工作不断进行阐明的概念(而不是在两个肯定形态之间把它当作一致的无差别的空白而被忽略)。根据人们对它指定的范围和层次,不连续性具有特殊的形式和功能:因为当我们在描述认识论的界限、人口曲线的逆转,或者一种技术替代另一种技术时,我们所言及的不是同样的不连续性。不连续性的概念是一个悖论的概念:因为它既是研究的工具,又是研究的对象,它确定自己成为其结果的领域。因为它可以使各种领域个体化,而人们却只能在它们的对比中建立这种不连续性。总之,因为它可能不仅是出现在历史学家话语中的概念,而是历史学家们私下假设的概念。事实上,断裂作为对象向历史学家提供的历史——亦即它自身的历史——如果不以这种断裂为起点,历史学家还能从什么地方开始呢?这种不连续的位移无疑是新历史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从障碍到实践中;介入到历史学家的话语中,它在这一话语中不再充当应该抑制的外界必然性的角色,而是起着人们使用的行动概念的作用;并且借助于由此产生的符号的倒置,它不再是阅读历史作品中的消极面(历史的反面、它的失败、它的能力的局限),而是成为积极因素。这个积极因素决定着自己的对象,并使得对它的分析更为有效。

第三个后果是:全面历史的主题和可能性开始消失,而一种与前者截然不同的,我们或许可以称为总体历史的东西已初步形成。全面历史旨在重建某一文明的整体形式,某一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原则,某一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的规律——人们常比喻作某一时代的"面貌"。这样的计划与下面的两个或三个假设密切相关,假设在某一特别限定的时空层的全部事件之间,在人们重新发现其印迹的各种现象之间人们可能建立某种同质的关系系统:因果关系网络,——它可以将这些现象中的任何一种现象派生出来,类比关联,——它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如何互为象征的,或者它们是如何一致地表现出同一中心核的。其次,假设历史性惟一的同一形式包含经济结构、社会稳定性、心理情性、技术习惯、政治行为,并把它们全部置于同一类型的转换中。最后,假设历史本身可以被一些大单位连接起来——阶段或时期,——这些大单位在自身把握着它们的内聚力的原则。这些假设正是新历史在判断系统、分割、界限、差异、差距、年代的特殊性、记忆暂留的特殊形式、关系的可能的类型时所提出疑问之处。但是这并不是历史力图获得各种并行的和相互独立的历史的多样性,如:经济史的多样性与制度史的多样性相比,制度史的多样性与科学史的、宗教史的或者文学史的多样性相比。这也不是历史仅仅力图在这些不同的历史中,指出某些日期的巧合,或者某些形式和意义的类似。因此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这个问题决定总体历史的任务,——是确定什么样的关系形式可以在这些不同的体系之间得到合乎情理的描述;这些体系能形成什么样的垂直系统;这些体系之间的关联和支配关系是怎样的;差距,不同的时间性和多种记忆暂留可能产生什么后果;在哪些不同的整体中,一些成分会同时出现。简言之,不仅要确定什么样的体系,还要确定什么样的"体系中的体系",——或者说,什么样的"范围"[①]有可能被建立起来。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相反地,总体历史展开的却是某一扩散的空间。

最后谈谈第四个后果:新历史面临着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其中,无疑有一些在新历史出现的很早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如今这一类问题却成为新历史的标志。我们可以举出其中的几例:文献的一致和同质的资料体的构成(开放的或封闭的,有限的或无限的资料体);选择原则的建立(根据人们需要彻底研究的大量文献,依据统计学取样的方法进行选材或者试图提前确定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成分等要求);对分析层次和适合分析层次的成分的确定(在被研究的材料中,人们可以提出数字的指标;某些

---

① 是否应该对最后的闲逛者强调:一个"范围"(无疑是在这个词的所有意义上讲),形式上就是一种"体系中的体系"?无论如何,这全然不是人们为消除孩子们的失望而置于幻灯前的一幅小的固定图画,而在孩子们的年龄,他们当然更喜欢电影的生动。——作者注

有关事件、机构、实践的——清晰的或暗含的——参照；被使用的词及其使用规则和这词的语义场，或者还有句子的形式结构和连接它们的连贯类型)；对某种分析方法的说明(对材料作数量处理，根据某些可确定特征进行分解，人们正在研究这些特征的关联关系，解释性剖析，对重复性和分配的分析)；对于那些联结研究材料的整体和子整体的确定(区域、时期、单一过程)；对于那些可以标志某一整体的关系的确定(它们可以是数字的、逻辑的关系，也可以是功能的、因果的、类比的关系，还可以是从能指到所指的关系)。

所有这些问题在今天都是属于历史方法论范畴。这个范畴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人们看到它在何种程度上摆脱了前不久构成历史哲学的东西，和历史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如：关于变化的合理性和目的论，关于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关于在过去的情形中和在现在的未完成的整体性中发现和构造某种意义的可能性)。其次因为它在它的某些点上重新分割已在其他领域发现的问题——如在语言学、人种学、经济学、文学分析、神话等领域中。如果愿意的话，人们完全可以赋予这些问题以结构主义这个缩略词。然而这受多种条件限制：这些问题本身还远远不能包括整个历史方法论的范畴，它们只占据这个范畴中的一部分，而它们的重要性随着分析的范围和层次而变化；除去在一些相对局限的情况中，它们并不是从语言学或人种学引入的(根据今天通

常的说法），而是产生于历史自身范畴中，——主要产生于经济史的范畴，有时产生于经济史所提出的问题。最后，它们绝对不允许谈论历史的结构化或者谈论一种要清除结构和变化之间的"冲突"或者"对立"的企图：因为很久以来，历史学家们就在测定、描述和分析结构了，而他们却从来不觉得有必要自问是否他们已经把活生生的、脆弱的、颤抖的"历史"漏过去了。将结构同变化对立起来既不适合于历史范畴的确定，无疑也不适合于结构方法的确定。

* * *

今天，历史的这一认识论的变化仍未完成。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因为我们肯定会把它的最初阶段上溯到马克思。然而，它的收效却姗姗来迟。即便是在今天，而且特别对思想史来说，这一变化仍未被予以关注和思考，而其他一些较晚出现的转变却受到青睐，——例如语言学的转变。犹似在这部人们以自己的观念和知识编写的历史中极难提出一个关于不连续性、体系、界限、单位、特殊秩序、自律性和各不同的从属性的一般理论。好像在人们对溯本求源，无限追寻先源线，恢复传统，追踪发展曲线，设想各种目的论和不断借用生命的隐喻等做法习以为常之外，对于思考差异，描写偏差和扩散，分解令人满意的同一性的形式深恶痛绝。或者更准确地说，就像人们将界限、变化、独立系统、限定体系——这些历史学家们经

常使用的概念——变成理论,从中找出一般后果,乃至派生出可能的蕴涵,有着难言之隐。就好像我们害怕在我们自己的思想时代中思考他人。

对此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如果说思想史能作为不间断的连续性的场所的话,如果它不断地把任何分析不用抽象的方法就无法拆散的连贯结合起来的话,如果说环绕着人类所说的和所做的它归纳出一些晦涩难懂的综合——而这些综合又超前于人类的所说和所做——为它做好准备,并将它无限地引向它的未来的话,——那么思想史对意识的主宰来说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庇护所。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主体保证把历史遗漏掉的一切归还给历史;坚信如果不把时间重建在一个重新构成的单位中,时间将不会扩散任何东西;并许下诺言,主体终有一天——以历史意识的形式—将所有那些被差异遥控的东西重新收归己有,恢复对它们的支配,并在它们中找到我们可以称为主体意识的场所的东西。将历史分析变成连续的话语,把人类的意识变成每一个变化和每一种实践的原主体,这是同一思想系统的两个方面。时间在这个系统中被设想为整体化的术语,而革命在这里从来就是意味着觉醒。

19 世纪以来,这个主题,尽管形式不同,却起着一个恒定不变的作用:反对一切偏移,拯救主体的主宰,挽救人类学与人文主义这对孪生学科的形象。这个主题反对由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所作

出的历史分析——造成的偏移，19 世纪末叶，这个主题导致了对全面历史的研究，在这样的全面历史中，一个社会的全部差异都可以被归结于单一的形式、某种世界观的结构、某一价值系统的建立、和某种文明的一致的类型。这个主题以起源基础的研究来反对由尼采的系谱学造成的偏移，这种研究把合理性变成人类的目的（télos），并把整个思想史同维护这种合理性联接起来，同维持这种目的论以及必须始终回到起源的基础联系起来。最后，近时期，当就主体的欲望的规律、语言形式、行动规则、或者神秘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话语的手法而言，精神分析、语言学、人种学偏移了主体时，当人被询问自己是什么时，不能对自身的性欲和自身的无意识、自己语言的系统的形式或者自己想像的规律性进行阐述成为清楚无疑的事实时，历史连续性的主题又被旧话重提：一部历史不可能是断裂，而是变化；不可能是关系的游戏，而是内部的动力；不可能是系统，而是自由的艰苦劳作；不可能是形式，而是某种意识不懈的努力，这种意识正在恢复清醒，并试图在自身环境的最深处振作起来，因为历史可能既是一种长期的不间断的耐心，又是最终要冲破所有界限的一种敏捷运动。为了发挥这一把历史生动的开放同结构的“静止”状态，“封闭”系统，必然的“共时性”对立起来的主题，很显然，应该首先在历史分析本身中否定对不连续性的概念的使用，对层次和界限的确定，对特殊体系的描述，对差异游戏的揭示等做法。因此，人们只好把马

克思的学说人本化，把马克思变成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学家，并在他的论述中重新找出人文主义的言论。因此，人们用超验哲学的术语解释尼采，并在起源研究方面抑制他的谱系学。因此，人们最终把新历史今天提出的整个方法论的问题的范畴弃置一旁，似乎这一范畴不值得同前者相提并论。因为如果不连续性、系统和转换、体系和界限等问题确实存在于历史的各个学科中(关于思想或者科学的学科不少于关于经济和社会的学科)的话，那么，人们怎能以某种合理性，将“变化”与“结构”，运动与循环调节或将人们不加思考所说的“历史”与“结构”对立起来呢?

在文化整体性的主题中——在这个主题上，人们先是批判了马克思，然后又为他歌功颂德，——在起源研究的主题中——人们先是以此同尼采对立起来，而后又想把他移植到这个主题中去——还在生动的，连续的和开放的历史的主题中，是同一种保守功能在起作用。因此，每当人们在历史分析中——特别是当分析涉及思想、观念或者知识时——看到非常明显地使用不连续性和差异这类词，界限、决裂和转换这类概念，以及体系与界限这类描述时，人们就会抱怨历史被谋杀了。人们就会谴责说这是对历史的永不失效的权利和整个历史性基础的冒犯。但是不应被此所蒙骗:因为他们最痛心的，不是历史的消失，而是这种历史形式的被抹杀，因为这种历史的形式曾经神秘地，然而却是全部地参照于主体的综合活动。

人们痛心的是这样一种变化，即它本应为意识的主宰提供比神话、亲属体系、语言、性欲或欲望更为可靠，更为隐蔽的避难所；人们痛心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它可以通过计划恢复意义的研究或者复活整体化的运动，物质决定论的手法，实践的规则，无意识系统，严格的却未经思考的关系，脱离亲身经验的对应关系；人们痛心的是对历史的意识形态的使用，因为人们试图通过它恢复人类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失去的一切。人们曾把所有从前的宝贝都堆放在这种历史的古老的城堡中；人们相信它是牢固的；并把它神圣化；把它变成最新的人类学思想的场所；人们甚至相信能够在这里俘获那些曾经猛烈地攻打过它的人；并相信可以把他们变成城堡的警惕的守卫者。然而，这座古老的城堡却被历史学家们长期弃置一旁，他们离开城堡，另辟蹊径；人们甚至发现即便是马克思或者尼采也不能保护人们委托给他们的东西。不能再指望他们来保护好这些特权，也不能指望他们再一次断言——上帝知道在今天的困境中，人们是否有这些需要——至少历史是活的，连续着的，断言历史对于回答问题的主体来说仍然是休息，确信，和解的和高枕无忧的场所。

我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点，其中《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勾勒出了这种研究，只是十分不尽人意。我们试图通过这项研究测量出一般发生在历史领域中的变化；在这项研究中，一些属于思想史的方法、界

限和主题受到质疑；我们还想通过这项研究试图在历史领域中解脱人类学的束缚；这项研究反过来揭示这些束缚是怎样形成的。上述这些任务，虽然已被零乱地勾画出来，但它们的整体联接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确定。现在是使它们一致起来的时候了——或者至少应该尝试一下。尝试的结果就是下面这本书。

在开始前，提出几点注意之处以免任何误解。

——本书不是要把已经在其他分析领域中试验过的结构主义方法移植到历史领域中，特别是移植到认识史的领域中。本书旨在展示历史知识领域中某个正在本领域中完成的转换原则和结果。但愿这种转换连同它提出的问题、使用的方法、确定的概念和获得的结果不至在某一方面与人们称为结构分析的东西格格不入，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并不是这种分析在此要特别进行讨论的现象。

——本书不是要（也谈不上）使用文化整体性的范畴（如：世界观、思想类型、时代的特殊精神）以便把结构分析的形式强加给历史，而不管它是否愿意。书中描述的系统、确定的界限、建立起来的对比和对应关系不以古老的历史哲学为依据，它们的目的是重新提出目的论和整体化的问题。

——在要确定一种超脱了人类学主题的历史分析方法的范围里，我们看到正趋于形成的理论连同业已完成

的考察都处在一个双重关联中。这个理论试图以普通术语(但都作了大量的纠正和制订工作)提出一些方法。上述研究从半道上使用了这些方法,或者说是为了研究的需要改造了这些方法。但是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以已取得的成果强化自己,以便确定一个无任何人本主义的分析方法。这个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它自己发现的。对疯病和心理学的出现,对疾病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对生命科学,语言和经济科学等所作的调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曾是盲目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已逐渐明朗起来。这不仅由于它们逐渐地明确它们的方法,还由于它们可能发现了——在这场人文主义和人类学的争论中——它的历史的可能性的所在点。

总之,这部书同在它以前完成的那几部书一样,没有参与——至少没有直接马上参与——关于(起源、历史、变化)结构的争论,而是参与了人类、意识、起源和主体问题的出现,交叉错杂和相互规定的范畴。然而毫无疑问,认为这里同样存在着结构问题的观点是无可厚非的。

这项研究不是对人们可以在《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或者《词与物》等书中所能读到的东西作重复和详细的描述。它在很多方面与它们不同,其中亦不乏一些修正和批判。总的来说,在《疯狂史》中对被认为"经验"的东西花费了过大的篇幅并且令人费解,它想指出人们是多么容易接受历史的匿名和一般的主体。在《临床医

学的诞生》一书中，我多次试图使用结构分析、但使用这种分析可能会回避想提出来的问题的特殊性和考古学特有的层次。最后，在《词与物》这本书中，由于没有在方法论上作明确的规定，致使人们认为我们是在进行文化整体性的分析。我为自己无力避免这些危险而忧心忡忡：我安慰自己说，它们之所以出现在我的研究中，是因为我的研究应该从历史这些多样的方法和多种形式中超脱出来，采用自己的方法；其次，如果没有这些向我提出来的问题[①]，没有出现这些的困难以及人们提出的疑义的话，我绝不可能如此清楚地看到这个不管我愿意与否从此已同我联系在一起的研究。于是，我采用了小心谨慎，步步回头的方法来写这本书：因为每时每刻，本书都在拉开距离，建立自己的方法，摸索着接近自己的界限，与它不想说的东西碰撞，并为确定自己的路线挖沟开路。每时每刻，这本书都在揭示可能的含混现象，拒绝研究本身的雷同，而且有言在先：我既非此亦非彼。通常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认为所有人在所有方面都错了并不合适。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邻域的外在性确定一块特殊的地方；在于试图——而不是迫使别人沉默，称他们在说空话——确定这个作为我谈论起点的空白。这个空白在依我看来仍然

---

① 尤其是，该文的最初部分以稍不同的形式对高等师范学校的“认识论循环”所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参见，分析手册第 9 期）。另一方面，某些发展的概要已对“精神”杂志的读者作了回答（1968 年 4 月）。——作者注

是非常不稳定和不确定的话语中慢慢地形成。

*　　　　*　　　　*

——您是不是对您所讲的没有把握？您是不是又要根据人们向你提出的问题改变观点，变换立场，说这些驳斥并没有针对性？您是不是准备重复说您从来就不是人们谴责的那样？您已经在安排退路，它可以使您在您的下一部书中再次出现，并像您现在作的这样嘲弄我们说：不，不，我并不在你们窥测我的地方，可我却在这里微笑着注视着你们。

——总而言之，你们想像一下我在写作时经受了多少艰辛，感受到多少乐趣，如果我——用一只微微颤动的手——布置了这样一座迷宫的话，你们还认为我会执著地埋头于这项研究，而我却要在这座迷宫中冒险，更改意图，为迷宫开凿地道，使迷宫远离它自身，找出它突出的部分，而这些突出部分又简化和扭曲着它的通道，我迷失在迷宫中，而当我终于出现时所遇到的目光却是我永远不想再见到的。无疑，像我这样写作是为了丢面子的远不只我一人。敬请你们不要问我是谁，更不要希求我保持不变，从一而终：因为这是一种身份的道义，它支配我们的身份证件。但愿它能在我们写作时给我们以自由。

第二章
话语的规律性

1 话语的单位

不连续性、断裂、界限、极限、体系、转换等概念的引入给整个历史分析提出的不仅是程序问题，也是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我们要在此探讨的(如果我有机会、有兴趣、有勇气的话，我将在下次经验论的调查中研究程序问题)。然而我们也只是在一个特殊的范围中考察它们，即在那些界限如此不清、内涵如此模糊以至我们把它们称为观念史，或者思想史，或者科学史，或者认识论的学科中来考察它们。

首先应该完成一项否定性的工作：摆脱那些以各自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这些概念显然不具有一个十分严格的概念结构，但它们的职能却是明确的。比如传统这个概念，它是指赋予那些既是连续的又是同一的(或者至少是相似的)现象的整体以一个特殊的时间状况；它使人们在同种形式中重新思考历史的散落；它使人们缩小一切起始特有的差异，以便毫不间断地回溯到

对起源模糊的确定中去；有了传统，就能把新事物从常态中区分出来，并能把新事物的长处移交给独特性、天才、个人的决策。还有影响这个概念，它为转让和传递的事实提供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奥妙无穷，以至无法对它进行清楚的分析；它把相似或者重复的现象归结于因果变化的程序(这个程序既没有严格的界定，也没有理论的定义)；它在一定距离中和通过时间——正如通过某种传播环境的中介那样——把诸如个体、作品、概念，或者理论这些确定的单位联系起来。再如像发展和演进的概念：它们可以把一系列分散的事件重新组合起来，把它们同惟一的和同一的构成原则联系起来，将它们置于生命榜样的力量之下(生命的适应游戏、它的创新能力、它的各种不同成分连续的对应关系、它的同化和交换体系)，使人们在每个起始之时，已着手发现一种一致性的原则和某种未来单位的雏形，并通过一直在起作用，却从来就不是既定的起源和终结之间的始终的可逆的关联来控制时间。另外像“心态”或者“精神”的概念，它们可以在某个既定时代的同时的或连续的现象之间建立某种意义同一体、某些象征联系、某种相似的和反射式的游戏——或者说它们使某种集体意识的主权作为一致性和解释原则显现出来。对这些现成的综合，这些人们在一般情况下不经任何验证就给予承认的归纳，这些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承认了其有效性的关联，应重新提出质疑；应该挖掘人们通常借以连接人类话语的这些模糊形式和势力；应该

将它们从它们在其中肆虐的阴影中驱逐出去。出于方法上的考虑和急迫性，与其让它们自行其事，还不如让它们只涉及分散事件的群体。

我们还应该在这些我们已经熟悉的分割或者组合面前采取谨慎态度。我们能否原封不动地接受这种对话语重要类型的区分，或者对形式的区分，或者对诸如科学、文学、哲学、宗教、历史、想像等相互对立的种类和把它们变成各种大的历史个体性类别的区分呢？就连我们自己在自己的话语世界中对这些区分的使用也没有把握。更不用说，问题在于所分析的陈述整体在它们表述的时代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来分布、分配和标志的。“文学”和“政治”毕竟是新出现的种类。我们只能通过回顾式的假设或者是形式类比或语义相似的手段，将它们运用到中世纪文化乃至古典文化中；但是，无论是文学、政治，还是哲学、科学都没能像它们连接 19 世纪的话语场那样，连接 17 和 18 世纪的话语场。总之，这些分割——指我们接受的分割，或是与我们所研究的话语属于同时代的那些分割——永远是自反的种类，分类的原则，准则，制度化的类型。因此，它们自己也就是话语的事实，同其他话语相比是值得分析的。无疑，在它们自身具有某些复杂的关系，但是它们不是这些关联内在、本源和普遍可以辨认出来的特征。

但是，尤其应对那些以最直接方式迫使人们接受的单位暂时避而不谈：书的单位和作品的单位。从表面上

看，如果不使用极端的人为手段，能消除这些单位吗？它们难道不是以最确切的方法确定的单位吗？书籍的物质个体化占有一个特定的空间，具备某种经济价值，并且自身还以一些数量符号标志其开始和结束的界限；这是人们通过赋予作者以一定数量本文来承认和界限的作品的确立。然而，当人们做更近一步审视时，困难也就随之出现了。书籍的物质单位若说的是一部诗选、一部遗著残本、《圆锥曲线定理》或是米什莱的《法国史》的某一卷，它们的单位是一样的吗？若说的是《骰子一掷》、吉尔·德·莱的诉讼案、布托尔的《桑·马尔科》，或者天主教的祈祷书，这些单位还是一样的吗？换句话说，书的物质单位同书支撑的话语单位相比难道不是一个无力的、次要的单位吗？而这个话语单位，它是否又是同质的，可以统一使用的呢？一部司汤达的小说或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各自差异不同于《人间喜剧》诸篇的各自不同，而《人间喜剧》中的各不相同的诸篇又相异于《奥德赛》、《尤利西斯》之间的差异。这是因为书的界线从来模糊不清，从未被严格地划分。在书的题目，开头和最后一个句号之外，在书的内部轮廓及其自律的形式之外，书还被置于一个参照其他书籍，其他本文和其他句子的系统中，成为网络的核心。然而，这种参照的游戏与我们所涉及的数学论著、本文评论、历史叙述、小说故事中的插曲相比，不是同形的。无论在这儿或在那儿，书的单位即使被理解为关联的一束，它仍不能被认为是同一性的东西。书籍杜

为人们手中的物品，白白地蜷缩在这小小的将它封闭的平行六面体之中，它的单位是可变和相对的。当有人问及它时，它便会失去意义，本身不能自我表白，它只能建立在话语复杂的范围基础上。

至于作品，它提出的问题更为困难。然而，从表面上看，还有什么比它更简单呢？这是一些可以由一个专有名词的符号表示出来的本文。不过，这种表示（尽管暂时可以不提归属问题）不是一个同质功能：一个作者的名字难道以同一方式既表示以他自己真名发表的本文，又表示以其笔名发表的本文，还表示人们在他死后发现的草稿，或者只是一些乱涂的东西，一个笔记本，一张"纸"吗？一部全集或是一部作品的构成势必需要一些选择，而确定乃至提出这些选择都是不容易的：难道在作者已发表的本文上补充那些作者曾打算付印而又因其死亡而未竟之作就行了吗？是否应该包括书籍所有的诸如草稿、原始意图、改动和删除的东西？是否还应该加上已放弃的方案？对于信件、笔记、谈话报道、听众记录下来的只言片语，简言之，一个人在他去世时留下来的关于他的这一大堆乱杂的词语，彼此交叉错节，各操各自言语，对此又应该赋予它们以什么样的地位呢？总而言之，"马拉美"这个名字不会以同样的方式与英国主题，爱伦·坡的翻译作品，同诗歌，或者与调查的答复发生关系；同样，在尼采这名字和青年时代的自传、学校论文、哲学文章《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看，这个人》、信件、《狄俄尼索斯》或《凯

撒·尼采》签名的最后的明信片和那些无数记满了洗衣店帐单和格言草稿的小本本之间，这两个方面的关联不是同一种关联。其实，如果说人们如此乐于谈论作者的“作品”而不更多地讨究的话，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它已经被某种表达功能所确定。人们承认作品中必定有某个层次（想像多深就有多深），在这个层次上，作品通过它所有的，哪怕是最微小、最不显眼的细节显现出来，就像表达思想或者经验，想像或者作者的无意识，或是作者涉身的历史规范性一样。但是人们会很快发现这样的单位是由某种操作构成的，远非是即刻给予的。人们会很快发现这种操作是阐释性的（因为它可以在本文中辨读本文所要掩饰同时又要表现的某种东西的记录）；最后，人们还会发现这种在其整体中确定着作品序列，因而也确定着作品本身的那种操作，当涉及**戏剧和它的副产品**或者《论文》（*Tractatus*）的作者时，将不再是相同的。因此，当我们要谈论某“作品”时，在此处和彼处的意义并不一样。作品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直接的、确定的或一个同质的单位。

最后，为了慎重起见，还要把那些未经思索的连续性排除在外，因为人们用它们预先组织好想要进行分析的话语：在这里要摈弃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对立。第一个主题认为在话语秩序里，要确定一个真正事件的介入是永远不可能的；并认为在所有表面的起始之外，还有着一个秘密的起源，它如此神秘，如此

独特以至无法完全在其自身把握住它。以至人们就注定通过朴实无华的编年学，被引导到一个无限遥远的起点，一个从未出现在任何一部历史中的起点；而这个起点本身可能是自己的一个空无。以它为起源，所有的起始都只能是重新开始，或者是遮掩(老实讲，只此一举，造成此与彼)。与这主题相关联的是另一个主题，它以为每一个明显话语都神秘地建立在一个已说过的东西上；而这个已说过的东西并不简单的是一句说出来的话，一篇书写出来的本文，而是一个“从未说过的东西”，一个没有形体的话语，一个同喘气一样无声的东西，一篇只是自身痕迹窟窿的书写。因而人们设想话语可能提出的所有东西已经在这种半静态中被连接起来了，这种半静态先于话语而存在并一味地潜在话语之下向前，而话语却将它遮掩，使它沉默。总之，明显话语只能是它没有说出的东西的逼迫出场；而这个没有说出的东西又是从内部消蚀所有已说出的东西的空洞。第一种动机使话语的历史分析去寻找并重复某个脱离一切历史规定性的起源；而第二种动机则使话语的历史分析解释或者倾听某个已说过的东西，而这个已说过的东西可能同时又是一个没有说出的东西。我们应该摈弃所有这些主题，它们的功能是保证话语的无限连续性和这种连续性在总是被排除的不出场的游戏中神秘的出场。我们应该时刻准备在话语介入事件中接收话语的每一时刻；在它出现的准时性中，在这种时间的散失中，它使话语被重复，知晓，遗忘乃至它的微

小痕迹也被消除干净，被淹没在书本的尘土之中，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不应该把话语推回到起源的遥远出场；而是应该在审定它的游戏中探讨它。

连续性的这些优先形式，所有这些人们并不置疑并且任其自然的综合都应该被束之高阁。当然，这样做绝不是为了最终把它们摈弃，而是为了动摇人们接受这种心安理得的状态；为了指出它们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建构的规则，并对它作验证；为了确定在哪些条件下和作什么样的分析，它们中的某些是合理的；指出那些无论如何是不能予以接受的。譬如说，“影响”或者“演进”这两个概念，它们完全可能从属于某种——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使它们失去作用的批评。但是像“作品”和“书籍”，或者还有像“科学”或是“文学”这样的单位，我们是否可以永远不使用它们呢？是否应该把它们看作是幻觉、违章建筑、不良结果呢？是否应该放弃对它们一切依靠，乃至暂时依靠并永远不给它们下定义呢？事实上，问题在于把这些单位从它们所谓的明确中拯救出来，澄清它们提出的问题，承认它们并不是寂静之处，以此为基础可以提出另外的问题(关于它们的结构、协调性、分类、转换)，而且它们自己也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如：它们是什么？怎样确定或者限定它们？它们服从的是什么不同类型的规律？什么样的连接对它们是可能的？它们可能引出什么样的子整体？在话语的领域里，它们产生哪些特殊现象？)。问题

在于承认它们可能不是最初所想像的那样，简言之，要承认这些单位需要一种理论；而这种理论若无它赖以建构起来的话语事实的范围在其非综合的纯朴性中出现，便不可能形成。

至于说到我自已，我并无它意：诚然，我要把那些既有的单位作为最初的标记(精神病理学，或者医学，或者政治经济学)；但是，我不会深入到这些尚不明确的单位的内部来研究它们的内在形式或者未外露的矛盾。我依赖于它们，只是当我自问它们形成怎样的单位？它们有什么权利索求在空间中的特定它们的领域和在时间中使它们个体化的连续性？它们根据什么样的规律形成？它们在什么样的话语事件基础上被割裂出来，以及它们最终是否在它们被接受的并且近乎成为制度的个体性中，不是那些更为稳定单位的表层结果？我接受历史给我提出的这些整体，只是随即对它们表示质疑；只是为了解析它们并且想知道是否能合理地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或者是否应把它们重建为另一些整体，把它们重新置于一个更一般的空间，以便在这个空间中驱除它们表面的人所熟知的东西，并建立它们的理论。

连续性的这些形式一旦被束之高阁，便打开了整个领域。这是一个宽广的，然而又是一个可确定的领域，即：它是由实际陈述(口头的和书面的)的整体在它们的散落和在各自所特有的层次上构成的。在有把握地接触一门科学或者小说、政治演讲、某作者的作品、甚至是一

本书之前，我们要探讨的原始中性材料，便是一般话语空间中的事件群体。这样，便出现了描述话语事件的计划，作为在此中形成的单位的研究范围。这种描述很容易区别于语言的分析。诚然，人们只有利用陈述资料体或者话语事实汇集，才能建立某个语言研究的系统(如果不是人工建构这个系统的话)；但是，这便是以这个具有样品价值的整体为基础来确定某些规律，而这些规律使人们得以构成另外一些陈述：即使一种语言已经多年失传，即使已经没有人讲这种语言，即使人们根据稀少的断简残篇将它恢复，对可能的陈述来说它始终构成一个系统：因为这是一个规律的完成整体，它允容无数的功能。反之，话语事件的范围是一个始终有限的，现时仅由已表述出来的语义段所限定的整体；这些语义段可能是无数的，并以其数量超过记录、记忆或者阅读的全部能力；然而，它们却构成一个有限的整体，对于某个话语事实，语言分析提出的问题永远是：这一陈述是根据什么规律形成的？其他相似的陈述又是根据什么规律构成的？而话语事件的描述提出的完全是另外一种问题，即：这种陈述是怎么出现的，而在其位置的不是其他陈述。

我们同样看到这种话语的描述同思想史是对立的。在思想史中，人们同样只能在话语的某个确定总体上重建思想的系统。但是人们以这样的方式研究这个总体，以至试图在陈述本身以外重新找到说话主体的意图，他的有意识活动，他想要讲的话，或者还有他情不自禁地在

他所说的东西中，或者在他公开表露话语的几乎察觉不到缝隙中流露出来的那种无意识游戏；总之，这是要重建另一种话语，重新找到那些从内部赋予人们所听到的声音以活力的、无声的、悄悄的和无止息的话语；重建细小的和看不到的本文，这种本文贯穿着字里行间，有时还会把它们搅乱。相对思想分析使用的话语来说，思想分析总是寓意的。它的问题必然是：那么，在已说出的东西中所说的是什么？话语范围的分析是朝着另一方向的：就是要在陈述事件的平庸性和特殊性中把握住陈述；确定它的存在条件，尽可能准确地确定它的极限，建立它与其他可能与它发生关联的陈述的对应关系，指出什么是它排斥的其他陈述形式。人们不用在明显的东西下面寻找另一话语的悄悄絮语；而是应该指出，为什么这个话语不可能成为另一个话语，它究竟在什么方面排斥其他话语，以及在其他话语之中同其他话语相比，它是怎样占据任何其他一种话语都无法占据的位置。这种分析所特有的问题，我们可以如此提出来：这个产生于所言之中东西的特殊存在是什么？它为什么不出现在别的地方？

我们应该自问，把所有这些已经被承认的单位束之高阁究竟意义何在，如果说是要重新发现我们在开始时曾装做提出疑问的那些单位。事实上，系统地排除所有这些既定单位首先可以使陈述重建事件的特殊性，指出不连续性不仅仅是所有构成历史地质上断层的重大事件之一，而且已经存在于陈述的简单事实中；人们使它出现

在它对历史的介入中；我们试图揭示的东西，恰恰正是它构成的切口，这个——经常是极其微小的——不可抑制的出现。因此，不管它是多么平常、不管人们把它的后果想像多么微不足道、不管在它出现之后会被迅速地遗忘、不管人们设想它很少被理解或被识破，陈述都始终是一个无论是语言，还是意义都无法使之枯竭的事件。很显然，它是一个奇怪的事件：首先因为它一方面同书写的动作或者某句话的连接相关联，而在另一方面，它又在记忆中，或者在手稿、书籍以及任何形式记录的物质性中，为自己开辟一个暂时存在；其次，因为它同每一个事件一样，是独一无二的，但它出现在重复、转换和复活的过程中；最后，因为它不仅同产生它的环境、同它引起的结果相关联，而且同时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同它最后的陈述相关联。

但是，如果相对于语言和思想来说，我们将陈述行为这层面孤立出来的话，那么这并不是为了散布众多的事实，而是为了确保不把它转送到纯粹心理综合的操作者的手中（作者的意图，他的精神形式，他的思想的严密性，萦绕在作者头脑中的诸主题，贯穿他一生的并赋予其意义的计划）和为了能够抓住规律性的其他形式和关系的其他类型：陈述之间的关系（甚至这些关系不为作者所意识；甚至这些陈述可以不从属于同一作者；甚至这些作者互不相识）；由此建立起的陈述群之间的关系（甚至这些陈述群不涉及同一范畴，也不涉及相邻的范畴；甚至它们

没有同一种形式层次，甚至它们不是可确指的互换的场所），陈述或陈述群与属于另一种类的事件之间的关系（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显示话语事件展开的纯净空间，并不意味着要把它重建在任何东西都无法克服的孤立中，不意味着把它自我封闭起来，而是要不受束缚地在其自身中和它之外描述关系的游戏。

这种话语事实描述的第三个好处在于：通过把这些事实从所有作为自然的、直接的和普遍的单位集合中解脱出来，我们就有了描述——但是，这样的描述是通过一整套已把握住的定规——的可能性。只要我们能够清楚地确定它们的条件，那么在正确描述的关系基础上，构建话语整体有可能是合理的，这些话语整体可能不是专断的，但却可能始终是看不见的。诚然，这些关系可能从未在上面提到的陈述为其自身而提出过（比如，它们与这些明显的、由话语本身确定和表达出来的关系不同，即：当话语赋予自己小说的形式，或者当话语本身出现在某一数学定理的体系中时）。然而，这些关系无论如何不可能构成某种秘密的话语，从内部赋予明显话语以活力。因此，并非解释陈述行为的事实能把这些关系阐述清楚，要作到这一点，则要通过分析它们的并存、它们的连续、它们的相互作用，它们的相互确定和它们的孤立的或者对应的转换。

然而，要排除这种看法：无标记就可以描述所有可能出现的关系。应该大体上接受一种暂时的分割：划出一

个在必要情况下,分析会打乱和进行重新组织的最初区域。怎样划出这个区域呢?一方面,应该凭借经验选择一个关系有可能是众多的、密集的和相对容易描述它们的范围。那么除去我们通常用科学术语规定的区域,就较易辨读的关系而言,这些话语事件又在哪些其他区域中可能是相互联结最密切?然而,另一方面,倘若不是针对很少形式化的话语群,而是在这里陈述似没有按照纯句法的规则产生,那么我们怎样有更多的可能在陈述中重新抓住陈述的存在和它出现规律的时机,而不是它的形式结构和它的构成规律的时机呢?如果在开始时没有提出一些较广阔的领域,一些较宽裕的时间范围的话,又怎么能肯定我们会摆脱类似作品的那些分割和类似影响的那些种类呢?最后,我们怎能肯定不会被所有这些有关说话的个体,话语的主体,本文的作者,简言之,有关所有人类学范畴所有一切考虑不周的单位和综合所蒙骗?如果不考虑上述这些范畴赖以构成陈述的整体——选择了话语的主体(它们自己的主体)作为"对象",并试图把它作为认识范畴予以展开的陈述整体的话,又考虑什么呢?

这样,我赋予这些话语的特权便得到了解释,关于这些话语我们可以简要地说,它们确定着"人类的科学"。但这只是特权的基点。我们应该牢记两个事实:话语事件的分析绝对不会被界限于这样一个领域中;另一方面,对这个领域本身的分割也不能被视为最终的,也不是绝对有价值的;它只是近似值。这个近似值应使一些关系的出现成

为可能，而这些关系又有可能消除那个最早构想的界限。

2 话语的形成

因此，我首先着手描述各种陈述之间的关系。对于那些可能对我提出来的和我习惯随意使用的那些单位，我采取了谨慎作法，不承认它们之中任何一个是有价值的。我决心不忽略任何一种不连续性、决裂、界限或者是极限的形式。我决心要在话语的范围中描述陈述以及它们的可能关系。正像我所设想的那样，这样做立即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我打算暂时不谈而是留到以后再谈——关于我对陈述、事件、话语等术语粗野的使用；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涉及能否对人们留在暂时和可见陈述群中的这些陈述之间的关系作合理描述。

譬如，有一些陈述——不难确定这种情况的时期——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或者是属于生物学或者精神病理学的；还有一些陈述属于那些具有千年连续性——几乎不知起源的——人们称为语法或者医学的陈述。然而，这些单位是什么？人们怎么能够说由维里斯[1]和夏尔科[2]诊所做出的关于头部疾病的分析是属于同一

---

① 维里斯(1621—1675年)，英国解剖学家，神经生物学家。

② 夏尔科(1825—1893年)，法国精神病医生。

类话语呢？怎么能够说贝迪[1]的发明与纽曼[2]的经济计量学具有连续性呢？怎么能够说由保尔—罗瓦雅尔学派的语法学家们做出的判断分析同对印—欧语系中的元音更迭的测定是属于同一领域的呢？那么，医学、语法和政治经济学又是什么？难道它们只是当代科学借以幻想它们本身过去的一种回顾性的聚合？它们难道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来的并随时间转移的极快发展起来的形式？它们是否还包含着其他单位？在所有这些以熟悉而坚定的方式形成神秘群体的陈述之间，可有效地辨识出什么样的关联呢？

第一种假设——在我看来是最有可能和最容易证明的——如果分散在时间中的不同形式的陈述只参照同一对象的话，它们便形成一个整体。因此，属于精神病理学的陈述似乎都被归结于这样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以不同的方式在个体的或社会的经验中显现出自己的轮廓，而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精神病。然而，我很快就发现"精神病"这个对象的单位不能使陈述整体个体化，也不能在陈述之间建立某种既可描述又实在的关系。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如果我们要向精神病这种存在本身，向它的神秘内涵，向它的沉默和封闭自身的实情了解人们在某既定时间可能对精神病说过什么，那我们肯定错了。精神病是

---

① 贝迪（1623—1687年），英国医生，经济学家。

② 纽曼（1903—1951年），匈裔美国数学家。

由这样一个整体构成的，它是由所有那些对精神病进行确定、分割、描述和解释，讲述它的发展，指出它多种多样的对应关系，对它进行判断，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替它讲话，同时以它的名义把应该被看作是它的谈话连接起来的话语构成的陈述群中被说出来的东西的整体。然而，更有甚者，这个陈述的整体并非只同惟一的一成不变的对象有关，也并非只把它作为自己永不枯竭的理想范围永远保留着。这个被17或18世纪医学陈述作为它们的对应物提出来的对象与出现在法庭判决或者治安措施中的对象不是同一的；同样，精神病理学话语的所有对象从比耐[1] 或是从埃斯齐罗尔[2] 到布勒雷[3] 都已更改了；此处和彼处所提到的疾病已不是同一种疾病，所提到的精神病患者也不是同样的。

从对象的这种多样性中，我们可能，或许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本不可能承认“关于精神病的话语”是一个构成陈述整体的有效单位，或许我们应该限于只有惟一同一对象的陈述群：限于关于忧郁症或是关于神经官能症的话语。但是，我们会很快意识到这些话语中的每一种又构成了各自的对象，并且对它进行了加工，直至将它彻底改观。因而，便产生这样的问题，要弄清某个话语的

① 比耐(1743—1826年)，法国医生。
② 埃斯齐罗尔(1772—1840年)，法国精神病医生。
③ 布勒雷(1857—1939年)，瑞士精神病专家。

单位是否不是由一个对象的持久性和特殊性所决定，而是由多种多样的对象在其中形成并不断地转换的空间所决定。那么，使这个关于精神病的陈述整体得以个体化的富有特征的关系会不会是：这个整体中被确定、被描述、被分析、被估计或者被判断的各种各样对象的同时或者连续出现的规则呢？关于精神病的话语单位也许并不建立在“精神病”这个对象存在的基础上，或者建立在某个客观性的独一无二的范围构成的基础上；可能这是使对象的出现在既定时期中成为可能的那些规则所起的作用。这是一些用区别和抑制方法分割的对象，是一些在日常实践中，在法学中，在宗教怀疑论中，在医生的判断中相互区别的对象，是一些出现在病理描述中的对象，是一些被医治、治疗和护理的规约或处方限定的对象。此外，关于精神病的话语单位可能就是这些规则的作用，这些规则确定着这些不同对象的转换，它们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它们之中产生的断裂，中断它们持续性的内在不连续性。自相矛盾的是在具有的个体性东西中确定陈述整体，在于描述这些对象的分散，把握分割它们的所有间隙，估量它们之间的距离——换句话说，提出它们的分布规律。

在陈述之间确定关系群的第二个假设是：它们的形式和连贯类型。譬如，过去我曾认为，从19世纪起，医学科学并不是由它的对象或者它的概念所标志，而是由某种风格、某种陈述行为的稳固特征所标志。医学第一次

不再是由一个传统、观察、混杂的治疗处方的整体所构成，而是由一个认识体构成。这个认识体意味着对事物具有同样的观察，具有同样的感觉范围，根据身体的可见空间对病理事实具有同样的分析，以及对人们在所说东西中所感知到的东西做出同样的记录体系（同样的语汇，同样的隐喻手法）；简言之，我曾认为，医学的组成如同一系列描写陈述。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应该放弃这种一开始的假设并承认临床话语既是有关生与死的假设整体，是伦理选择的、治疗决策的、规章制度的教育模式的整体；还是一个描述的整体；后者无论如何不可能从前者中抽象出来，而描述的陈述行为只是出现在医学话语中的表达之一。我们还应该承认这种描述在不断的变动：或是因为从毕沙到细胞病理学人们已经变动了它们的范围和对它们的测定，或是因为从视诊、听诊、触诊到显微镜，生物检验的使用，信息系统已经发生变化，或是还因为从简单临床解剖的对应关系到病理生理学过程的细致分析，符号的词汇和它们的读识已彻底地重建，最后或者因为医生本人已逐渐不再是信息的记录者和信息的解剖者，以及因为在他身边和他自身以外，已建立起大量的资料，对应关系的手段和分析的技术，当然，医生是要利用这一切的，但相对于病人来说，它们改变着医生作为观察主体的位置。

所有这些变化今天可能把我们引进一种新医学的大门，而这些变化是在整个 19 世纪中慢慢地沉积于医学话

语中的。如果我们想用某个陈述行为标准的，规范化的体系来确定这种话语，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这种医学在它刚刚出现时，就已经解体了，它只是在毕沙[①] 和林内[②]的作品中，略有提及。因此，如果说有单位的话，它的原则并不因此是陈述的某种确定形式。那么，会不会是同时或者轮流地使纯感觉描述成为可能的那些规则的整体，还有依靠器械进行的间接观察，实验室的实验记录，统计计算，流行病或者人口的观察，规章制度，治疗处方呢？应该加以特征化或个体化的东西，有可能正是这些分散的和异质的陈述的并存；支配着它们分布的体系，它们相互依靠的支点，它们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的方式，它们承受的转换，它们的换位，安排和替代游戏。

另一个研究方向，另一种假设是：我们能不能在确定于陈述群中起作用的那些持久和一致概念系统的同时，建立起陈述群？譬如在古典主义作家（从朗斯洛[③] 到 18 世纪末）的作品中，对话语和语法事实的分析不是建立在一定数量的概念上的吗？这些概念的内容和用法一旦确立便一劳永逸，譬如判断这个概念被确定为每个句子的普遍和标准形式，主语和表语这两个概念归纳在名词这个更普遍的类别中，动词这概念被当作与逻辑系词等同

① 毕沙（1771—1802 年），法国心理医生。

② 林内（1707—1778 年），瑞士博物学家。

③ 朗斯洛（1615—1695 年），冉森派宗教人士，罗瓦雅尔派语法学家。

的概念使用；词的概念被确定为表达的符号等等。据此，我们可以重建古典主义语法概念的结构。但是，即便这样，我们离接触到极限还为时尚早：无疑我们几乎还不能用这些成分来描述保尔—罗瓦雅尔派作者们所作的分析；很快我可能会身不由己地发现一些新概念的产生，其中有一些可能是从旧概念中派生出来的，但是，其他的概念是异质的，并且其中有些甚至与它们是不相容的。句子自然的或是倒置的词序概念和补语的概念（由伯兹在18世纪引入）肯定也可以同保尔—罗瓦雅尔派的语法概念系统相结合。但是，无论是声音最初具有表现价值的观点，还是词语中蕴含着原始知识并通过词语被不知不觉地传递的观点，还是辅音变动中的规律性的观点，以及把动词看作是可以确定一个动作或一种操作的普通名词的观点，都与朗斯洛或杜克洛[①] 所使用的概念整体不相容。在这些情况下，是否应该承认语法只是在表面上构成了一个一致的形态；是否应承认陈述的、分析的、描述的、原则的和结果的、推断的整体是一个虚假的单位，并在此名义下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然而，我们或许会发现话语单位，如果我们不是在概念一致性的方面，而是在这些概念的同时或连续出现的方面，在它们的间隙，它们之间的距离方面，或有可能的话，在它们的不相容性等方面寻找话语单位的话。这样，我们就不再寻找足够普遍的

① 杜克洛（1704—1772年），法国小说家。

和抽象的概念结构以便阐述所有其他的概念，并把它们引导到同一演绎的结构中去；而是设法对这些概念出现和扩散的作用进行分析。

最后，第四个假设是为了重新组合陈述，描述它们的连贯，阐述它们表现出来的统一形式：主题的同一性和持久性。在诸如经济学或者生物学一类的“科学”中，这些“科学”极易引起论战，极易受哲学或者伦理学的影响，并且在某些情况中随时都能为政治所利用，认为某个主题有能力连接——并且有能力像有着自身需要的机体那样使内在力和生存的能力富有活力——话语的整体，首先这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能不能把比如从布封到达尔文所有构成进化论主题的东西作为一个单位呢？首先这个主题与科学相比，它更接近于哲学，与生物学相比，它更接近于宇宙学；宁可说它从远处指导了研究，而不是命名，覆盖并解释了结果；这个主题所假设的总比人们所知的更多，但它又迫使人们在这个基本选择的基础上把这些被勾划为假定或者要求的东西转变成话语的知识。我们能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谈论重农论的主题呢？这种想法在任何的论证以外和作任何分析之前，假定了一个三项地租的自然特征；从而假设出农业资产政治和经济的至上论；它排斥了对工业生产机械论的任何分析；反之，它又包含着对货币国内流通和货币在各个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分配，以及货币回到生产上来的各渠道的描述；这种观点最终使李嘉图探讨这三项地租不会出现的各种情况，探

讨三项地租借以形成的条件，因而使他揭示重农主题的任意性。

但是，出于这样的设想，我们会作两种相反相成的看法。在一种情况下，同一主题以两种概念游戏，两种分析类型，两个截然不同的对象范围为基础连接起来：因为，进化论的思想，在其最一般的表达方式上，它可能与贝努瓦·德·马耶[①]、波尔德[②] 或狄德罗和达尔文是同样的；但事实上，使这种思想成为可能并且一致的东西绝对不是同一类别的。在18世纪，进化论的思想确定在物种的亲缘关系上。物种的这种亲缘关系从一开始就形成一个规定的连续体(只有自然灾害可能使它中断)，或者说这个连续体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形成。在19世纪，进化论的主题则很少涉及物种的连续图表的构成，更多地涉及到描述不连续群，和分析各组成部分都连贯的有机体和一个为其提供实际生活条件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方式。虽然主题只是一个，但是以两种类型话语为基点的重农论的情况与此相反，魁奈[③] 的选择所依据的概念系统与那些可称为功利主义者所支持的相反观点的概念系统是同样的。在那个时代中，财产的分析所包含的概念游戏比较有限，并为众人所承认(人们赋予货币的定义是

① 贝努瓦·德·马耶(1656—1738年)，法国外交家，地质学家。
② 波尔德(1722—1766年)，法国医生。
③ 魁奈(1694—1774年)，法国医生，经济学家。

同样的;对价格的解释是同样的;并按同样的方式确定劳务费用)。不过,以这个独一概念游戏为基础,有着两种解释价值形成的方式,根据交换或根据工作日报酬进行价值分析。在这种经济理论及其概念游戏的规则中,这两种可能性又在相同的成分的基础上产生两个不同的选择。

因此,若在这些主题的存在中寻找对某个话语个体化的原则,就会误入歧途。我们能否在不受话语束缚的选择点的散布中寻找这些原则呢?这会不会是话语造成的其他可能性,即:复活现存的主题;引起对立的策略;让位于不可调和的利益,以及用确定概念的游戏玩弄不同的花样呢?与其在时间中重新探求主题、形象和观点的持久性,与其描述勾画出它们为了使陈述整体的个体化而产生的冲突辩证法,我们倒不如测定这些选择点的散布,并在任何选择和对主题任何偏爱的范围之内,确定一个策略可能性的范围呢?

因此,我便面临四种设想,四步棋——或者说四个前后衔接的假定。现在所要作的就是验证它们。关于这些我们的习惯必须接受的陈述大家庭——我们把它们确指为医学或者经济学或者语法——,我曾自问它们能够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单位。在一个满实的、紧凑的、连接的和在地理上切割明确的对象的范围上?然而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些有缺陷的、纵横交错的体系,是一些差异、间隙、替代和转换的游戏。是建立在一种陈述行为

的确定和标准的类型基础上？但是，我发现的是一些层次极不相同，功能极其相异的表达，以至于它们不能衔接和组构在独一形态中，也不能通过时间，在个体的作品以外，伪装成某个不间断的大本文。是在概念的确定字母表上？然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都是一些在结构和使用规则上各不相同的概念，彼此不相干或者相互排斥的概念，一些根本不能进入逻辑建构一致性中的概念。是在主题的持久性上？可是，我们发现的却是各种各样策略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使那些不相容的主题活跃起来，或者还可以使同一主题投入到不同的整体中去。由此，我萌发了描述这些散布本身的想法；萌发了在这些成分之间寻找能否发现某种规律性的想法，无疑，这些成分的组建不同于演绎的渐进构造，不同于日积月累逐渐写成的巨著，也不同于集体主体的作品。这种规律性是：它们连续出现的次序，它们的同时性中的对应关系，在共同空间中可被确定的位置，相互作用，被联结和等级化的转换。这样的分析为了描述它们的内在结构，并不试图划分出若干个一致性的小岛；这样的分析，其任务不是怀疑和阐明潜伏的冲突；它要研究分布的形式。或是说，不是重建某些“推理链”（正像人们经常在科学史或者哲学史中所作的那样），也不是制作“差异表”（像语言学家们那样），而是描述*散布的系统*。

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定数目的陈述之间，描述这样的散布系统，如果我们能够在对象、各类陈述行为、这些概

念和主题选择之间确定某种规律性的话(次序、对应关系、位置和功能、转换),按习惯我们会说我们已经涉及到了话语的形成——这样说,可以避免那些因条件和结果而过于笨重的用语,而且也不适合用来确定像“科学”,或者“意识形态”,或者“理论”,或者“客观性范畴”这样的散布。我们将把这种分配的成分(对象、陈述行为的方式、概念、主题的选择)所屈从的条件称为形成的规则。形成的规则是在一定话语分布中的存在条件(也是它们共存、保持、变化和消失的条件)。

这些正是现在应该驰骋的领域;应该论证的概念和应该进行的分析。我深知这样做的风险非同小可。作为初步的测定,我曾使用了一些不很严格却相当熟悉的群:没有任何迹象向我表明经过分析我将重新发现这些群,并会发现它们的界限和它们的个体化的原则;对于我要分离出来的这些话语的形成,我没有把握它们将会在医学的总体单位中来界定医学;在经济学和语法历史终点的整体曲线上来界定它们;我没有把握它们将不造成某些意料不到的分割。同样,没有任何迹象向我表明,这样的描述将能够阐明那些我作为切入点和那些在开始时就以某种自视具有科学理性的方式显示出来的话语整体的科学性(或者非科学性);没有任何迹象向我表明我的分析将不会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并构成一种无法归结为认识论或者科学史的描述。有可能在这项分析终了时将无法回收那些鉴于方法上的考虑而被我们弃之一边

的单位,因为我们不得不分解作品;无视影响和传统;彻底放弃起源问题,让作者专横的立场自行消失;这样,所有自身构成思想史的东西会消失。总之,说是风险,是因为我们不但不为已经存在的东西提供根据,不但没有粗略地重作审视,不但没有以这种归返和最后的肯定而感自慰,不但没去完成经过无数次的绞尽脑汁和熬过无数次的夜晚之后,最后宣布一切都有办法解决的这个良性循环,而是不得不越过熟悉的景物,远离已习惯的保障,走在尚未划分的土地,向着一个不易预料的终点前去。至此,所有这一切曾保护着历史学家,并伴随他直至傍晚(合理性的命运与科学的目的论,思维长时间的连续工作,意识的觉醒和发展,意识通过自身获得永久的复苏,总体化未完成的但从未间断过的运动,向一个永远敞开的起源的回归;以及历史先验论的主题),所有这一切有没有消失的可能?也就是说,会不会为分析提供一个空白的、无动于衷的、既不低下也无许诺的空间?

3 对象的形成

我们现在应该来清理一下这些开辟的方向,并且弄清我们是否能够赋予这个初步勾勒出的"形成的规则"的概念以内涵。那么,我们首先从对象的形成入手。为了分析方便起见,我们还是以 19 世纪以来精神病理学的话

语为例。采用人们一看便易接受的年代分割。有足够的标记表明对象的形成。我们在此只举两例:本世纪初,建起了拒收和接纳病人入精神病院的新方式和对某些现有概念的系谱追溯到埃斯齐罗尔,汉诺斯[①]或者比耐的可能性(从偏执症,我们可以上溯到偏执,从智商可以联想到最初的痴愚概念,从全瘫想到慢性脑炎,从性格神经官能症联想到无妄想性精神病);而当我们要更久远地追踪这种时间的线索时,却一下子失去了踪迹。各种线索交织在一起,就连杜·罗朗或者冯·斯维丹[②]对克莱布林[③]或者布勒雷的病理学投影提供的也不过是一些偶然巧合。然而,精神病理学曾涉及的这些对象自这次中断以来,数量变得众多,其中一大部分是新出现的,但是相当脆弱、易变,其中一些注定会很快消失:除了原发的骚动、幻觉和异常的话语(它们已被看作是精神病的表现,尽管它们是以另一种方式得到承认、确定、描述和分析),我们还看到有一些属于至此未被使用过的记载,如:行为的轻度紊乱、性反常与性错乱、催眠暗示和催眠状态的事实、中枢神经损伤、智能或者原发适应性的缺乏、犯罪行为。并且各种各样的对象都是在每一个记载的基础上被确定、划分、分析,而后又被纠正、再确定、否认、取消的。我

① 汉诺斯(1773—1843年),德国医生,心理学家。
② 冯·斯维丹(1700—1772年),德国医生。
③ 克莱布林(1855—1926年),德国精神病学家。

们能否建立它们的出现曾遵循的规则呢？我们能否了解这些对象是根据什么样的非演绎系统得以相互并列和相互连接以构成精神病理学这个支离破碎的各部分盈亏不均的范围？作为话语的对象，它们存在的体系是什么？

a.首先应该测定它们出现的表层：指出这些个体的差异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以便加以确定和分析，而这些个体的差异，根据合理化的程度、概念的准则和理论的类型，接受诸如疾病、精神错乱、怪癖、痴呆、神经官能症或者精神病、变性等状况。这些表层的出现依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话语形式也不一样。就19世纪精神病理学而言，有可能出现的表层是家庭，接近的社会群体，工作地点，宗教团体（这些地方都是标准的，都对偏差很敏感，都有容忍的余地和排斥的界限，它们都有确定和否定精神病的方式，它们如果不是把医治和治疗的责任给予医学，那么至少也是把解释的义务交给了医学）；这些出现的表层尽管是以一个特殊方式构成的，但对19世纪来说不是什么新东西。反之，一些新出现的表层肯定是在19世纪开始发挥作用的，如：纯标准性的艺术、性欲（与习惯禁忌相比，它的偏差第一次成为精神病话语测定、描述和分析的对象）、刑罚（正当精神病在从前被严格地区分于犯罪行为并被谅解时，犯罪行为自己却变成——特别在少有的“杀人偏执”出现以来——一种多少与精神病相像的偏差形式）。在此，在这些初步分化的范

围中，在表现在其中的距离、不连续性和界限中，精神病话语找到了界限它的领域；确定它所言之物；赋予这些东西以对象地位的可能性——从而找到了显示这一对象，并使之成为可确定的和可描述的可能性。

b.此外，我们应该描述界限的审定，如：医学（作为规定下来的机制，作为组成医学界各个体的整体，作为知识和实践，作为被公众舆论、司法和政府承认的权能）在19世纪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审定，它在社会中以精神病为对象，对它进行区分、确认、命名和确立；但医学也不是惟一起这种作用的学科，还有：司法、特别是刑法（通过对免刑、无责任性、可减轻罪行情节的确定和通过使用诸如情杀、遗传、社会危险等概念），宗教权威（在它本身就是作决定一级的情况下，即它可以区分神秘和病理、精神和肉体、超自然和反常，和在对意识的领导更多地为个人知识而不是为行为和境况的决疑论分类的情况下），文学和艺术批评（在19世纪，它们越来越不把作品看作是应该评判的趣味对象，而是越来越把它看作是应该阐释的言语，并从中应该识别作者的表达手法）。

c.最后，我们应该分析规格的格局：这里说的是系统，我们将根据这些系统对作为精神病话语对象的各种互不相同的"精神病"进行分离、对比、联系、组合、分类和派生（19世纪的区分格局是这样的：心灵，是按等级排列的相邻的和多少可相互渗透的官能群；躯体，是由从属和沟通模式连接起来的器官的三维体积；生活和个人历史

是阶段的线性连续，踪迹的纵横交错，潜在的再活化整体，周而复始的重复；神经心理对应关联的作用，是互相投射的系统和循环因果性的范围)。

这些描述在自身还是不能说明问题。原因有两个。这些我们刚刚加以测定的出现的层面、界限的审定和规格的格局没有提供一些被完整地构成和装备的对象。这些对象只能由精神病话语在以后对它们进行清查分类和命名、选择，并最后把它们伪装成词和句子。因为并不是家庭——按照它们的标准，它们的禁忌，它们的敏感界限——确定疯病患者和建议"病人"去接受精神病医生的分析和诊断；并不是法律根据某个谋杀案便向精神病学举报某个妄想狂或者根据性犯罪行为便猜疑神经官能症。话语根本不是这样一个场所，即：由那些本该事前被建立的对象来沉淀和堆积一个普遍记录表层。但是，上面提到的描述的不足还有第二个原因：它已经一个接一个地测定了好几个话语的对象可能出现在那里的分化层面。但是，在这些层面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是这种区分而不是另一种？用这样的方法能划分出什么样的确定和封闭的整体？而且，如果我们只了解一个无联系又无可确定的关系的、不同的和异质的确定系统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言及"形成的系统"呢？

其实，这两类问题可以归结于同一点。为了掌握这一点，我们还是限于前面的例子。在19世纪精神病理学

所涉及的范围中，我们知道很早以前（从埃斯齐罗尔开始）就出现了属于轻罪范围的一系列对象，如：杀人（和自杀）、情杀、淫乱、某些偷窃的形式、流浪和后来由此衍生出的诸如遗传、神经病环境、攻击或自残行为、邪恶行为、犯罪癖、暗示感受性等。因而认为我们接触到了某一发现结果，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这只是精神病大夫某一天对犯罪行为和病态行为之间的相似性做出的辨认；是从某些轻罪犯身上暴露出的异化经典符号的表现。这些事实已超出了目前研究的范围：事实上，问题在于弄清使它们成为可能的东西是什么，这些“发现”后又随之而来另外一些发现，并被它们重新使用、纠正、修改乃至可能取消。同样，把这些新对象的出现归结于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标准，归结于治安和严厉刑罚的划分，归结于刑事司法新法规的建立和可减轻罪行情况的引入和使用，以及犯罪行为的增加也是不恰当的。无疑，所有上述这些过程确实都已发生过；但是这些过程自身并没有能够形成精神病话语的对象，继续在这一层次进行描述，这回我们便滞留在所寻求的事物范围之内。

如果说在我们的社会中，在一定时期中，轻罪犯被心理化和病理化的话，如果说违抗行为能够引发出一整套知识对象体系的话，这是因为在精神病话语中启用了确定的关系整体。这些关系是：规格的层面如刑罚的种类和责任感减少程度和心理特征化层面之间的关系（官能、能力、发展或退化的程度，对环境做出反应的方式，性格

类型:后天的,先天的还是遗传的);医学诊断审定与法律裁决审定之间的关系(老实说,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因为医学诊断绝对承认司法在确定犯罪和确立罪行情状和惩罚时做出的判决;但是仍保留着对犯罪的起因分析和所承担责任估计的权利);由司法审讯,警方情报、调查以及整个司法信息机构组成的网络与由医疗询问,临床检查,病史研究以及个人病历构成的医学网络之间的关系;个人行为的家庭标准,性标准和刑罚标准与病理征兆和这些征兆预示的疾病图像之间的关系;在医疗机构中的治疗限定(医疗机构特殊的界限,它的治愈标准,它的界定正常与病理的方法)和在监狱中惩罚限定(监狱惩罚和教育的系统,它对好的品行,改恶从善和获释的标准)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关系在精神病话语中发挥着作用,促成了包罗各种各样对象整体的形成。

概言之,标志着19世纪精神病话语的不是什么特别对象,而是这个话语借以形成它的对象——十分分散的对象——的那种方式。在出现、界限和规格审定之间建立起的关系整体使这个形成得到保证。因此,我们会说如果能建立这样的整体;如果我们能够指出所涉及的话语的任何对象是如何在这个整体中找到自己出现的地点和规律;如果能够指出话语在本身无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可以同时或者连续地产生出相互排斥的对象的话,那么,一种话语的形成得以确定了(至少对它的对象而言)。

由此,产生了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和后果。

1.这些使话语对象出现的条件，这些使人们可以就此谈论“某一事情”而少数人可以就此谈论不同事情的历史条件，这些使话语的对象出现在一个同其他的对象有亲缘关系的领域中，使它能同它们建立相似、相邻、远离、差异和转换关系的条件——所有这些条件，我们已经看到，既繁杂又苛刻。它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任意一个时代言及任意什么东西；说出新的东西是不容易的；意味着睁大眼睛，集中注意力或有悟性是不足以使新对象马上就闪耀并在地平线上发出曙光的。但是这个困难并不仅是消极的；不应该把它同某种障碍联在一起——这种障碍可能专门是堵塞、妨碍和阻止发现，掩盖事实真相。掩盖事物本身的默默固执；对象不是在未成形的状态中等待解救它，使它可以体现在一个可见的和可言的客观性中的秩序；对象不先于自己而存在，它被某种障碍阻拦在光明的前沿边缘。对象存在于某个关系的复杂网络的积极条件中。

2.这些关系建立在机制，经济和社会过程，行为的形式，标准的体系，技术，分类的类型和特征化的方式之间；而且这些关系并不出现在对象中；它们不是在对对象进行分析时被展开的东西；它们并不勾划出对象的网状结构，内在合理性，——这条理想的脉络，当人们对对象的概念的真实性作思考时，它完整地或部分地重新出现了。这些关系不确定对象的内部构成，而是确定使对象得以出现，与其他对象并列，并确立自身相对于它们的位置；

确定自己的差异，它的不可减缩性，可能还确定它的异质性，简言之，使它置于外在性范围中的那些东西。

3.这些关系首先有别于可称之为“初级的”并且独立于任何话语或者话语的对象，可以在机构、技术、社会形式等等之间被描述的那些关系。总之，非常清楚，在资产阶级家庭与19世纪司法诉讼和司法种类的运作之间存在着一些关系，人们可以对这些关系自身进行分析。不过，这些关系与那些形成对象的关系并不总是可重迭的，譬如，能够在这个初级层次上确定的从属关系，并不必定表现在使话语的对象成为可能的关系的建立中。但是，另外还应该区别可以在话语本身中被提出来次要的关系。例如，19世纪精神病医生就家庭和犯罪之间的关系所能说出来的并不能再产生出真实从属的游戏，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但是这也不能再产生使精神病话语的对象成为可能的并支持它们的关系的游戏。这样，由可能的描述连接起来的空间被打开了：原始的或真实的关系体系，间接的或自反的关系体系或人们可以干脆称作话语的关系体系。问题在于呈现后者的特殊性及其与另外两个关系体系的游戏。

4.我们已经看到，话语的关系并不内在于话语中：这些关系并不在自身中把概念或词语联系起来，不在句子或命题之间建立演绎或修辞的结构。但是，也不是外在于话语的关系，限定着话语或者强加给它某些形式，或者在某些情况中强迫它陈述某些事情。因此，这些关系是

话语的极限：它们向话语提供话语能够言及的对象，或者更恰当地说（因为这种提供的形象设定，对象构成于一方，话语形成于另一方），它们确定着话语为了能够言及这样或那样的对象，能够探讨它们，确定、分析、分类、解释它们所应该构成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所标志的不是话语使用的语言，不是话语在其中展开的景况，它们标志的是作为实践的话语本身。

现在我们可以给分析作个结论并衡量这个分析在哪些方面完成了，又在哪些方面改变了最初的计划。

对于像精神病理学、经济学、语法、医学这些固执而又模糊地出现的整体形态，我们曾自问构成这些整体形态的是何种单位，即：这些整体形态会不会只是在特殊的作品，连续的理论，概念或者主题的基础上的重建？这些概念或主题中的一部分被遗弃了，一部分被传统保留下来，还有一些被遗忘而后又被重新发掘出来。它们会不会只是一个被连接在一起的事情的体系？

我们曾在对象本身这一方面，在它们的分配，它们的差异游戏，它们毗邻或远离之外——简言之，在被赋予说话主体的东西这一方面，寻找过话语的单位：最后我们被引至标志着话语实践本身的关系的建立上，从而，我们发现的不是某个外形或者形式，而是实践的内在和确定着实践特殊性的规律整体。另一方面，我们使用了精神病理学这个“单位”作为标志：因为如果想要确定精神病理学的诞生时期和它的准确范围的话，那肯定应该重新找

到这个词的出处，确定它能适用于何种分析类型，和确定怎样划分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是另一类型的单位，它似乎并没有相同的日期，没有相同的表层和相同的连接，但它却可以阐明某个对象的整体。对这些对象来说，精神病理学这个术语只不过是一个自反的、间接的、分类上的标题。总之，精神病理学是作为一个学科出现的，处在不断的更新之中，不断地有发现、批评和纠正谬误；而已确定的形成的系统一直是稳定的。但要明白：持久不变的既不是对象，也不是对象形成的范围，甚至也不是对象的出现点，或者它们特征化的方式，而是对象可能出现的、自我界限的、自我分析和自我说明的表层的相互关系。

我们知道，在我刚刚试图作理论阐述的描述中，谈不上阐释话语以便通过它来创造一个参照物的历史。在所选的整体中，我们不设法弄清在某时代有什么人疯了，他所患精神病是什么，也不想知道他的错乱是否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错乱相同。我们不想探究巫师是否是一些无人理会的和受迫害的精神病患者，或者在某时期神秘主义的或审美的经验是否曾被不恰当地医学化了。我们不设法重建精神病本身可能成为的东西，正像它首先可能在某种原始的、基本的、不公开的、几乎不连接的实验[1]

① 此处同《疯狂史》中一个明显的主题相悖，该主题数次醒目地出现在序言中。——作者注

中所显示的那样，又像它后来可能被话语和话语操作的拐弯抹角的手法(往往是扭曲的)组织起来(表现、变形、歪曲、可能受抑制)的那样。无疑，这种参照对象的历史是可能的；我们不排除在研究一开始为从本文中抽出和提取这些“前话语”的经验做出过努力。但是，这里涉及的问题不是要使话语中性化，把它变成其他事物的符号和穿过它的深层寻找静静地存在于它的内部的东西。正相反，要将话语保持在它的确实性中，使话语出现在它特有的复杂中。总之，我们要彻底放弃“事物”，使它们“非现在化”，避开它们丰富的、沉重的和立即的完整性，因为我们习惯于把它变成某个话语的原始规律，而这个话语只有因谬误、遗忘、错觉、无知或者信仰和传统的惰性，或者可能来自无意识的不想看也不想说的愿望才可能脱离这条规律。让我们用只显示在话语之中的对象的有规则的形成来替代话语前事物的神秘的宝藏。确定这些对象不参照事物的基质而是把它们同规律的整体联系起来，这个规律的整体能使人们把它们形成为某一话语的对象，从而构成它们的历史出现条件。写一部话语对象的历史，不是把这些话语的对象深深地插入到它们共同的来源地，而是要展示支配着它们分散规律性的连结。

然而，省略“事物本身”的时间，不意味着必然要参照意义的语言学分析。在描述某个话语的对象的形成时，我们试图测定标志着某话语实践特征的关系的建立，我们不确定词的构造和语义场的断裂，就是说，我们不探究“忧

郁”或“无妄想精神病”这两个词在某个时代被赋予的意义，也不探究“精神病”和“神经病”在内容上的对立。在此，这并非因为这样的分析被视为不合理的和不可能的；而是这样的分析，在我们比如想弄清犯罪是怎样会成为医学鉴定的对象，或者性偏差是怎样会成为精神病话语的可能的对象时，是不合适的。词汇内涵的分析确定着或是说话的主体在一定的时期所具有的意义成分，或是出现在已经说出的话语的表层上的语义结构；词汇的内容分析并不把话语的实践作为这样的场所，即多种多样相互交错的，又是空白的——对象形成和解体，出现和消失的场所。

评论家的洞察力在这方面全然没错，即：在我所进行的这种分析中，词语同物一样一概排除在外；对某种词汇的描述并不更多于对经验的生动完整性的求助。我们并不回到话语的内部——在那里，任何东西尚未说出，事物隐约地出现在灰暗的光线中，我们也不到话语以外去寻求它已安排好的，并在身后留下的形式；我们使自己保持，力图使自己保持在话语本身的层次中。既然我们有时还需要对最明显的缺欠中微小之处作详细说明，我认为，在这些我进展甚微的研究中，我想要指出的是，人们所能听到的，在它们的本文的形式中读到的“话语”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和简单的事物和词的混杂体：事物的隐蔽网络，明显的、可见的和多彩的词语链；我想指出话语不是现实和语言之间的一个接触或者面对的狭窄表层，词汇和体验的混合体；我想通过几个具

体例子说明，在分析话语本身过程中，我们看到词与事物从表面看来如此紧密的结合松懈了，并且话语实践所特有的规则整体显露了出来。这些规则根本不确定某个现实的无声存在，不确定某种词汇正规用法，它们确定的是对象的体系。《词与物》，是一个问题的严肃题目，是一项研究——带讽刺意味——的题目，因为这项研究更改了自己的形式，挪动了自己的论据，总之，它揭示了另外一项任务。这个任务在于不把——不再把——话语当做符号的整体来研究（把能指成分归结于内容或者表达），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诚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减缩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

4　陈述方式的形成

质的描述、自传叙事、测定、解释和符号聚合、类比推理、演绎、统计估计、试验证明、还有更多的其他陈述形式，都是我们在 19 世纪医生的话语中可以找到的陈述形式。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必然性？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其他？我们应该找到所有这些各不相同的陈述过程的规律和它们的来源。

a.第一个问题：谁在说话？在所有说话个体的总体中，谁有充分理由使用这种类型的语言？谁是这种语言的拥有者？谁从这个拥有者那里接受他的特殊性及其特权地位？反过来，他从谁那里接受如果不是真理的保证，至少也是对真理的推测呢？这些个体享有——只有他们——经法律确定或被自发接受的讲同样话语的合乎规定的传统权利，他们的地位如何？医生的身份包含着能力和知识的标准、机制、系统、教育规范，确保——不是没有任何界限标志的——知识实践和试验的合法条件。它还包含着一个与其他一些个体或者群体的区分和关联的系统（分享权限、等级的归属、功能补充、信息的要求、传播和交换），这些个体或群体也有自己的区分和关联的身份（政治权力和它的代表们、法律权力、各自不同的专门机构、宗教团体，需要的话还有牧师）。医生的身份还包含着一些特征，这些特征确定它对于社会总体应履行职能的一些特点（因私人或社会多少带强制性的要求应诊，因从事一门职业，或者承担一种职能而得到承认的医生的作用；医生在这些不同情况下被公认的参与和决定的权利；要求医生担当监护、护理和保证某个集体，某个群体，某个家庭，某个个人的身体健康的情况；医生从公共或者个人的财产中所提取的数额；医生在与他所在的群体，与交给他任务的权力机构，与向他提出咨询、治疗、医治要求的病人之间通行的、明显的或者不言明的契约形

式)。一般说来,医生的身份在社会和文明所有的形式中是相当特殊的,因为它几乎从来就不是一个未经区分的或者可以相互替换的角色。医嘱不能出自随便什么人之口;它的价值,它的成效,它的治疗能力本身,或者笼统地讲,它的作为医嘱的存在与按规章确定下来的角色是不可分的,这个角色有说出医嘱的权利,因为医生要求医嘱有解除痛苦和死亡的权力。但是,我们同样清楚,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正值人的健康成为工业社会使用的经济标准之一,医生的地位在西方文明中发生了深刻变化。

b.我们还应该描述医生使用他的话语和话语可以找到其合理起源及其应用点(它的特殊的对象及证明手段)的机制所在地点。这些地点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就是医院,一个由被区分并被等级化了的医务人员进行长期、规范和系统观察;并且可以因此构成一个可计数的就医人数范围的地方;也可是私人诊所,这是一个比较偶然、比较空闲、人数极少的观察场所,但是在这里有时可以进行较长时间的观察,并清楚地掌握患者的履历和环境;还可是化验室;这是一个独立的、长期同医院分开的地方,有关人体、生命、疾病、病变的某些一般情况在这里得以确定,化验室提供一些诊断依据、演变符号、医治标准,并从事治疗的各种实验;最后是人们可以称为图书馆或者资料库的地方,它不仅包括那些在传统上被公认为有价值的书籍或论文,而且还包括全部已经发表过的、转载的报告和病历,甚至还包括大量统计信息(关于社会环境、气

候、流行病、死亡率、发病率、传染病源、职业病),这些信息可由行政管理部门,其他医生,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提供给医生。即便在此,医学话语中的这些各不相同的"场所"在19世纪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因为资料的重要性在不断地增加(而书籍或传统的权威却在降低);医院过去只是为疾病话语做补充的地方,并把这些地方的重要性和价值让给了私人诊所(保留在自然环境中的疾病在18世纪应该在它们的植物的真实性中被揭示),而今却成为进行系统和同质观察的地方,进行更广泛对比的地方,统计就医率和康复率的地方,取消个体变异的地方,简言之,成为疾病出现的地方,不再作为医生眼中展现其基本特点的特别种类,而是作为靠自己的意义测定、界限、发展机遇维持的均衡过程而出现的地方。同样,日常的医学实践在19世纪作为具有与物理学、化学或者生物学同样的试验规范的话语场所而同实验室融为一体了。

c.主体的位置也同样是由它相对于对象的各种不同范围或群体有可能占据的处境所确定:从某种明显或不明显的提问界限来看,它是提问的主体,从某种信息的程序来看,它是听的主体;而从典型特征的一览表来看,它则是看的主体,从描述典型看,它是记录的主体。主体位处最佳的感觉距离上。这个距离的边缘限界着适当的信息种子;主体利用工具性的中介,这些中介可以改变信息的范围,改变主体对间接或直接的感知层次的位置,保证它从表面层次向深度层次的过渡,使主体在肉体内部的

空间中循环流动——从明显的病症到器官，从器官到组织，最后，从组织到细胞。在这些感知的境况中，还应加上主体在信息网络中可能占据的位置（在理论教学或临床教学中；在口头交流或书写文献的体系中：作为病历、报告、统计数据、一般理论命题计划或决定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在19世纪初，医学话语的主体可能拥有的各种处境已经得到重新确定，这种重新确定是随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感知场的组成而完成的（这个场置身于深处，通过连续交替的手段表现，通过外科技术或尸体解剖方法展示，集中在病变发生地的周围），是对录音、记录、描述、分类、在数学体系中融合和统计的一些新系统的安置，是教育的新形式，信息流通和与其他理论领域（科学或哲学）及其他机制（不管它们是现行管理秩序、政治或经济的）关系的建立。

如果说在临床话语中，医生依次成为最高和直接的提问者，观察的眼睛，触摸的手指，符号的辨读器官，已经完成的描述的融入点，试验室的技术员，这是因为整个关系网络在起作用。这就是作为既是救助，又是净化的和系统的观察场所，部分是检验，部分是试验的治疗场所的收容空间与对人体——正如病理解剖学所确定的那样——感知的整套技术之间的关系；编码群体之间的关系；是直接观察范围与已经获得的信息的范围之间的关系；是作为医治者的医生角色、他的教育家角色、他在医学知识传播中的接力队员角色，以及他在社会空间中公众身

体健康负责人的角色之间的关系。无疑，作为观点、内容、形式乃至描述类型的，归纳或概率推理使用的，因果性确定、类型等的更新，简言之，作为陈述方式的更新，临床医学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新观察技术的结果，——因为尸体解剖学技术早在19世纪以前就已用于实践；也不应把它看作是研究有机体深层病源起因的结果——因为莫尔卡尼在18世纪中叶就已经实施过；也不应把它看作是这个新型的，过去曾是医疗诊所机构建立的结果，——因为这种机构早在几十年前的奥地利和意大利就出现了；更不应把它看作是把组织的概念引入毕沙的《论薄膜》中的结果。而应把它看作是在医学话语中一些不同成分关系的建立，在这些成分中，一部分涉及医生的结构，一部分涉及医生说话的机构和技术的场所，还有一部分涉及医生作为感觉、观察、描述和教育主体的位置等等。我们可以说，这个不同成分间关系的建立（在这些成分中，有一些是新的，其他则是先存在的）是由临床话语实现的，因为作为实践，是它在这些成分中建立一个完整的关系系统；而这个系统"实际上"没有给定，也没有被事先构成。而且如果临床话语有一个单位的话，如果它使用的或者它引起的陈述方式并不简单地是一系列历史偶然事件并列的结果，那是因为临床话语在不断地使用这个关系网络。

还有一点要注意。我们在发现临床话语中陈述类型的不对称性之后，没有试图用揭示形式结构、种类、逻辑

的连贯方式、推理和归纳的类型、可以在话语中使用的分析和综合的形式来减少陈述类型的这种不对称性；我们也没有想解除这一有能力为像医学陈述那样的陈述提供它们所包含的内在必然性的东西的合理结构。我们也没有想把构成的意识同基础行为或合理性的一般前景联系起来，医学进步在这个前景指引下渐渐显露出来，这些进步包括为跻身精确科学之列做出的努力，观察方法之间的密切联系，对存在于它身上的形象或幻觉的缓慢而艰难的驱除，推理系统的纯洁化。最后，我们也没有试图描述经验的起源，或各种不同医学道德的组成部分：医生们的兴趣是怎样转移的？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理论或经验模式的影响？什么样的哲学或道德主题限定了他们的思考氛围？他们应该回答什么样的问题或请求？为了摆脱传统的偏见，他们应做出什么样的努力？他们通过什么途径趋向永无止境的统一与和谐？总之，我们不把各种陈述过程的方式归结于主体的单位——这关系作为对合理性的纯创造性审定的主体，或者作为综合经验功能的主体。它既不"认识"，也不是"知识"。

在上面的分析中，陈述过程的各种不同形态不归结于某个主体的综合或统一的功能，而表现了主体的扩散。当主体使用某一种话语时，这些各不相同的形态则归结为不同的身分、位置，主体能占据或接受的立场，归结为主体言及领域的不连续性。如果这些领域是由一个关系体系连接起来，建立这个关系体系不是由与自身同一、对

任何言语都是保持沉默和在先的意识的综合活动所确定，而是由话语实践的特殊性所确定。因此，我们拒绝在话语中看到某种表达的现象——对某个在别处完成的综合文字翻译。而我们在话语中所要寻找的是适应各种主观性位置的调节范围。这样设定的话语不是思考、认识和使用话语的主体庄严进行的展示；相反，它是一个主体的扩散、连同它自身的不连续性在其中可以得到确定的总体。话语是外在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展开着一个不同位置的网络。我们刚刚指出话语形成固有对象的制度不应该由“词语”或者“事物”来确定，以此类推，现在应该承认：确定主体的陈述制度不应借助于超验主体，也不应该借助于心理主观性。

5　概念的形成[①]

也许，林内作品中描绘的概念家族（我们同样可以在李嘉图的研究或保尔—罗瓦雅尔学派的语法中看到）可以自成一个和谐总体。或许我们可以重建它形成的演绎结构。无论如何，实验值得尝试。事实上，这已尝试过多次了。相反，如果我们把范围再扩大一些，或者我们选择

---

① 关于这个题目，“医生目光”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的用法不太适宜。——作者注

语法，或经济学，或生物研究作为学科分界，我们观看其显现的概念游戏并不服从如此严格的条件：因为概念的历史不是一砖一石构造起来的建筑。应否让这种扩散停留在它的混乱无章的表层？应否从中看到一连串具有各自独特结构的概念系统，并且，这些系统只是或者在问题的永久性，或者在传统的连续性，在影响的机械论上被连接起来？我们能否找到阐述这些不同概念的连接或同时出现的规律？我们能否在它们之间找到与逻辑系统性不相同的系统？与其要把这些概念重新置于潜在的演绎结构中，不如描述它们在其中出现和流动的陈述范围的组织。

a.这种组织首先包含着连续的形式。在这些连续的形式中，有陈述系统的各种不同的排列（不论是推理的秩序，或连续蕴涵的秩序，论证推理的秩序，或描述的秩序，这些体系遵循的普遍化或渐进描述的种种模式，它们遍及的空间分配，或叙事的秩序和时间的事件在陈述的线性连续中用以分割的方式）；陈述的从属关系的各种不同类型（这些类型不总是与陈述系统的明显的连续同一或重迭：假设与证明的从属关系，判断与批评的从属关系，一般规律与特殊用法的从属关系也同样）；我们借以组合陈述群的各种不同修辞模式（描述、演绎、定义怎样彼此环结，因为它们的连续标志着某一本文的建构）。我们以古代博物学为例：因为它没有使用与16世纪相同的概念，一些旧的概念（如：种、类、符号）改变了用法，另一些

(如结构)概念出现了,还有一些概念(如:有机体)是后来形成的。但是,对于博物学来说,在17世纪被改变了的和将要支配概念出现和循环的东西,是陈述的总体布局,是它们在确定总体中的系统建立;是人们记录他们所观察东西的和他们在陈述过程中重建感知历程的方法。这是在描述,用不同的特征连接,说明特征和分类之间的关系和从属关系的游戏;是特殊观察和普遍原则的相互位置;是我们的所知、所见、所推想、我们作为可能所接受以及所假设的东西之间的关联体系。17和18世纪的博物学不简单是给"种"或者"特征"的概念下新定义并且引进了诸如"自然分类"或者"哺乳动物"等新概念的认识形式。它首先使陈述成为系统的规律总体,是从属关系、秩序和连续的必然模式总体,那些可以起概念作用的循环成分在这个总体中得到分配。

b.陈述范围的外形还包括一些共存形式。这些形式首先勾画出一个在场的范围(由此应该指所有在别处已经被提出来和作为公认真理,准确的描述,充分的推理或必要的前提被重新置于话语中的陈述;它还应指那些被批评、争论和评判过的乃至被否定排斥的陈述);在这个在场的范围中,被建立起来的关系可能属于试验的实证、逻辑的有效性、单纯的重复、经过传统和权威证实的承认、评论、隐意的研究、错误分析的范围。在普通陈述中,这些关系可能是明显的(有时甚至在专业化的陈述类型中被提出来:参照、批评的讨论)或者是不言明和转变的。

即便在此，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古典时期博物学的在场范围所服从的形式，选择标准和排斥原则都不同于阿尔德洛旺迪[①] 就在那个时期，他把看到的、观察的、转述过的千百次地从嘴送到耳中去的甚至是诗人们想像的有关魔鬼的一切都收到同一文章中。另外，我们可以描述一个与在场范围不同的伴随范围（涉及有关对象完全不同的范围并属于截然不同的话语类型的陈述。但是，这些陈述在被研究的陈述中活动，它们或者被用作类比确定，或作为一般原则和为某个推理所接受的前提，或作为可以转让给其他内容的模式，或作为一种更高一级的内涵活动，应该把人们肯定的某些命题与这种内涵相对照，并至少应使之服从这种内涵）。因而，林内和布封[②] 那个时代的博物学的伴随范围是由诸如宇宙学、地球史、哲学、神学、圣经和圣经注释、数学（指某一秩序科学非常普通的形式）的关联确定的；所有这些关联不仅把这一伴随范围同16世纪的博物学家们的话语而且同19世纪的生物学家们的话语进行对比。最后，陈述的范围还包括我们可以称之为记忆领域（它是指那些不再被接受或不再引起争议，因此不再确定某个真理的实体、有效性范围的陈述，但是这些陈述导致演变、起源、转换、连续性的和历史不连续性的关联）。因此，博物学的记忆领域，自图尔尼

① 阿尔德洛旺迪（1522—1605年），意大利植物学家。

② 布封（1707—1788年），法国博物学家。

福尔[①] 之后，即当人们把它同19世纪以后的生物学所呈现出的如此广阔、厚积、如此阐明的记忆领域进行对比时，它却显得异常狭窄，形式单调。相反，同文艺复兴时代的包括植物史和动物史的记忆领域相比，它的确定和连接似乎更好一些。因为在那时，它几乎与在场范围没有区别，它们有着同样的外延和形式，蕴含着同样的关系。

c.我们终于能够确定可被合理用于陈述的涉入程序。其实，这些程序对于所有的话语形成来说并不相同。那些在话语中被使用的（以排斥其它一切）程序，那些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关系和它们用这样的方式构成的总体使我们得以逐一说明它们。这些手段可以在重写的技术（比如使古代博物学家能够在分类图表中重写某些线性描述的技术。这些分类图表与中世纪或者文艺复兴时代建立起来的亲属关系的图表和群体，无论在规律上还是在外形上都不相同），在用多少被形式化和人工化的语言对那些（被连接在自然语言中的）陈述的记录方法中（我们在林内和阿当松那里发现这些方法的策划，甚至发现它在某一点上的成功）能够有所显现。是在质量和（与某些纯粹感知的措施和描述有关的）有相互关联的表达中对数的陈述的翻译方式；是用于增加陈述近似性并寻求其精确性的方法（自图尔尼福尔以来，根据形式、数量、布

① 图尔尼福尔（1656—1708年）：法国植物学家。

局和成分的大小进行的结构分析可获得描述陈述的更大、特别是更永久的近似性)；是用于重新界限——通过扩展或者内缩的方式——陈述有效性的范围的方法(具有结构特征的陈述，原被界限在从图尔尼福尔到林内之间，后来又扩大到从布封到朱西约[1])，是用来把某一应用范围的陈述类型转让给另一陈述类型的方法(如同把植物的特征转移到有机体内部成分)；是对那些由于以前曾被提出而存在下来的极其分散的命题的分类方法，或者是重新分配、已经相互联系在一起但被重新组合在一个新系统的总体中的陈述方法(因此，阿当松重新采用自然的特征化。而这些自然的特征化得以在他之前或者被他本人在某个人工描述的总体中完成，是因为他使用的某种抽象连接为这种描述提供了一个预先图式)。

上述这些我们要分析的成分是各不相同的。其中一些构成形式结构的规律，另一些则构成修辞的习惯；一些确定文本的内形，另一些则确定不同文本之间的关联和干扰的方式，其中一些代表了特定时代的特征，另一些则具有遥远的起源和特别重要的编年学意义。但是，特别属于话语形成并能够界限那些哪怕是不相称的、但对话语形成是特殊的概念群的东西，就是这些不同的成分用以相互关联的方法，比如：描述或叙事布局的方法用以与重写技术联系的方法；记忆范围与支配某一本文的陈述

---

① 朱西约(1699—1777年)，法国植物学家。

等级和从属关系形式联系的方法，近似性和陈述发展模式同已被提出的陈述的批评、评论、解释模式联系的方法等等。正是这个关系网络构成概念形成的体系。

对这种体系的描述不可能等同于对概念本身直接和近似的描述。这并不是把这些概念变成完整的记录，建立它们可能共有的特征，对它们进行分类，测量它们内部一致性或者检验它们彼此的相容性。一篇孤立的文章、一部个人作品或特定时期的科学的概念筑构都不是我们的分析对象。关于这个明显的概念游戏，我们暂且不谈。但我们试图确定陈述根据什么模式（建立体系的、同时聚合的、线性或相互变化的模式），可以在某一话语类型中相互联系；我们试图由此测定陈述的循环成分如何得以再次出现、分解、重新组合、获取外延或规定性、在新的逻辑结构内部重被使用，又反过来获得新的语义内涵；在它们之间构成部分结构。这些模式使我们能够描述的——不是概念内部构成的规律，不是人在精神中的进化和个体的起源——而是它们在文章、书籍和作品中的匿名扩散。这种扩散标志着某个话语的类型，并在概念之间确定演绎、派生、一致，而且还有不相容性交错、替代、排斥、相互转化、位移等等形式。因此，这样的分析在可说是前概念的层次上分析概念在其中可以共存的范围和这一范围所遵循的规律。

为了详细说明“前概念”一词的涵意，我将重新使用在《词与物》一书中已经研究过的标志着 17 世纪到 18 世

纪的普通语法特征的四种“理论模式”。这四种理论模式——赋予、连接、指定和派生——并不指古典语法学家们实际应用过的概念，它们也不能超越不同的语法作品，重建某种更加普遍、更加抽象、更加贫乏的体系，但这种体系由此会发现这些表面对立的不同体系的深刻相容性。它们得以描述：

1. 不同的语法分析如何得到理顺、展开；在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分析之间，在关于语音的分析和关于句法的分析之间，在关于原始语言的分析和针对人工语言的分析之间，可能有什么样的连续形式？这些不同的可能秩序被从属关联所规定，我们可以在赋予、连接、指定和派生的理论之间测定这些关系。

2. 普通语法如何确定有效性的范围（根据什么标准得以谈论一个命题的真假）；普通语法如何构成规范性的范围（根据什么标准排斥某些不适合话语的或非本质的、次要的或非科学的陈述）；普通语法如何构成一个现实性的范围（获取理解的途径，规定现实的问题，确定作废不用的概念和断言）。

3. 普通语法同算学（同笛卡尔的和后笛卡尔的代数，同秩序的普通科学的计划），同表象的哲学分析和符号理论的关系，同博物学和特征化与生物分类学的问题、同财产分析和度量、交换的专断符号问题保持什么关系：通过测定这些关系，我们可以确定确保概念从一个范围向另

一个范围流通、转让和变化、概念形式的变化或者它们的应用场改变的途径。由上述四个理论环节构成的网络并不确定语法学家们使用过的所有概念的逻辑结构;它勾画这些概念形成的合法空间。

4. 诸如动词“是”être、系词、词根和词尾等(这些属于赋予的理论模式)各种不同概念,语音成分、字母、名字、名词和形容词的种种概念(属于连接的理论模式),专有名词、普通名词、指示词、名词词根、音节或表现音质的各种概念(它们属于确指的理论环节),原始语言和派生语言、隐喻和形象、诗的语言的各种概念(它们属于派生的理论环节),它们是如何同时或连续成为可能(以交替选择、变化或替代的形式)。

如此突出的“前概念”的层次,既不归结于理想性的前景,也不归结于抽象化的经验起源。一方面,这不是由创造行为——在这起始点上,它避开了任何编年史的切入——提出、发现或建立的理想性的范围。它不是历史范围内不尽的先天的知识,它既因为要回避每一起始、每一重发而归隐,又因为永远不可能在明显的整体性中与自身同时而后退。其实,我们只是在话语本身的层次上提出问题,话语不再是外部的表现,而是概念出现的地点;我们没有把话语的常数同概念的理想结构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在话语内在的规律性的基础上描述概念的网络。我们没有让陈述的多样性服从于概念的一致性并让它服从于后—历史的理想性,我们建立的是相反的系统:

我们把非矛盾的纯目的重新置于一个概念的相容性和不相容性互混交错的网络中。而我们把这个复杂体归结于某些说明话语实践特点的规律。这样,没有必要求助于无限倒退的起源和无穷的范围的主题:在话语实践中,规律总体的结构,尽管构成事件不比确定一种表述或发现容易,却可以在历史成分中得到确定。因此,如果它难以穷尽,那正是因为这个可被完美描述的体系阐述的是概念可观的游戏和相当数量的转换,这些转换同时影响这些概念及其关系。如此描述的"前概念",不是要呈现一个来自历史深处并贯穿着历史的范围,恰恰相反,它是在最"表面"的层次(话语的层次)上实际应用的规律总体。

我们看到这并不涉及抽象化的起源,这个起源试图重新找回能构建这些抽象化的运作系统:全面的直观对特殊情况的发现,对想像主题的排除,理论或技术障碍的碰撞,对传统模式的连续借用,确定适当的形式结构等等。在我们提出的这种分析中,形成的规律不存在于"思想"或个体的意识中,而存在于话语本身。因此,它们以一种统一的匿名形式强加给所有试图在这话语场中说话的个体身上。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规律对无论什么范围都普遍有效。我们总是在确定的话语范围内描述这些规律,而且我们在一开始就不承认外延的无限可能性。我们至多可以用系统比较的方式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对概念的形成规律进行比较。因此,我们曾试图指出这些规律的总体在古典时期的普通语法、博物学

和财产的分析中可能表现出来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对于这些范围中的每一个，这些规律的总体都是特殊的，足以标志特殊和极个体化的话语形成。但是，它们表现出的类比也足以使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形成构成一个更加广泛、层次更高的话语群。总之，概念的形成规律，无论它们具有什么样的普遍性，都不是被置于历史或在厚重的整体习惯中沉积由个体进行运作的结果。它们没有构建某种模糊研究的枯燥图表，在这种研究中，概念由于错觉、偏见、谬误、传统而被揭示出来。前概念范围使话语的规律性和局限性显现出来，这些规律性和局限性又使概念的异质多样性成为可能，随后超出当人们写观念史时自愿针对的这些丰富多彩的主题、信仰和表象。

为了分析对象的形成规律，我们已经看到既不应该让它们扎根于诸物，也不应该把它们归结于词的范围。为了分析陈述类型的形成，则既不应把它们归结于正在认识的主体，也不应把它们归结于心理上的个性。同样，为了分析概念的形成，既不应把它们归结于理想性的范围，也不应归结于观念的经验性发展。

6　策略的形成

经济学、医学、语法、生物科学这些话语导致某些概念的组织、对象的聚合、陈述类型的出现，它们又根据自

身的一致性、严密性和稳定性的程度构成一些主题或理论：在18世纪的语法中，有一种其他一切语言都由之派生，并保留有时可辨读的记忆的主题；在19世纪的语文学中，在所有印一欧语言中，存在某种亲缘关系——演变或相似关系——和作为它们共同出发点的方言的理论。在18世纪则有在时间中展示自然连续性并且解释生物分类表上现存空白的主题，在重农主义者那里，则是从农业生产出发的财产流通的理论。不论这些主题和理论形式水平如何，我们将按惯例称之为"策略"。问题是要弄清这些策略在历史中如何被分配，这是否是连接它们、使之成为不可避免并准确地把它们依次召到各自的位置上、使之成为同一问题的连续结果的必然性？或者是在各种起源、影响、发现、思辨氛围和由个体的耐心或天才用于某些多少已确定总体理论模式的观点之间的偶然碰撞？我们至少有可能在它们之间找到某种规律性并规定它们形成的共同体系。

对这些策略进行细节分析相当困难。原因很简单，在我摸索着进行——特别是在开始我没有足够注意方法——分析的上述话语领域的过程中，每次都是根据它们固有的特征描述话语在其所有维度上的形成：因此，每次都应该规定对象、陈述模式、概念、理论选择等的形成规律。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分析的难点和最引人注目的东西每次都不相同。在《疯狂史》一书中，我涉及其理论选择点很容易测定的话语形成；它的概念体系的

数量不多，也不复杂；它的陈述制度最终也相当一致和单一。相反，它的对象则混乱复杂，这一对象的完整整体的出现成了难题。因此，为了在精神病话语的特殊性中测定它的总体，就应先描述这些对象的形成。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研究重点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医学话语陈述形式被改变的方式。因此，分析偏重于结构、机构设置的场所、说话主体介入的环境和方式，而不是概念的体系或理论选择的形成。而在《词与物》中，我所研究的基本内容是针对概念的网络和它们的形成规律（相同或相异的），正如我们在普通语法、博物学和财产分析中对它们进行测定的那样。至于策略的选择，它们的位置和它们的内涵都已经被指示出来（比如，我们谈到的林内、布封，或重农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但对它们的测定还很粗略，而且分析尚未集中在它们的形成上。可以说，理论选择的分析还刚刚起步，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人们的关注。

目前，完全可能指出研究的方向。这些方向可以概括如下：

1.确定话语的可能衍射点。首先，它们标志着不相容点：两个对象，或者两种陈述类型，或者两个概念可以出现在同一话语的形成中，而不用——冒着明显的矛盾或不合逻辑的风险——进入同一陈述系统。其次，它们标志着相等点：互不相容的两个成分按同一方式和相同

的规律组合；它们出现的条件是相同的；它们位于同一层次，但是它们没有构成一致性纯粹简单的缺陷，而是形成一种交替：即使依据编年学，它们并不同时出现，即便它们不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即便它们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在实际的陈述群体中表象，它们仍然以“或者……或者……”的形式出现。最后，它们标志着某种分类的连接点：在这些既相等又不相容的成分的基础上，派生出对象、陈述形式、概念的一致系统（可能的话，在每个系统中又产生新的不相容点）。换句话说，在前面的几个层次上研究的扩散并不简单地构成一些距离、不同一性、不连续系统、空白；它们有时形成话语的次总体——人们对之常常会给予特别的重视，就如同它们是那些更广泛的（“理论”、“概念”、“主题”）话语总体的直接单位和原始材料。比如，在对 18 世纪的财产分析进行分析时，我们不认为这一分析是（通过同时组合或者年代连续的途径得出的）货币、生活必需品的交换、价值和价格、或者地租等不同概念形成的结果；也不认为这一分析是建立在继承了贝迪衣钵的冈蒂庸[1] 的思想上，建立在重农主义者系统同功利主义者观念的对比上。我们情愿把它作为分配单位来描述，因为它打开了一个可能的选择范围，并使那些各不相同、相互排斥的结构或者一同出现或者轮流出现。

2. 然而，并不是所有这些可能的作用都确实得以发

---

① 冈蒂庸(1680—1733 年)，荷兰银行家，经济学家，人口统计学家。

挥。因为,依然存在着一些局部的总体、区域的不相容性、本来有可能显露却并未显示出来的一致的结构。为了说明所有本来可能实现的选择中已经实现的选择(仅指它们),应该对决定的特殊要求进行描述。在它们中间,我们描述的首先应是研究的话语相对于与它同时的,并在它周围的话语所起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对这个话语所属的话语群的经济进行探讨。其实,这个话语可以起到某一形式体系的作用,其他的话语只是这一体系在各种不同的语义场中的应用;相反,它还可以起到某一具体模式的作用,并把这一模式带给其他属于某一更高的抽象层次的话语(因此,17 和 18 世纪的普通语法表现为表象与符号的一般理论的特殊模式)。被研究的话语还可能存在于它同其他一些话语的类比、对立或者补充的关系中(例如:在古典主义时期,财产分析和博物学之间存在类比关系;前者是需要和欲望的代表,后者是感知和判断的代表;我们还可以这样说:作为自然特征理论的博物学与作为习俗符号理论的普通语法是对立的;而这两种理论作为质量符号研究与作为度量的数量符号研究的财产分析也是对立的;总之,每一种理论都促进代表性符号的三种补充作用中的一种作用:指定、分类、交换)。我们终于可以在数种话语之间描述相互限制的关系,这些关系中的每一种关系都通过对它的范围、方法、工具和使用范围的分化表现其特殊性的不同标记(对于精神病学和器质医学也一样,二者在 18 世纪末以前彼此尚未真

正分开，而在这之后，却构成了一段距离，从而泾渭分明）。整个这种关系的作用构成了规定原则，它可以在特定话语的内部允许或排斥某种数量的陈述：这里存在着概念的分类、陈述的环接、可能的对象的组合和结构（在它们特有的形成规律的层次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它们不在场），但是它们却被某个属于更高层次并具有更广泛外延的话语群体所排斥。因此，一个话语的形成不能完全占据它的对象、陈述、概念等诸种体系有权利提供的一切可能的空间，它基本上是空白的，而这个空白是由话语的策略选择的形成体系所造成。由此可知，一个特定话语的形成，当它在一个新的话语群中被重新采用、安排和解析时，可以揭示一些新的可能性（由此，在对科学话语现时的安排中，保尔—罗瓦雅尔学派的语法或林内的生物分类法都可释放一些成分，这些成分对于它们既是内在的，又是从未出现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可能保持不言明的沉默内容，可能在没有说出的情况下说出，而且可能在明白的陈述下面构成某种更为基本的次话语，而它现在终于得以重见光明，这涉及一种在排斥和选择的可能性的原则中发生的变化；一种由于在新的话语群中的介入引起的变化。

3.对实际进行的理论选择的规定还属于另一种要求。这种要求首先标志着被研究话语在某一非话语实践的范围中应行使的功能。因此，普通语法在教育实践中发挥了作用；而财产分析则更加明显更为重要地，不仅在

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中，而且在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刚刚概念化和理论化的日常实践中，在作为古典时期标志的社会和政治斗争中发挥过自己的作用；这种要求还包括话语的适应制度和过程。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无疑也会在许多其他的社会中），话语的特性——当然兼指说话的权利、理解的能力、合法和直接地进入已被提出的陈述库。最后还有将这一话语投入到一些决定、制度或者实践中的能力——事实上是保留给一个确定的个体群的（有时甚至以规则的方式）。在我们熟知的 16 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的话语从来就不是共同的话语（并不比医学话语或者文学话语好多少，尽管方式不同）。最后，这种要求是由相对于话语的欲望的可能位置标志的：事实上，话语可以成为幻觉表演的地方作为象征化的成分，禁忌的形式，派生满足的工具（这种与欲望发生关系的可能性不单是话语作诗歌、小说或想像练习的事实：关于财产、语言、自然、精神病、生与死，可能还关于许多其他可能更加抽象东西的话语，可以针对欲望占据那些明确规定的位置）。总之，对这种要求的分析应该指出无论话语同欲望之间的关系，还是这一关系的适应程序，或者是它在非话语实践中所起的作用都不外在于它的统一、特征和形成规律。它们都不是与这种要求的纯粹、中性、永恒和沉默的形式重迭的，抑制这种要求并使改宗话语在它的位置讲话的干扰成分，而恰恰是一些组成成分。

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在话语形成中展开的不同策略的

形成体系，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指出这些策略如何从同一种关系游戏中派生出来（尽管有时它们的差异极大，尽管它们扩散在时间中），话语的形成将得以个体化。比如：17和18世纪的财产分析表现了既可以形成柯尔培尔[①]的重商主义理论，又可以形成冈蒂庸的"新重商主义"理论体系，劳埃[②]和帕里斯—迪韦尔内的策略，重农主义和功利主义选择的特点。而且，如果我们能够描述经济话语的种种衍射点相互间如何派生、沟通和包含的（关于价格的选择点如何从关于价值概念的决定中派生出来）；已经做出的选择如何取决于经济话语在其中出现的总话语群（侧重于货币—符号选择相对于语言、代表分析、算学和顺序科学的理论是与财产分析所占据的位置相连）；这些选择如何与正在上升的资本主义实践中的经济话语所占有的功能和在资产阶级看来经济话语成为其对象的适应过程相连接；这些选择又如何与经济话语在实现利益和欲望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联系，那我们就等于确定了这个体系。古典时期的经济话语是通过内在于话语系统化、与它外部的其他话语、占有、利益和欲望的非话语的实践范围建立关联的经常方式确定的。

应该指出，这样描述的策略并不扎根于话语内的某种既是初步的，又是基本的沉默选择的深处。所有这些我们

---

① 柯尔培尔（1619—1683年），法国政治家。

② 劳埃（1671—1729年），英格兰金融家。

要描述的陈述群不是本来有可能以各种词语来兑现的世界观的表现，也不是隐藏在某种理论借口之下的利益的虚伪表现。因为，古典时期博物学与在明显的历史以前的模糊状态中，静止的、有序的、被分类并从一开始就被明智地奉献给了分类划分的宇宙观（林内的宇宙观）和对以自身的坎坷经历的积沉继承时间，并向着某种演变可能性开放的自然的尚且模糊的感觉之间的对立是两回事。同样，财产分析与已经成为土地占有者、借助于重农主义者的呼声表达自己的经济或政治要求的资产阶级同由功利主义者充当代言人、要求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措施的商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对抗也是两回事。无论是财产分析，还是博物学，如果我们站在它们的存在、统一、永久性以及转换的层次上研究它们的话，那么，它们是不会被看作各种选择的总和。相反，这些选择应该被描述为研究话语对象（界限它们、重新组合或者分离它们、联结它们并让它们相互派生），安排陈述形式（选择它们、让它们就位、建立体系、把它们组成大的修辞单位），使用概念（赋予它们使用规则，把它们引进区域的一致性中，并由此建立概念的游戏）的体系上的不同方式。这些选择不是话语的根源（在话语中，这些选择可能被提前确定并以某种几乎看不见的形式预示）；它们是被调节的（可原原本本描述的）使用话语可能性的方式。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些策略作为某种次要成分来分析，这些成分可能会被强加在理所当然有可能独立于它们的话语的合理性上。根本不存在（或者至少对于

我们在此阐述其可能性的历史描述来说，我们不能承认）一种既是最后又是超越时间的话语的理想类型，而这种话语类型又被外在起源的选择歪曲、搅乱、抑制，被推向可能极其遥远的未来。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假设：比如在自然或者经济上存在着两个相互重迭、混乱复杂的话语：其中一个循序渐进、积累收获并逐渐完善（真实的话语，但它的朴实性只存在于历史的目的论的边缘）；另一个则总是被破坏，总是重新开始，总是同自身不断决裂，并由异质的成分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遗弃在过去的意见话语）。如果撇开物种不变论，根本不存在一种可能是精确的自然生物分类法；如果没有商业资产阶级的嗜好和幻觉，也根本不存在着可能是真实的交换和功利的经济。而实际存在的并构成历史形态的古典主义生物分类法或者财产分析，包含着一个对象、陈述、概念和理论选择的被连接的但是可以分离的体系。因此，正像我们不能把对象的形成归结于词与物；把陈述的形成归结于认识的纯粹形式和心理主体；把概念的形成归结于理想性结构和思想的连续性一样，我们也不应该把理论选择的形成归结于某个基本**计划**，或**意见**的次要作用。

7　意见与结论

现在应该把前面分析中的一些零散迹象重新归纳，

回答在前面分析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且首先考虑会出现的异议，因为此项研究的悖论将会很快出现。

开始，我就曾对这些预建的单位提出质疑，按照传统，人们根据这些单位来强调话语的不确定、单一和膨胀的范围。这并不是说要对这些单位的整个价值提出疑问，或者要禁止使用它们，而是要指出需要制订一个理论以便准确地确定它们。然而——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前面的分析显得成问题——是否有必要在这些也许确实有点不确定的单位之上叠放另一个更不可见的、更加抽象的，当然肯定是更会产生异议的单位的种类呢？即便在这些单位的历史界限和它们的结构的特殊性都相当容易发现的情况下（普通语法和博物学可以为证），这些话语的形成较之书籍或者作品，会提出更困难的测定问题。那么，为什么在对那些看起来最明显的聚合表示疑问之时，还要进行如此令人生疑的聚合呢？希望发现什么样的新领域？至今存在的隐秘或不表露的关系是什么？在历史学家们的视线之外，还存在着什么样的转换？简言之，还能给予这些新分析以怎样的有效描述？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试图在以后的篇幅中予以解答。但是现在应该立即回答这样一个提问，对引出下述分析来说，它是第一个问题，也是结束前面分析的最后一个问题，对于这些我曾试图确定的话语的形成，我们是否真有权言及单位？提出的分割是否能够把一些整体个体化？这样发现的或者建立起来的单位的性质是什么呢？

我们是以这样一个观察为出发点的：随着诸如临床医学、或者政治经济学、或者博物学的话语单位，我们接触到了分散的成分。不过，这种分散本身——包括它的空白、它的裂缝、它的混杂、它的重迭、它的不相容性、它的替换和取代——的特殊性是可以描述的，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对象、陈述行为、概念、理论的选择等借以形成的特殊规律。因此，如果说有单位存在的话，那么，它不存在于已形成成分的可见和横向的一致性中；单位存在于能够产生并支配成分的形成的体系之内。但是，我们以什么名义来谈论单位和体系呢？怎样证明我们已很好地使话语整体个体化呢？与此同时，我们却在对象、陈述行为、概念和选择等似乎不可减缩的多样性的背后，十分冒昧地将一堆数量不少而且分散，又彼此各不同的成分投入进来，与此同时，我们又把这些成分分配在连接的方式尚未确定的四个不同群中。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说所有这些从话语的对象、陈述行为、概念和策略的背后揭示出来的成分确保着同作品和书籍同样个体性的整体的存在呢？

1. 我们已经看到——显然没有必要再重复：当我们言及形成的体系时，我们理解的不仅是异质成分的并列、共存或者相互影响（如：机构、技术、社会团体、感觉器官、各种话语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有由话语的实践——以确定的形成——建立起的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这四个体系或者称为四个关系网络，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

四个关系网络又怎样能够为自身确定一个形成的统一体系呢?

这是因为这样确定的不同的层次不是互相独立的。我们已经指出:策略的选择并不直接从属于这样或那样的说话主体的世界观或者从首要利益中产生,而是因为策略选择的可能性本身是由概念作用中的分歧点确定的;我们还指出过,概念不在思想的近似的模糊的生动的基础上直接形成,而是以陈述之间的并存形式为出发点。至于陈述行为方式,我们也已经看到,它们是以主体同它所言及的对象的范围相对而言所据的位置为基础来描述的。以这种方式,存在着一个从属垂直体系,即:所有主体的位置、所有陈述间并存的类型、所有话语的策略并不都是可能的,只有被前面的层次允许的那些才是可能的。比如支配18世纪的博物学对象的形成的体系(作为带有特征因而是可分类性的个体性,作为可变的结构成分,作为可见的和可分析的表层,作为连续的和有规律性的差异的范围),某些陈述行为的方式被排斥了(如符号的辨读),而其他的则被容纳了(如根据确定的编码进行描述);再以话语主体能够占据的不同位置为例(作为不同工具媒介的直观主体,作为从感知多样性中抽取只属于结构的成分的主体,作为用编码化的词汇进行记录的主体等等),一些陈述间的并存被排斥了(如对已说出的东西进行学术上的复活,或者对神化了的本文的解释性评论),相反,还有一些并存是可能的或者被吸取(如完全或

者部分相似的陈述列入分类的图表中)。因此,层次在彼此之间不是自由的,也不是根据一种没有界限的自律性展开的,因为,从对象原初的区分到话语的策略的形成,存在着整套关系等级。

但是,这些关系也同样在逆向中建立起来。低级的层次不独立于比它们高的层次。理论选择在实现它们的陈述中排斥或者包容某些概念的形成,就是说某些陈述间的并存形式:所以在重农主义者的本文中,不可能找到与功利主义分析相同的数据和度量的归纳方式。这绝不是因为重农主义者的选择能够改变确保18世纪经济概念形成规则的整体,而是它能够使之发挥作用或排斥这样或那样的规则,从而使那些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出现的概念(如净利的概念)显示出来。并不是理论的选择调节了概念的形成,而是它通过概念形成的特殊规则的媒介和它同这一层次保持关系的作用产生出概念。

2.这些形成的体系不应被看作是一些由外界强加给话语的,并且可以一劳永逸地确定其特征和可能性的固定整体和静止形成。这根本不是源于人类思维或者它们的表现手段的束缚;也不是在机构,或者社会关系,或者经济的层次上形成的规定性被迫出现在话语的表层上。这些体系——我们已经再三说明了——存在于话语本身中;或者说(因为它不涉及到话语的内在性和它可能包含的东西,而是涉及到话语存在的特殊性和它的条件)存在

于话语的边界,存在于使它如此存在的特殊规则得以确定的界限中。因此,对于形成的体系应理解为是一个像规则那样运作的复杂关系网络,因为,这个关系网络规定着在话语实践中应加以建立关系的东西,以便使话语实践表示这样或那样的对象,以便使话语使这样或那样的陈述行为起作用,使用这样或那样的概念,建立这样或那样的策略。因此,在体系的特殊个体性中确定形成的系统就意味着以某个实践的规则性使某个陈述群具有特征。

作为话语实践规律的整体,形成的体系于时间并非无关。形成的体系不收罗所有可能出现在陈述古旧系统中某起点上的东西,这起点可能既是起始、起源,又是基础、原则体系,实际历史的曲折变化必然以此为出发点而展开。形成的体系所勾划出的,是必定会发挥作用的规则体系,以使某对象发生转换、某个新的陈述行为出现、某概念的提出、隐喻化或者传入某策略的改变——,而又不因此而中断属于同一话语形成体系所勾划的,是必定会发挥作用的规则体系,以使其他话语中的变化(在其他的实践中、在机构中、在社会关系中、在经济过程中)能够出现在既定话语的内部,从而构成新的对象,引发出新的策略和新的陈述行为或新的概念。因此,话语的形式不起这样一种形态的作用,使时间停滞并将它冻结几十年或几百年;它确定一种纯属时间过程的规律性;它提出话语事件的体系与其他事件、转换、变化和过程的体系之间

的连接原则。它完全不是超越时间的形式，而是数个时间体系间的沟通模式。

形成的系统的这种活动性表现为两种方式。首先，在建立起关系的各成分的层次上：事实上，这些成分能够经受一些内在的变动，这些变动被纳入了话语的实践而话语实践规律性的一般形式并不受影响；因此，在整个19世纪中，犯罪法律学、人口压力、劳动力需求、救济形式、拘留的法律地位和条件等等，一直在发生变化，然而，精神病的话语实践却继续在这些成分之间建立同一种关系整体；以至这系统保留了自己个体性的特征；通过形成的这些同样规律，一些新的对象出现了（个体的新类型、行为的新分类均以病理为标志），一些新的陈述行为得以使用（数量统计和统计计算），一些新的概念显现了（蜕化的、反常的和神经官能症的概念），当然一些新的理论结构也建立起来。但是，话语实践也反过来改变着它将它们之间建立起关系的那些领域。这些话语实践虽然建立了那些只能在它们自己的层次上才可加以分析的特殊关系，这些关系却并不只在惟一一种话语中发挥作用：这些关系也出现在它们加以连接的成分中。例如，一旦临床话语将医院范围同实验室建立起关系，医院范围就不是处于不变的状态：医院的拨款手续、医生在医院中的地位、医院的观点的作用、在医院所能进行的分析层次，都必然发生变化。

3.如果我们把这个术语理解为本文（或者话语），如

果通过它们的语汇、它们的句法、它们的逻辑结构或者它们的修辞结构所显示出来的话，那么，我们描述为“形成的体系”这样的东西并不构成话语的终极层。分析处在这个明显的层次之内，即完成的结构。这层次之内：分析在确定话语中的对象分布原则时并不阐明它们所有的接合，细微的结构，以及它们内在的再分割；分析在寻找概念的扩散规律时，并不阐明所有的产生过程或者这些过程从中出现的所有演绎链；如果分析研究的是陈述行为的方式，那么它既不会对文体，也不会对句子的连贯提出疑问；总之，分析对本文的最终完成留在空白点中。但是，我们应该十分清楚，如果说同这种最后的结构相比，分析始终退避在后的话，不是因为它要避开话语去求助于思维无声的劳动，也不是为了避开体系去揭示那些论文、企图、谬误和重复的所谓“生动”的混乱。

在这一点上，话语形成的分析与许多习惯的描述相对立。事实上，人们习惯于认为话语和它们的系统的布局只是最终的状态，只是一种长期曲折的形成在最后阶段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和思维，经验的实验和种类，亲身经历和理想的必然性，事件的偶然性和形式约束的作用都涉及到了。在体系的可见外表的背后，可料想到混乱的丰富的不确定性；而在话语的狭窄的表层的下面，是部分沉静的整块变化。即：某种不属于体系秩序的“前体系”，某个属于本质沉默的“前话语”。话语和体系只产生——一致地——在这一巨大的储存顶端。不过，

这里所分析的，当然不是话语的终级状态；而是使体系最后的形式成为可能的体系；是前终极状态的规律性。与这个前终极状态相比，最终的状态远不能构成体系的诞生地，它更多的是由自身的变种所确定的。在这个完成的体系的后面形成的分析所发现的，不是沸腾的生活本身，不是尚未捕捉到的生活，而是分类的巨大厚度、多种关系的紧缩整体。此外，这些关系虽然不是本文的网络本身，它们在本质上并非同话语无关。我们完全可称它们为“前话语”，但只是在承认这个前话语仍是话语的条件下，就是说，它们并不细述某种思维、或者某种意识、或者表达的整体，——也许从来不是完全必要地记述在话语中——但是它们标志着话语某些层次，确定着某些规则；话语，作为特殊的实践，又将这些规则现时化。因此，我们并不设法从本文进入思维、从闲聊转而沉默、由表及里、从空间扩散到瞬间的纯粹默想，从表面的多样性到深层的同一性。我们始终停留在话语的范围中。

第三章

陈述和档案

1　陈述的确定

我认为，人们现在已经接受了这种风险；并且十分愿意为了确定话语的广阔表层而对这些比较陌生、比较遥远的形态给予假定，我把这些形态称作话语的形成；我认为人们已经把书籍和作品之类的传统单位束之高阁，尽管不是永久的，而只是暂时地出于方法上的考虑；我认为人们已不再把话语的建构规律（而是形式结构），或者说话主体的处境（标志这一处境的是语境和心理核）看作是一致性的原则；已不再把话语归结于某种经验的原始土壤，或者某种认识的**先天的知识**的审定；而是在话语的本身探寻它的形成的规律。我认为人们同意对诸如对象出现的、陈述方式出现和分配的、观念就位和扩散的、策略选择的展开的系统进行长期的研究。我想人们宁愿建构一些具有如此抽象、如此有争议的单位，也不愿意接受如果不是为了不可怀疑的自明性，至少也是为了一个几乎可以感知的熟稔而确定的单位。

然而，至此，我究竟讲了些什么？什么是我调查的对象？它存在于我描述什么样的意图中？“陈述”——既存在于这种不连续性中，这种不连续性把它们从所有的形式中释放出来，因为在这些形式中，我们轻而易举地承认它们是被这些形式采用的；又存在于话语无限的、表面上无形的普遍范围中。不过，为陈述下这样一个初步定义，我是十分谨慎的。我没有试图随着我的进展去建立一个陈述定义以证明我幼稚的出发点。更有甚者——无疑这将是漫不经心的必然后果——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途中改变方向；有没有用另一种研究替代最初的视野；在分析“对象”或者“概念”，尤其是分析“策略”时，我说的是否还是陈述；我借以标志话语的形成的那四个规律的整体是否能够准确地限定陈述群。总之，我相信我没有逐渐把握“话语”一词如此模糊的意义，而是扩展它的意义：时而是所有陈述的整体范围，时而是可个体化的陈述群，时而又是阐述一些陈述的被调节的实践，而且话语这个本该成为陈述的界限和外表的词随着我的分析或者分析应用点的转变，随着陈述本身从我的视野中消失，我不曾使之发生变化吗？

因此，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从陈述的根源追寻它的定义。从而验证这一定义在前面描述中的使用是否正确；验证话语形成的分析是否确实涉及了陈述。

我反复使用陈述这个术语，或是为了言及（有关个体或者特殊事件的）某个“陈述群”，或是为了将陈述和可能

是“话语”的这些总体进行对比(如同部分与整体的区别)。乍看起来,陈述是作为一个最差的、不可分解的、本身可能被孤立并可能同其他与之相似的成分一起进入某种关系游戏中的成分而出现的。陈述是一个没有表面的点,但是我们可以在分配形式和集合的特殊形式中测定它。陈述是在它充当构成成分的某个组织表层上出现的颗粒。陈述是话语的原子。

然而,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如果说陈述确实是话语的基本单位,那么它又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其明显特征是什么?我们应该接受的陈述的界限是什么?这个单位与逻辑学家用命题的术语确定的单位,与语法学家用句子标志的单位,与“分析学家”试图以言语行为测定的单位是否一致?在所有这些语言研究已经揭示出来的,而它们的理论还经常是远未完成的,它们提出的问题还难以严格地界限它们的单位之间,陈述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我不认为陈述存在的必然和充足的条件是某一确定命题结构的在场,我也不认为我们只有在命题存在时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谈论陈述。事实上,我们能够拥有两种隶属于截然不同话语群的绝然不同的陈述。在这里我们只能发现一个可能具有同一价值、服从于同一构成规律的整体,并包含同样使用可能性的命题。“没有人听见”和“确实没有人听见”这两句话从逻辑上看是难以分辨的,而且不能被看作是两个不同的命题。然而,作为陈述,这两种表达既不相等,也不可相互替代。它们在

话语方面，不能够处于相同的位置，准确地讲，也不属于相同的陈述群。如果我们在某一部小说的第一行读到“没有人听见”这种格式时，我们就会知道，它指的是直至新的命令发出为止，由作者或是由某一个人物（高声喊叫或是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完成的观察。如果是第二种格式：“确实没有人听见”，我们这时只能够局限于某种陈述的游戏，这种陈述的游戏构成内心的独白、无声的讨论、自我观察、或者对话的残言碎语、问题和答案的整体。在这两种情况下，命题的结构相同，但是陈述行为的特点却大不相同。相反，也可能存在着复杂和重叠的命题形式，或者，与其相反，在我们明显接触到一个简单、完整和自律的陈述的地方（尽管它属于某个其他陈述的总体），存在着不完整和未完成的命题，我们知道这样的例子：“法国现任国王是秃头”（按逻辑学的观点，这句话只有在如果我们在单一陈述的种类中识别出两个不同的命题，而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对其本身来说是真实或虚伪的情况下才能被分析），或者像“我撒谎”这个命题的例子，这个命题只有在比它低的层次的断定关系中才可能是真实的。得以确定一个命题的同一性，在一种表达单位中确区分出多种命题，标志它的自律性或它的完备性的标准不能用于描述一个陈述的特殊单位。

句子又会怎么样呢？我们难道不应承认句子与陈述等同吗？在任何存在着语法上可分离的句子的地方，我们都承认存在着独立的陈述；然而，与其相反，当我们接

触到句子下面构成成分的层次时，我们就不能再言及陈述。那种为了反对这种相等性而宣称一些陈述在典型的主语——系词——谓语形式之外，在简单的名词语义段（如“这个人”!）的形式之外，或者在副词（“好极了”），或者人称代词（“你们”）的形式之外可以被组合是徒劳的。因为就连语法学家们自己在这样的表达中也承认独立句，尽管这些独立句是在主语—谓语的模式的基础上通过某个转换的体系而获得的。更有甚者，语法学家们赋予那些没有被正确构成的语言成分的整体以“可接受”的句子的结构，以便它们成为可解释的；他们反过来又赋予可解释的整体以语法句子的结构，却只要求它们正确地组合起来。就句子如此广泛的——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如此从宽的——定义而言，我们实难看出怎样识别那些可能不是陈述的句子，或者不是句子的陈述。

然而，这种相等性还远远不是完全的。况且指出那些不符合句子语言结构的陈述还是相当容易的。当我们在一部拉丁语语法书中发现一组排成一行的词，如：amo, amas, amat 时，我们接触到的不是一个句子，而是动词 amare 的直陈式现在时不同人称的词形变化的陈述。可能人们觉得这个例子应该讨论，可能人们会说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手法；这个陈述是一个被省略、被缩写，在一个比较不常用的方式上被空间化了的句子；还会说应该把它读成这样一个句子：“动词 amare 的直陈式现在时的第一人称是 amo”等等。总之还有一些更清楚的例子：

植物种类的分类图表是由陈述构成的，而不是由句子构成的(林内的 *Les Genera Plantarum* 就是一部完全用陈述构成的书，在这本书中，只能识别出少量的句子)；一棵谱系树、一本账簿、贸易差额的估计都是陈述，那么句子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一个 N 次方的方程式，或者一个折射定律的代数公式都应该被看作是陈述。但是，如果它们具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符合语法的规则(因为陈述是由象征符号构成的，而这些象征符号的意义和连续性分别由使用规律和构成规律确定和支配的)，它们的标准与在自然语言中接受某一可接受的或者可解释的句子的标准是不相同的。最后，一张图表、一条增长曲线、一座年龄金字塔、一片分布的云层都形成陈述。至于那些陈述伴随的句子，它们是陈述的解释或评论。它们不等于陈述，原因是在许多情况下，只有有限的句子可能等于所有在陈述这种类型中被明确提出来的成分。从整体上看，根据句子的语法特征确定一个陈述似乎是不可能的。

还存在最后一种可能性。初看起来，它是所有可能性中最有可能的一种。我们能否说，在任何我们能够识别和区分某种表达行为——诸如英国分析家们所说的"言语行为"和"实现动作的言语行为"的地方就有陈述存在？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这里不是指涉及说(高声或低声)和写(用手或用打字机)的物质行为；也不是指正在讲话的个体意图(指他要说服、他希望顺从、他试图找到解

决某一问题的方法、或者他想传达有关他的消息)；我们在此也不是确指他说出来的东西的可能后果(他是否说服或者引起戒心，别人是否服从他，和他的命令是否得到贯彻执行；他的请求是否被人听见)；我们描述过程，这种过程在出现时通过格式本身进行，如：允诺、命令、政令、合同、契约、观察。实现动作的言语行为，不是发生在陈述时机之前的东西(在作者的思维中或者在他的意图的体现中)；也不是能够在陈述本身之后，在它留在身后的印迹中，和在它引起的后果中产生的东西，而恰恰是因陈述存在的事实本身——而这种陈述，严格地讲(不是其他的陈述)存在于非常确定的境遇中。因此，我们可以设想，陈述的个体化标准与表达行为的测定标准属于相同的标准，因为每一个行为都是在陈述中形成的，而每一个陈述的内部又寄居着这些行为中的一种，它们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然而，这样的对应关系是经不起检验的。因为要完成一个"言语行为"诸如：誓言、请求、合同、允诺、论证，通常需要不止一个陈述。这些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一些不同的格式或者互相独立的句子。因此，我们很难以它们全部被同一以言形式行为贯穿着为借口而否认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陈述形态。可能有人会说，在这种情况下，行为本身在整个陈述体系中不是惟一的；人们会说，在某一请求中存在的有界、连续和并列的请求行为与被不同陈述提出来的请求中的行为一样多；人们会说在某

一允诺中存在的契约与由分开的陈述构成的可个体化的序列同样多。然而，对这个答案我们可能不会满意，首先因为表达行为不再用来确定陈述，而是反过来被陈述确定——这正好是问题的所在，也提出个体化的标准问题。其次，以言形式行为只有在好几个陈述被连接起来，而每个陈述各在其位的情况下，才能被认为是在它们的特殊单位中已完成。因此，这些行为是由这些陈述体系或者总和构成的，是由它们必然的并列构成的；我们不能认为它们全都出现在最小的陈述中，并依靠每一个陈述进行更换。同样，我们不能在陈述整体和以言形式行为的整体之间建立一种双——单义的关系。

因此，当我们将陈述个体化的时候，我们不能毫无保留地接受任何借自于语法、逻辑学或者“分析学”的模式。在上述三种情况中，我们发现提出的标准过于繁杂，而且过于苛刻；发现它们没有给陈述留出它自己整体的外延；发现即使有时陈述具备被描述的形式并能与之完全一致，也还会发生陈述不服从标准的事情，因为我们找到的陈述没有合理的命题结构，在找到陈述的地方，我们不能识别句子；我们找到的更多的是我们不能够从“言语行为”中区分出来的陈述。好像陈述更纤小、更不具规定性、结构更不严谨。因此，与所有的形态相比，它更是无所不在；好像陈述的特点很少，而且容易集中；但是正因为如此，它才拒绝描述的所有可能性。这样，就使我们更难看到要在什么层次上确定它们，用什么方式接触它们，

因为对于所有我们刚刚回顾的分析，陈述从来不只是支撑物或者只是偶然的物质，如在逻辑分析中，当我们挖掘和确定命题的结构时，陈述是“滞留”的东西；对于语法分析来说，陈述是一个语言成分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我们或者能够，或者不能够识别某一句子的形式；对于语言行为的分析来说，陈述是作为可见的物体出现的，在这个物体中，它们也被表现出来。与所有这些描述的结果相比，陈述充当的是滞留成分、纯粹简单事实和不相关材料的角色。

最后，我们是否应该承认陈述不可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且在它对所有的语言分析来说是外部的材料，语言分析又在这个材料的基础上确定什么是它们的对象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得出恰当的定义呢？我们是否应该承认任何一种符号、形态、字体或者印迹的体系——无论它们的结构或可能性如何都是以构成陈述，而且正是相对语法可以说是否涉及一个句子；又相对于逻辑可以确定它是否包含命题形式；相对分析可以说明什么是可以贯通分析的语言行为呢？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或许应该同意一旦有许多并列符号——为什么不能呢？——或者一旦有一个或者惟一的并列符号，就有陈述存在。陈述的界限可能就是符号存在的界限。然而，即便如此，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并且应该赋予作为“符号的存在”这一表达的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当我们说符号存在时，当我们说有符号存在就有陈述存在时，我们究竟要说什么？应该

赋予这个"有……存在"以什么样的特殊结构?

因为很明显,从语言存在,并且随之符号总体由它们的命题特征和使用规律确定的意义上讲,陈述并不存在。事实上,语言从未在自身和其整体中确定。语言只有以间接的方式借助于以它作为对象的某种描述时才能确定。构成语言成分的符号是强加于陈述的形式并从内部支配陈述。如果没有陈述,语言就不存在。但是,没有任何陈述是语言存在所不可缺少的(而且我们可以假设,在任何陈述的位置上,都可能设定另一个并不因此改变语言的陈述)。对于可能的陈述,语言只能以构成系统的名义而存在。但是另一方面,语言只是以从某一真实的陈述总体中获取的描述(多少是彻底的)名义而存在。语言和陈述不在相同的存在层次上。正如人们说有诸多语言存在一样,人们不能说有诸多陈述存在。但是,一种语言的符号可以构成一个陈述,如果这些符号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产生(连接、勾画、制作、勾划),如果它们出现在时间的某一刻和空间的某一点上,如果说出它们的声音或者制作它们的动作赋予它们以物质存在的体积,是不是就能够解决问题呢?举个不属于陈述的例子:我偶然在一页纸上涂写的字母表中的字母,我们用于印书的铅字——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它们的空间和体积的物质性——所有这些展示出来的、可见的、可操作的符号是否可以被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陈述呢?

但是,如果再仔细注意这两个例子(铅字和我写出的

符号),就会发现它们不可以完全重叠。这一大把可以被我抓在手中的印刷铅字或者由打字机的键盘指示出来的字母都不构成陈述;它们至多只能是我们用以写出陈述的工具。相反,这些被我偶然在一页纸上乱涂出来的字母,当它们出现在我的头脑中,并且要表明它们的混乱无章不能够构成陈述时,它们是什么?它们构成什么形态,如果不是偶然选择出来的字母的图表,难道是一个只有偶然规律的字母体系的陈述?同样,统计学家们偶然使用的数字表,也只是一个数字象征符号的连续。这些符号之间没有被任何一个句法结构连接起来;然而,它却是一个陈述,因为它是通过排除所有可能增强连续途径可能性的方法获得的某一数字总体的陈述。我们再举刚才的例子,打字机的字盘不是陈述;但是,在打字教材中列出的 A、Z、E、R、T 等字母组成的系列却是法国打字机采用的字母顺序的陈述。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些否定的结果:一个有规律性的陈述建构不是为了组成某一陈述(后者可以由一个最小可能性的体系构成)而被采用的。但是,语言成分的任何一种物质上的实现和符号在时空中的任何一次出现都不足以使一个陈述出现并开始存在。因此,陈述既不以语言采取的方式(尽管陈述是由符号组成,这些符号的个体性只有在一个自然的或者人工的语言系统的内部,才是可确定的)也不以赋予感知对象所采用的方式存在(尽管它始终被赋予某种物质性,并且人们总能通过时空坐标确定出它的位置)。

现在对陈述的一般问题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已经能够勾勒出它的轮廓：陈述与句子、命题或语言行为并不具有相同的单位。因此，它不受同样的标准约束。但是，它也不是那种具有自己的界限和独立性的物质的对象有可能成为的单位。陈述在其特殊存在方式中（不完全是语言的，也不完全是物质的），对于我们能够说有还是没有句子、命题、语言行为，以及句子是否正确（或者可接受的、或者可解释的），命题是否合理和被很好地构成，语言行为是否符合需要，是否彻底地实现，却是不可缺少的。我们不应该在陈述中寻找一个长久的或短暂的、结构严谨的或结构松散的单位，而应该同其他单位一样在逻辑的、语法的，或者实现动作言语的句子中获取它。无宁说它是众多成分中的一种，无宁说它是某一分析层次的一个可测定的分割，它更像是一种功能。与这些多样单位相比，这种功能垂直地得以实施，并可以使我们针对某一符号体系，说出这些单位是否出现在该体系中。因此，陈述不是一个结构（就是说一个在可变的成分之间允许无数具体模式存在的关系总体），它是一种从属于符号的功能，从而在它的基础上，我们能够通过分析或者直觉，决定陈述是否"产生意义"或者不产生意义，它们根据什么规律相互连续或者相互并列；它们是何物的符号？以及它们的表达（口头的或者书写的）实现的是什么行为类型。因此，如果我们没有能够为陈述找到单位的某些结构的标准，我们不必大惊小怪；这是因为陈述本身

不是一个单位，而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把结构领域与可能单位的领域交叉起来，并以具体内容在时空中把它们揭示出来。

这正是我们要真实描述的功能，就是说，描述它的实践、条件，制约它的规律和它在其中运作的场地。

2 陈述的功能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在符号的单一群方面中去寻找陈述。陈述不是语义段，不是构成的规律，不是连续和对换的典型形式，而是使上述符号的整体存在，并使这些规律和形式得以实现的东西。但是，如果说陈述使它们得以存在的话，也只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因为不能把这种方式同作为语言成分的符号的存在混同起来，也不能同这些占有某种片断并持续稍长时间的标记的物质存在混同起来。我们现在就是要探讨存在的这种特殊方式，它标志着符号的整个体系——但愿这一系列的符号能表述出来——的特征。

a.让我们再举刚才那些符号的例子。这些符号在某种确定的物质性中得到加工或描述，并且按照某一任意或非任意的，但绝对不是语法的方式组合起来。例如打字机的键盘，一把印刷铅字。我只需把这样给定的符号

重新抄录在一页纸上(并且按照它们的依次顺序,不增加任何其他字)就足以让它们组成一个陈述:在便于打字的顺序中字母符号的陈述,某一字母的偶然组合的陈述。那么为了获得陈述,发生了什么事情?与第一个总体相比,第二个总体能够重新获得什么?是它被复写的事实,重复?绝对不是,因为所有打字机的键盘都在复写着某种模式,所以它们不会因此成为陈述。是某个主体的介入?这个答案令人倍感不满。因为,把某一体系的重复归于某一个体的灵机一动,从而使这个体系转变成一个陈述,以及无论如何问题不存在于重复的起因或者起源中,而是存在于两个相同的体系间的特殊关系中的看法都是不充分的。事实上,第二个体系不是只靠我们能够在以第一个体系的诸成分中的每一个成分之间建立某种双—单义关系(这种关系或者标志副本的事实,如果它指的是完全的复写的话;或标志陈述的真实性,如果我们准确地越过了陈述的界限的话;但是,这种关系不能确定这一界限和陈述的事实本身)而成为陈述。一个符号的体系,只要它同"它物"(这个它物可以与之出奇地相似,近乎相同,正如前面选择的例子)有某种特殊的关联,它就可以成为陈述。这种特殊的关联只涉及它本身,——不涉及它的起因,也不涉及它的成分。

人们肯定会说,在这种关联中,不存在任何神秘的东西;恰恰相反,这种关联司空见惯;人们对它没有中断过分析:这涉及能指同所指的关系,以及名词同它所指的东

西的关系；句子与其意义的关系；或者命题与其参照的关系。不过，我相信，我们能够证明陈述与被陈述的东西的关系并不重合于上述任何一种关系。

即便陈述被缩减为某个名词语义段（如："船"！），即便它被缩减为一个专有名词（如："皮埃尔"！），它同它所陈述的东西的关联与名词同它指定的东西，或者与它意指的东西的关联也是不同的。名词是一种语言成分，它在不同语法的总体中可以有不同的位置，因为它的意义是由它的使用规则（指可以被它有效地确定的个体或者指它能够正确地进入的句法结构）规定的。一个名词是由它的循环可能性确定的。一个陈述没有任何重现的可能。它同它所陈述的东西之间保持的关系与使用规则的总体是不同的。这是一种特殊关系，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同一表述再现，那么，它使用的一定是相同的词，大体上也是相同的名词，从整体上讲是相同的句子，但不一定是相同的陈述。

我们也不应该把陈述与它所表达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同命题与它的参照之间的关系混同起来。我们知道，逻辑学家们认为，像"金山在加利福尼亚"这样的命题是不能够得到证实的，因为它没有参照，因此，它的否定较之它的肯定既不更加真实，亦不更加虚假。我们是否同样可以认为，如果陈述赋予存在的命题没有参照的话，陈述就与任何东西无关呢？我们还是应该肯定这种倒置，并且应该说不是因为参照的欠缺导致了陈述对应物的欠

缺，而是因为陈述的对应物——与陈述有关系的东西，被它涉及的东西，不仅有被说出的东西，还有它言及的东西，它的"主题"——有权说命题有还是没有参照。因此，只有陈述的对应物才可以对它做出最后的断定。实际上，让我们假设"金山在加利福尼亚"这种表达既不存在于某部地理教科书中，也不存在于某篇游记中，而是在某部小说，或在任意一个故事中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识别出它的真实或虚假的价值(根据它所涉及到的想像世界是否允许这样的地质学和地理学的异想天开的幻想)。为了能够说出命题究竟有还是没有参照，就必须弄清陈述与什么相关，它的对应关系的空间是什么。"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头"这种表达只有在我们假设这一陈述与当今历史信息的世界有关时才缺少参照。命题同参照之间的关系不能作为陈述与它所陈述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的模式和规律。后者不仅与前者不属于同一层次，而且是作为它的先决条件出现的。

最后，陈述与它所表达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同句子与它的意义之间的关系重叠。这两种关联形式之间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下面这些著名的句子，尽管它们的语法结构完全正确(如："无色的绿思想愤怒地沉睡下来")，但却没有任何意义，其实，认为这些句子没有意义意味着我们已经排除了某些可能性，如：我们承认它不是对一个梦境的叙述，也不是指一段诗文，不是某个被编码的信息，或者某个吸毒者的言语，而是某种陈述类型，

这种陈述类型应该以某种确定的方式同某一可见的现实性发生关联。只有在确定的而且十分稳定的陈述关系的内部句子，与其意义之间的关联才能够被确定。再者，这些句子，即便我们从它们在其中不具有意义的陈述层次上理解它们，它们作为陈述也没有被剥夺对应关系。首先一些对应关系可以使人们这样说：比如，思想从来就不是有色的或无色的，因此，这个句子没有意义（然而，这些对应关系涉及某种实在的方面：思想在其中是不可见的，色彩是为了看的，等等）；另一些对应关系使人们强调上述句子只是作为某个正确的句法结构的类型的比方，所以没有意义（然而，这些对应关系涉及语言，它的规律和它的特性）。一个句子虽然成为非能指的，它却涉及某事物，因为它是一个陈述。

至于这个标志陈述特征的关系——即由句子或者命题提出来的不言明的关系，并且对它们是先决条件的关系——怎样确定它？怎样把它从意义的这些关系中，或者从真实性的这些价值中脱离出来，因为人们经常把它们同这种关系混淆起来。某个陈述，不管它是怎样的，而且不管人们把它想像得多么简单，都不把某个个体或者可能被句子中的词确定的特殊对象看作对应物，如在“金山在加利福尼亚”这个陈述的例子中，对应物不是这个由履行主体功能的名词语义段确定的，真实的或者想像的，可能的或者是荒谬的表达。然而，这个陈述的对应物也不是事物的状态或者能够证实命题的关系（在我们举出

的例子中，可能是指对在确定的地区中的某座山的空间的内涵)，相反，我们能够作为陈述的对应物给予确定的东西是一个范围的总体，上述对象可以在其中显现，上述一些关系可以在其中被确定。比如：这可能是具有一些可观察到的物理性质的物质对象和可感觉到的数量关系的范围，——或者相反，它可能是某个虚构的、富于随意性的(尽管这些属性具有某种恒常性和某种一致性)，不对试验感知的证明进行审定的对象范围；它将成为用配合、距离、对邻近和包容的关系进行空间和地理定位的范围——或者相反，是某个象征的从属关系和神秘的亲缘关系的范围；它可能是存在于陈述形成的同一时刻和同一时间范围上的对象范围，或者可能是属于另外一种在场的对象的范围——这个在场是由陈述本身指示和构成的，而不是陈述自己所归属的在场。陈述面对的(在面对面的情况下)不是一个对应物——或者说并不欠缺对应物，它不像命题有某种参照(或没有参照)，也不像专有名词确指一个个体(或者不确指什么人)。无宁说，它是与某个"参照系"相联系，这个参照不是由"事物"、"事实"、"现实性"或者"存在"构成，而是由那些被确定、被确指或者被描述的对象，那些被肯定或被否定的关系的可能性和存在的规律所构成的。陈述的参照系构成了地点、条件、出现的范围，构成了个体或对象分化的要求，事物的状态和被陈述本身涉及的关系。它确定着赋予句子以意义，赋予命题以真实性价值的东西显现和规限的可能性。

与陈述的语法层次和逻辑层次相对立，这个总体标志着表达陈述的层次。因此，借助这些可能性的不同范围，陈述可以把一个语义段或者一个象征符号的体系转变为一个我们能够或不能够确定某种意义的句子、一个我们能够或不能够接受某个真实性的价值命题。

总之，我们看到陈述层次的描述既不能通过形式分析，或者也不能通过语义研究，或者通过证明完成，而是要通过陈述和分化空间之间的关系分析完成，因为陈述在这种分析中使各种差异显现出来。

b.此外，陈述还通过它与主体保持的某种确定的关系，使自己区别于任意一种语言成分的体系。我们正是要详述这种关系的性质，并且特别要澄清这些我们可能把陈述同它们混同起来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把陈述的主体归结于这些在句子中以第一人称出现的语法成分上。首先，因为陈述的主体不存在于语言的语义段之中；其次因为不包含第一人称的陈述仍然可以有一个主体，最后特别是所有具有固定的语法形式的陈述(不管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同陈述的主体都不具有同一关系类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关系与“夜幕正在降临”和“万事皆有因”这种类型的陈述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至于“很久以来我都睡得很早”这种类型的陈述，如果我们是在那部《追忆似水年华》的小说的第一行读到的话，那么，陈述主体的关系也是不相同的。

这个句子以外的主体是否就是说出和写出这句话的真正个体呢？我们知道，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人会去说它，总之，也没有什么可作为传播成分的东西。要使符号体系存在，必需——根据因果性的系统——有“作者”，或者一种创造的要求。但是，这个“作者”不同于陈述的主体；而他在创造和表达之间保留的关系不能与陈述的主体和他所陈述的东西之间的关系重叠。我们不以经过物质加工或者勾划的符号的整体为例，因为那可能过于简单。因此，它们的创造一定包含着一个作者，然而却不包含陈述和陈述的主体。为了指出符号的传播者和陈述的主体之间的分离，我们可以回顾第三者阅读一篇文章，或演员背诵他的台词的情况。然而，这类情况有限。一般说来，至少第一眼看上去，陈述主体似乎恰好是那个为了意义的某种目的创造了不同陈述成分的人。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一部小说中，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表达的作者是在书封面上署名的那个真实个体（这也提出对话的成分、与某个角色的思维有关的一些句子的问题，也提出以笔名发表文章的问题：而我们知道这些双重成分给那些支持解释性分析的人造成的所有困难，当他们想要把这些表达全部归结于本文作者，归结于他曾想说，他曾想过的东西，简言之，归结于这个巨大而沉默、不易看到和统一的话语时，他们在这个话语的基础上铲平这个不同的层次的整座金字塔）；但是即便除了这些同个体——作者不一致的表达的要求之外，根据小说的诸种陈

述从外部提供的叙事史的历史与空间的界定，根据它们像一个不可见的、中性的与虚构的形象奇妙混杂的无名个体所见而描述事物的情况，根据它们通过内部、直接的辨读提供的一个人物默默经历的事情的口头版本，它们并不拥有同一个主体。虽然这些陈述作者是相同的，虽然他没有在他自己所是什么与人们所读的本文之间发明一种补充性接力，这些陈述对陈述的主体来说也不意味着相同的特征。它们在这个主体与主体正在陈述的东西之间并不包含相同的关系。

也许，人们会说经常提到的小说的例子没有说服力，或无宁说它对文学的本质提出质疑，而不是对一般的陈述主体的形态提出问题。作者在文学作品中缺席、隐藏、自我委派或者自我分割，这是文学的特性。因此，我们不应该以普遍的方式从这种分解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陈述的主体在任何方面——性质、地位、功能、同一性——都不同于表达的作者。然而，这种差距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在下面情况中这种差距绝对是普遍的：陈述的主体是某种确定的功能，而一种陈述与另一种陈述的功能又各异；这是空无的功能，可由在某种程度上无动于衷的个体来充实——当这些个体偶然要表述时；还有，同一也是惟一的个体可能在某陈述体系中逐个占据不同位置，并充当各种主体的角色。数学论文便是一例。在序言里，作者解释了为什么写这篇论文，在什么条件下，为回答什么尚未解决的问题，或者出于教育学的什么考虑、使用什

么方法、在什么样的试验和失败之后写出来的。在这个句子中，陈述主体的位置只能由表述的某个或者某些作者所占据。因为，主体个体化的条件实际上非常严格，非常繁多，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允许一个可能的主体。相反，如果我们在这论文本身的框架中遇到诸如"同一量的两个等量彼此相等"这样的命题，那么，这个陈述的主体绝对是中性的，与时间、空间、环境无关，但在任何语言系统和任何书写或者象征化的信码中，却总是相同的，任何个体为了肯定任何一个命题都可以占据这个位置。另一方面，像"我们已经指出……"这种类型的句子，为了能被表达出来，包含着某些具体的不包含在前面表达中的语境条件，因为，这个位置已被确定在某个由完成的陈述的总体构成的范围中，定位在一系列陈述事件中，而这些陈述事件应当是已经发生过的；这个位置定在某段指示的时间中，而这段时间的先行时刻永远不消逝，因而无需为了再次出现而一致地重新开始和重复（一种说法就足以使它们在其起源的有效性中复活）；这个位置被某些实际运作的预先存在所确定，这些运作并不一定是由同一个体（正在说话的这个人）完成的，但它们理应属于正在陈述的主体，听从它的支配，必要时，还会再次使它们发挥作用。我们将用这些必要的条件和可能性的总体确定这样一种陈述的主体；但我们不把它描述为可能实际进行运作、生活在没有遗忘、断裂的时间中的个体，这样的个体在其意识范围中，使真实命题的总体内在化，在他的

思维的活生生的现时中保持这个命题总体的潜在再现(对于这些个体来说,这些至多只是它们作为陈述主体的位置的心理和“经历的”形态)。

我们或许能够以同样的方式描述,在“我把点的总体称为直线”或者在“设任意成分组成的总体”这两个句子中什么是表述主体的特殊位置。在这两种情况下,主体的位置关系到某个既是确定过的,又是正在进行的运作存在;在这两种情况下,陈述的主体还是运作的主体(建立定义的人同时就是表述定义的人;提出它的存在的人就是在同一时间中提出陈述的人);最后,在这两种情况下,主体通过这一运作和运作从中形成的陈述把它的陈述和它未来的操作(作为表述的主体,他接受这个陈述就像接受他固有的法律)联系起来。然而,这里存在着差异:在第一种情况下被表达出来的东西是某种语言的惯例,——陈述的主体应该使用的并在其中被规定的那种语言:因此,陈述的主体和被陈述的东西都处于同一层次(而对于形式分析来说,后者这样的陈述则包含着超越语言固有的不平度);在第二种情况下,陈述的主体却相反让某个对象在它之外存在,这个对象属于某个限定的范围,它的可能性的规律已经被肯定,它的特征先于提出它的陈述。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在肯定一个命题时,陈述主体的位置并不总是同一的。我们现在看到当涉及在陈述本身中进行的运作时,陈述主体的位置亦不相同。

因此,我们不应该把陈述的主体设想为与表述的作

者是同一的。无论是从物质还是从功能上，它们都不相同。事实上，陈述的主体不是确定某一句子是口头的或者笔头的这一现象的原因、根源或者起点，也不是悄悄超前于词语，并把词语作为它的直观的可见的物体排列的有意义的意图，也不是某一运作体系的永久、静止、并与其本身同一的起源，陈述把这个运作体系依次表现在话语表层上。陈述主体是一个确定的和空白的位置。它实际上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填充；但是，这个位置不是只此一次地被确定并一成不变地始终保留在某个本文、书或作品的行文之中，而是在变化——或无宁说它具有相当可变性能够或使自己通过诸多句子保持同自身一致，也可以让自己随着每一个句子发生变化。它是标志着每一个作为陈述的表述的维度。它是陈述功能固有的并能够描述陈述功能的特征之一。如果一个命题、一个句子、一个符号的总体可以被称之为“陈述”，那这不是因为某一天，有人说出了它们或者在某个地方留下了它们的暂时印迹，而是因为主体的位置可以被指定。描述一个作为陈述的表述，不在于分析作者和他说出的东西（或者他想说，或者不情愿而说出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而是要确定什么是每个个体为成为它的主体而能够和应该占据的位置。

c.陈述的功能的第三个特点是：它在没有联结范围的存在的情况下不能发挥作用。这使陈述变成为另外一种东西，而且不只是纯粹的符号集合，这个符号集合只需

要某种物质支撑——如：记录表层、发声物质、可加工材料、印迹空隙——便可存在。而这也就把陈述与句子和命题区别开来。

以词语或象征符号总体为例。为确定它们是否准确构成一个像句子那样的语法单位或者像命题那样的逻辑单位，确定这个总体是根据什么规律构成的，便是必要的，也是足够的。“皮埃尔昨天到达”可以组成一个句子，但若是“昨天是皮埃尔到达”则不行；A + B = C + D 能够构成一个命题，而 ABC + = D 则不行。只有在参考语言的——自然的或者人工的——系统，对成分和它们的分配进行的检验才可能区分属于命题的东西和不属于它的东西，属于句子的东西和属于简单的词语积累的东西之间的差别。再者，这种检验还可以确定上述句子属于什么类型的语法结构（包含名词主语的肯定句的过去时态等），或者确定提到的符号体系属于什么类型的命题（两个加法的对等式）。至少我们可以在不使用任何其他的句子和命题作为它的语境、无任何其他的联结句子或者命题的总体的情况下，设定被“单独”确定的句子和命题。因此，尽管在这样的条件下，它们是无用和无法使用的，却并不妨碍我们甚至在它们的特殊性中识别它们。

无疑，人们会提出一些异议。比如说：一个命题只有在我们了解它所服从的那个合理系统的条件下才能被建立和被个体化：难道说，我们不能把命题从书写的这些定义、规则和习惯形成的连结范围中分离出来（同样，在主

体的能力中，不公开起作用的语法规则对于我们能够识别一个句子和某一类型的句子也是必要的）？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总体——现实的或是潜在的——同命题或者句子不属于同一层次，但是它却针对着它们的成分、环节和可能的分配。这个整体不与这些成分连接，因为它是由命题或句子设定的。人们可能还会反驳说，许多命题（非重言的）不能够在它们自己的构成规律的基础上被证明，况且借助参照来决定它们的真假是必要的：然而真实也好，虚假也罢，命题总是命题，而借助参照是不能确定它是或者不是命题。对句子也同样，在许多情况下，句子只能相对语境（句子或者包含着某些关系到某个具体环境的"参照"成分；或者使用确指说话的主体和他的对象的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代词；或者涉及前后的句子的代词成分，或者关系虚词）才能产生意义。然而，句子意义的未穷尽并不影响句子在语法上的完整和自立。诚然，我们不太清楚"这个嘛，我明天再告诉你"这样一个词语的总体所"表示"的意义；总之，我们既不能确定这个明日的日期，也不能说出对话者的名字，也不能猜想这句话要说什么。但这句话并不因此而失之为一个被严格界限、符合法语构成规则的句子。人们最后可能还会反对说：没有语境，有时是很难确定一个句子的结构的（"如果他死了，我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可以构成"要是他真的死了，我将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或者构成"我永远不会知道他的死"）。然而，这里说的含混不清是完全可以限

定的，因为我们能够列举出它们的同时可能性，而且这种含混也是句子的组成部分。一般地讲，我们可以说一个句子或者一个命题——尽管它是孤立的，尽管它与阐明它的自然语境相分割，甚至与它所涉及的那些言明的或者不言明的成分中脱离出来或陷入其中，它都可以回复——仍然是一个句子或者一个命题，而且总是能够如实地认出它来。

相反，陈述功能——恰恰由此证明它不单纯是一个预件的建构——不能作用于处在自由状态中的句子或命题。为了有陈述——为了涉及一个陈述，只说出一个句子是不够的，甚至只在一个对象范围的确定关系中或者只在一个主体的确定关系中说出这个句子也是不够的。因此，应该把句子放在它同邻近的整个范围的关系中。或无宁说，因为这不意味着某种补充关系，而这种关系又要被迭放在其他关系上，所以，在邻近的空间没有被使用时，我们就不能说出一个句子，就不能使这个句子成为陈述的存在。一个陈述总有一些密布着其他陈述的边缘，这些边缘不同于我们平时所理解的像“语境”的东西——实际的或者词语的——就是说它们不同于促使某种表述的形成并确定其意义的环境的或语言的成分的总体，它们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它们使它成为可能：因为如果我们涉及的是一部小说或者一个物理定理，语境关系与一个句子和围绕着这个句子的其他句子之间的关系是不相同的；如果它涉及的是对话或者试验报告，它也不同于表述

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表述之间的比较普遍的关系的基础上，在整个词语网的基础上，语境的效果才可能被确定。这些边缘还不同于主体在讲话时出现在他头脑中的那些不同的本文和不同的句子。然而，它们却比这一心理环境更具外延性；并且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确定这个心理环境，因为根据一种表述在其他表述中的位置、形态和作用，——根据它在文学领域中出现或它应该作为某个无关紧要的话题而消失，或它属于叙事还是支配论证的情况——主体意识中的其他陈述的在场方式也是不同的。因此，在此活动的既不与语言试验、词语记忆、对已说出的东西的叙述在同一层次，也不与它们的形式同一。陈述范围的安排从远处支配着表述的心理环境。

这种把句子或者符号体系变成陈述，并使它们具有确定的语境，具有已详述的有代表性的内容的连接的范围，形成为一个复杂的网状结构。它首先由陈述处在其中，并形成一个成分（即形成对话的对答，一方面被它的前提局限，另一方面由它的结论局限的论证的结构，构成表述的肯定的连续）的其他的表述的体系构成。其次由陈述（明显地或不明显地）参照的表述整体构成，或为了重复它们，或为了改变和适应它们，或为了对立，或为了它自己言及它们。没有一个陈述不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其他的陈述重新现实化的（叙事中惯常成分；论证中的已被承认的命题，对话中的习惯用语）。它还由表述整体构成，陈述控制着这些表述的未来的可能性，而这些表

述作为其结果、自然连续或反驳(秩序提供的陈述的可能性与某个合理系统的命题或者叙事的开场所提供的是不相同的)可以在陈述之后出现。最后它还由这样的表述整体构成:有关的陈述分享表述的,它们不用顾及线性秩序,就可置身于其间,它随着它们一起消失,或者相反,随同它们一起被提高身价、被保留、被神化,并作为可能的对象提供给某个未来的话语(一个陈述不能同它作为"文学",或者无关紧要,完全可遗忘的话题或者永恒的科学真理,或者有预见性的话语等接受的地位分离开)。一般说来,我们可以这样讲,语言成分的序列只有在它沉浸于它要在其中作为个别成分出现的陈述范围时,才成其为陈述。

陈述不是直接投射于某个确定的环境或某个表象的整体的语言范围之中。它也不单纯地是被说话的主体使用的某些成分和语言规律。从一开始,自其渊源起,陈述就在某一陈述范围内被彻底分割,在这个范围里,陈述有自己的位置和地位,这个范围为它安排同过去的可能关系,而且为它提供一个可能的未来。任何陈述都是这样被阐明的:没有一般的陈述,也没有自由的、中性的和独立的陈述;但始终存在着构成某个体系或总体一部分。在其他陈述中间发挥作用、依赖于它们又区别于它们的陈述,因为它总与陈述的游戏构成一体,不论它在其中只占有多么轻微、多么细小的部分。当语法的建构只需要成分和规则便可实现时,当我们可能有限地设计某一种

语言(当然是人工的),而这种语言仅仅用于构成一个句子时,当字母表、某一形式系统的构成和转换的规律被确定时,我们完全能够确定这一语言的第一个命题,然而,陈述就不一样了。没有一个陈述不是以其他陈述为前提的;没有一个陈述的周围没有一个共在的范围、体系和连续的效果、功能和作用的分配。如果说我们能够言及一个陈述,那因为一个句子(一个命题)在某一确定点上,以确定的位置出现在超出它的限度的陈述游戏中。

在这个陈述共存的基础上,句子间的语法关系,命题间的逻辑关系,对象语言与决定其规则的语言间的超越语言关系,句子(或诸如成分)间的修辞关系,都在一个自主、可描述的层次上展现出来。诚然,我们能够对所有这些关系进行分析,而又不必把陈述范围本身即陈述功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共在范围作为主题。但是,这些关系能否并是否可能只取决于这些句子是否被"陈述",换句话说,只取决于它们是否在一个使它们得以相互连接、排列、共在,对其他的陈述发生影响的陈述范围中展开。陈述远不是能指总体(如:最小的意义单位"原子"也有意义)的个体化原则,而是把这些意义的单位置于某个它们在其中不断增加和积累的空间的东西。

d.最后,一个语言成分的序列要作为陈述看待和分析,就必须满足第四个条件:它必须具有某种物质存在。如果陈述不是由某种声音说出来,如果某个表层没有为它提供符号,如果它不是在某个可感觉的成分中形成,或

如果它没有在某个记忆或者某个空间中留下——哪怕只是几分钟的——印迹，我们能够谈论陈述吗？我们能否把陈述说成是一个理想的和沉默的形态？陈述总是通过某种物质的深度被给定的，即便这种深度被掩盖起来，即便它几乎看不见，并且注定是要消失的。陈述不仅需要这种物质性，而且一旦它所有的规定性被恰当的确定，它就不是作为补充被给予陈述的了。因此，从某一方面上讲，这种物质性构成了陈述，尽管一个句子是由相同的词组成的，具有相同的意义，保持着句法和语义的同一性，如若它在一次谈话中被某人讲出来，或者被印在某部小说中；如若在几个世纪以前的某一天被写出来，并且现在又重新出现在某一口头表达中，那这个句子并不构成相同的陈述。陈述标志和物质地位组成了陈述的内在特征。这一点是显而易见或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旦我们对此稍加注意，事情就会变得乱七八糟，问题成堆。

当然，我们欲说如果陈述结构的物质，至少部分地，由它的物质地位标志的话，而且，如果它的同一性对它的物质结构的变化很敏感的话，那么，句子或者命题也是一样：符号的物质性事实上对语法乃至逻辑并非完全无关紧要。我们知道被使用的象征（怎样通过象征能够在其中成型的不同物质和它所承受的形式的多变来确定象征的同一性？怎样识别这个象征并确保它是同一个，如果需要把它确定为“一个具体的物体”的话？）的物质恒定性对符号的物质性提出的那些理论问题。我们还知道一系

列象征的概念本身("先于"和"后于"是什么意思? 是"先来"和"后来"的意思吗? 这样的排列位于什么样的空间?)对它提出的问题。至于物质性与语言的关系——书写和字母的作用,在某一书写本文和对话中,在某张报纸和某本书中,在某一封信和某一张海报中所使用的既不是同一种句法,也不是同一种语汇的事实——更为人所熟知。更有甚者,有些连贯的词语,形成一些极其个体化而又完全可以让人接受的句子,如果它们出现在某张报纸的大标题中,但却永远不能在对话过程中等同于具有一定意义的句子。然而,在陈述中,物质性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它不仅是变化的原则,辨认标准的更动,或语言次总体的确定。它是由陈述本身组成的,因为,一个陈述必须具有某种实体、某种支撑、某个地点和日期。然而,当这些必需物发生变化时,陈述也改变了其同一性。由此导致一系列问题:大声甚至低声重复的同一个句子组成一个还是几个陈述,当人们熟记一篇文章时,每次背诵产生一个陈述,或应认为重复的是同一陈述? 一个句子被忠实地译成一种外语时,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陈述,还是只是一个? 在集体背诵中——祈祷或者课文——应该算作多少个陈述? 如何通过这些多样的变故、重复、翻译建立陈述的同一性?

问题无疑是因为我们经常混淆不同的层次而难以理解。首先,我们应该排除陈述过程的多样性。有人会说每当一个符号总体被传播时,就有陈述。这些连贯中的

每一个都有时空的个体性。两个人完全可以同时讲同样的东西;既然他们是两个人,所以就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陈述过程。同一主体完全可以多次重复同一个句子;这样,就会随之存在同等数量的不同的陈述过程。陈述过程是一个不重复的事件;它具有我们不能还原的特殊的地点和日期。然而,这种特殊性对一些常数是放行的:语法的、语义的、逻辑的,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抵消陈述的时间和使之个体化的标志时,识别某一个句子,某一种意义,某一命题的普遍形式。因此,陈述的时间和地点,它使用的物质支撑物就变得无关紧要了,至少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因为被分离出去的东西,是一个可以无限重复的形式,它能够导致最分散的陈述的出现。不过,陈述本身却不能被限制在这种纯粹的陈述事件中,因为,尽管它具有物质性,它还是会被重复。因此,人们完全可以说,两个人哪怕在有些不同的环境中说出的同一句子只能构成一个陈述。然而,陈述没有被限制在某种语法或者逻辑的形式中,只要它对物质、实体、时间和地点的差别在不同的方式上比形式更为敏感。那么,陈述特有的和允许某些重复的特殊类型的物质性是什么?当有许多不同的陈述过程存在时,我们怎样才能言及同一个陈述,——而不是在我们能够识别形式、结构、构成规律、相同的目的时,应该言及许多个语句?因此,标志陈述的这种可重复的物质性的制度又是什么呢?

无疑,这不是一个可感知的、质量的,以色彩、声音或

者硬度的形式出现的，并被与感觉的空间相同的时空的测定划分出来的物质性。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一篇被复制多次的文章，一本再版多次的书，或者最好是同一版本的几本书，都不会产生同等数量的不同陈述：因为在所有《恶之花》的版本中（某些变动本和禁止登载的段落不在此列），我们发现的是同一陈述游戏；然而它们的字体、墨迹深浅、纸张，甚至还有诗文的安排和符号的位置都各不相同，因此，这一物质性的每一颗粒都改变了。但是，在此，这些“细微”差异对于改变陈述的同一性并把它变成另一个陈述不起作用，因为这些差异都在这部“书”的一般成分中——当然是物质的，但也同样是制度的和经济的——不起作用了。一本书无论它的印数和出版次数有多少，无论它使用的多种不同的实体是什么，对于陈述说来都是一个完全等值的地点，对于它们是重复的要求而又不改变同一性。我们从第一个例子中可以看到陈述的物质性不是由被占据的空间和表达的日期，而是由事物或者对象的地位确定的。这个地位从来不是最终的，而是可改变的、相对的，并随时有可能受到质疑。比如：我们很清楚，对文学史家们说来，再版一部经作者精心修改的书与作者死后出版的书不具有同样的地位，陈述在这个地位中具有一种特殊的价值，它们不是同一整体的表现之一，而是对书中已经有的和可能有的东西的重复。同样，在一部宪法或测验的本文之间，或者在宗教启示的本文与所有的那些用同一笔迹、同一字体，在相似

的实体上精确地复制出来的手稿和印刷品之间，我们不能说存在着相等性，因为，一方面，是陈述本身，另一方面，是它们的复制品。陈述不等于物质的片段。但是它的同一性却随着物质机构的复杂状况而改变。

因为，纸上的手稿或者是发表在书中的手稿上的陈述可以是相同的，口头说出的，海报上印出的，录音机录下的陈述都可以是相同的；相反，当一个小说家在日常生活中随便说出了一句话，随后又把这句话写到他写的手稿中，并将它赋予某个人物，或甚至让这个被认为是作者的匿名的声音把它说出来时，我们就不能说这两种情况下的陈述是同一个陈述。因此，陈述必须服从的这一物质性的状况，相对于时空的定位，它更像是机构，相对于确定局限的和会消亡的个体性来说，它更是确定再记录和转录（还有界限和局限）的可能性。

陈述的同一性服从于另一个条件和界限的总体：这些条件和界限是这总体在其中出现的其他陈述总体强加于它的，是使用和应用它的范围，它应该发挥的作用或者功能强加给它的。像地球是圆的或者物种进化这样的断言在哥白尼前后，在达尔文前后，都不构成相同的陈述。对这些如此简单的表述来说，并不是意义改变了，被改变的是这些断言与其他命题之间的关系。是它们的使用和重新投入的条件，是经验的可能的证明的以及我们能够参照的要解决的问题的范围。“梦实现欲望”这个句子可以在几个世纪中被重复；但对柏拉图和弗洛伊德来说，它

不是相同的陈述。使用的模式、规则，陈述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堆砌，它们的策略潜在性构成了陈述的稳定场，它可以使陈述在它们的同一性中进行重复，尽管陈述千差万别。然而，这个范围同样可能在最明显的词义、语法或者形式的同一性中确定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不再有等同并且应该认真识别新陈述的出现。但是，我们无疑可能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认为尽管在词、句法、语言本身不一致的地方也只有同一陈述存在。不论是话语和它的同声传译，或是一篇英文科技文章和它的法语译文，或是用三种不同语言对三个栏目提出的某种意见，都不是涉及多少种语言就有多少陈述存在，而是惟一一个陈述的总体存在于不同的语言形式中。更明确地说：一个确定的消息可以用另外的词、简化的句法，或约定的编码再次转化。如果消息的内容和使用的可能性相同，我们将能够说这里和那里是相同的陈述。

即便是这样，这也不涉及陈述的个体化标准，而涉及它的多样性原则。因为，陈述有时比句子的结构更多种多样（而且它的同一性，比起语义和语法，总体的同一性更加细腻，更加脆弱，更容易变化），有时又比这种结构更为恒定（而且它的同一性比较广泛、稳定、不易接受变化）。再者，不仅是陈述的这种同一性与句子的同一性相比不能被一劳永逸地固定，而且它本身也是相对的，并随着人们对陈述的使用和操纵陈述的方式而变动。当我们使用某个陈述以便通过它表现它的语法结构、修辞外形

或者它所具有的内涵时，我们显然不能把它的原文和它的译文看作是相同的。相反，如果我们想把它纳入某个验证的程序，那么，原文和译文便构成相同的陈述的总体。或者说在某一宏观历史的范围里，我们可以认为“物种进化”这样的断言对于达尔文和辛普森来说形成相同的陈述；在某一更具体的层次上和在考虑到更为局限的使用范围时（《新达尔文主义》与纯粹达尔文主义体系相对立），我们便接触到两个不同的陈述。陈述的永恒性、陈述在经历陈述的各种特殊事件后保持其同一性，通过形式的同一性保持其双重性，所有这一切是陈述被界定其中的使用场的功能。

我们看到，陈述不应该被作为某个可能在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件，而且完全可能在某个记忆行为中被忆及——并从远处得到庆贺。但我们也看到它也并非是理想的形式：我们在任何物体、无关紧要的整体中，在任何物质条件下，都能够永远加以现实化的理想形式。陈述被过分地重复，使它不能完全地与它出现时的时空（它不是它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配合联系起来。陈述与它周围和支撑它的东西的关系过分密切，使它不能像某个纯粹形式（它不是涉及某个成分的总体的构成规律）那样自由，陈述被赋予了某种可变的重负，某种与它置身范围相关的重量，某种允许多种用途的恒常性，某种不具有简单印迹的惰性并不沉迷于自己的过去的永恒性。一个陈述能够重新开始，或重新得到引述，而一个形式（语言的

或逻辑的)则能够再次被现实化。陈述,它自身具有被重复的能力,但永远只限于严格规定的条件下。

这种标志着陈述功能的可重复的物质性能够使陈述显现为特殊和荒悖的对象,而且还显现为所有人们制造、操作、使用、转换、交换、配合分解和再组合有时甚至毁灭的对象之一。陈述不是一经说出就一成不变的东西——而且,或像某战斗的决定、某地质灾害,或某个国王的驾崩那样,消失在过去——,陈述,在它出现在它的物质性中的同时,也带着某种结构出现,它跻身于各个网络之中,寓居于一些使用范围中,把自己奉献给可能的转换和变化,被纳入在某些操作和某些策略中。此间,它的同一性或保持下来,或消失殆尽。因此,陈述是流动的、效力的和逃逸的,陈述有助于或者阻碍实现某种欲望,顺从或者违背某些利益,投身于质疑和斗争之列,成为适应和竞争的主题。

3 陈述的描述

分析的面已经有了很大变动。我曾想在这里重新使用开始时被搁置一旁的陈述的定义。一切都过去了,而且一切已经说出来,好像陈述是一个容易确立的单位,问题只在于描述它们的组合的可能性和规律。然而,当我回首时,发现我不能把陈述作为一个语言类(它高于音素

和词，低于本文)的单位来确定，但我又发现我所接触的更像是某种陈述的功能，它调动起各种不同的单位(这些单位有时即为句子，有时即为命题，但是有时它们是由句子的某些成分，一些符号的系统或图表，由命题或同类的表达所构成)，而且，这种功能不但没有赋予这些单位以某种“意义”，而是使它们同对象的范围建立关系；不但没有赋予它们某一主体，而是为它们提供某个可能的主观位置的整体；不但没有确定它们的界限，而是把它们置于某一协调的和并存的范围中；不但没有确定它们的同一性，而是把它们置于某个它们被投入、使用、重复的空间。简言之，表露出来的不是原子的陈述——连同它的意义的效果、它的起源、它的界限和它的个体性——而是陈述功能的实施的范围和这种功能借以产生各种单位的条件(这些单位可能，但也不一定是语法或者逻辑范围的)。但是，我现在必须对下面两个问题作出回答：最初提出的描写陈述的任务意味着什么？陈述的这一理论怎样才能同话语形成的分析协调一致？而这种话语形成的分析在这种理论出现之前早已有了雏形。

一

1. 首先要确定词汇。如果我们同意把每一个确实从某一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符号的整体称为词语性能，或者更确切地称为语言性能的话，我们便可把在某种材料基础上并根据一种确定的形式得以

产生这一符号群的个体(或者勉强可以说是集体)的行为称为表达,因为表达是一个事件,根据时空的契合,照理它总是可以识辨出来的,它总可以同某个作者联系起来,而且有可能自己构成某个特殊的行为(英国分析家们称之为“性能的”行为);我们将把语法或者逻辑学能够在某一符号整体中识别出的那些单位称为句子或者命题,因为这些单位总是以那些出现在其中的成分和把这些单位联系起来的规则为标志的;与句子和命题相比,起源、时间和地点以及语境问题都只是补充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对它们进行纠正的问题(即使在“可接受性”的形式下出现也罢)。我们将把这一符号整体所特有的存在方式称为陈述:这种存在方式使陈述有别于一系列的痕迹,有别于某个实体上的一连串记号,有别于人为的任意一样东西;这种方式使陈述同某一对象的范围发生关系,使它为每一个可能的主体保留一个确定的位置,使它置于其他的词语性能之中,总之,它被赋予某种可重复的物质性。至于话语这个术语,我们在此从各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及至滥用了它,我们现在能够理解它之所以模棱两可的理由:它以最一般和最不确定的方式表示词语性能的整体;因此我们曾把话语理解为事实上是从符号的整体产生出来的(可能是全部的)东西。然而,我们也曾把它理解为表达行为整体、一系列的句子或者命题。总之,——就是下面的意义最终被接受了(前面的意义作为它的背景)——话语是由符号序列的整体构成的,前提

是这些符号序列是陈述，就是说，我们能够确定它们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如果说我能够像我将要阐述的那样指出上述体系的规律恰好是我始终称为话语形成的东西的话，如果说我能够指出话语的构成不是表达、句子和命题的扩散和分配原则，而是陈述(在我赋予此词的意义上)的扩散和分配的原则的话，话语这个术语就可以被确定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正是这样，我才能够说临床治疗话语、经济话语、博物史话语和精神病学话语。

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些定义大部分都不符合日常习惯：语言学家们习惯赋予话语以完全不同的意义；而逻辑学家和分析家们则赋予陈述这个术语以不同的意义。但是在此我不想把也许在其他领域形成的概念游戏、分析形式、某种理论转移到只能由这种理论解释的范围；我不想使用某种模式，将它特有的有效性应用于某些新的内容中去。当然，我不是要对上述模式的价值提出质疑，不是在证明它之前就限制它的意义，并且武断地指出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是，我想揭示某种描述的可能性，勾划出它可能占有的范围，确定它的界限和它的自律性。这种描述的可能性同其他的可能性相连结，而不与它们分离。

我们十分清楚对陈述作分析并不意味着这是对“语言”，或者对“说出来的东西”的一个完整的透彻的描述。在词语性能所包含的整个深度中，陈述的分析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层次，这个特殊的层次应该从其他层次中分离

出来,同它们相比它具有自己特色,而且是抽象的。特别是它并不替代命题的逻辑分析、句子的语法分析、表达的心理或语境分析,因为它构成另外一种研究词语性能,分解它的复杂性,区分它的盘根错节的术语和识别它所遵循的各种规律性的方式,我们使用陈述以同句子或者命题对比,并不试图寻找回失去的整体性,也不想重现生动的言语的完整性、词语的丰富性、逻各斯的深层单位,就像受不甘沉默的思念之情激励那样。对陈述的分析符合某个描述的特殊的层次。

2.因此,陈述不是一个用来补充或者参与到由语法或者逻辑所描述的那些单位的基础单位。它不能像句子或者表达行为那样独立出来。描述陈述不等于区分和标志横向段,而是要确定一些条件,那种赋予一系列的符号(它们不一定是语法或符合逻辑结构的符号)以某种存在,乃至特种存在的功能在这些条件发挥作用。这种存在产生一系列符号,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痕迹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更像是同某一对象物范围有关的东西;不是作为个体行为或者行动的结果,而更像是某一主体的可能位置的游戏;不是作为某种有机的、自律的、自我封闭的和独自可能形成意义的整体性,而更像是某个共存范围中的组成成分;不是作为某种会消逝的事件或者无生气的事物,而更像是可重复的物质性。对陈述的描述在纵向上针对不同的含义整体的存在条件。由此出现了一个悖论,即:对陈述的描述并不设法绕过词语性能,以便在

它们的背后，或者在它们的明显的表层下面，发现某种隐藏的成分，发现某种深躲在其中或者通过它们表露出来而不说出的隐秘的意义；然而，陈述不是直接可见的；它不像语法或者逻辑结构那样明显地出现（尽管后者不是完全清晰的，尽管它很难被确定），陈述既不是可见的，也不是隐藏着的。

从定义上看，陈述不是隐藏着的，因为它标志着确定已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符号的存在方式。对陈述的分析仅能针对那些已说出来的东西，那些确实已说出或者写出来的句子，那些被勾划或者发出声来的有意义成分——更确切地讲，是针对使它们存在，把它们呈现在眼前，供人阅读，有可能复用，可作种种用途或转换，在它物之中而又非它物的这种特殊性。对陈述的分析只能涉及那些已实现了的词语性能，因为它是在它们存在的层次上对它们进行分析的，即：描述那些已说出的事物，这恰恰因为它们已经说了出来，因此，对陈述的分析是一个历史的分析，但它无需任何的解释：对于那些已说出的东西，它不寻求它们隐藏着什么，不寻求它们之中什么东西早已被说出和在它们的不觉中所包含着没说出的东西，以及寓于它们之中的思维、形象或者幻想的丰富性；而是相反，它寻求的是它们以什么方式存在，它们被表现出来意味着什么，它们留下的痕迹是什么，也许还有，它们已经显露的是什么，——其他任何的东西取代不了它们。从这个观点上看，我们不承认有潜在陈述，因为我们所涉及

的是实际语言的明显性。

这是一个难以答辩的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也许自从人类会说话以来——往往说张三指的是李四;同一个句子可以同时有两个不同的意义;一个被人们毫无困难接受的,明显的意义可能包藏着另一个神秘的或者有预言性的意义,而它终究会被精明的识辨者或者随着时光的流逝发现;在一种可见的表达形式下,可能存在着另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控制它、搅乱它、干扰它,强加给它一种只属于自己的发音。总之,不论怎么说,已说出的事情包含着比它本身更多的含义。但是事实上,这些增或减的效果,这个表达出来的没被说出的东西无论如何影响不了陈述——至少是这里所确定的那种陈述。多义性——它要求对古文作解释和发现其他意义——涉及到句子和由它使用的语义场:词的同一个和独一的整体可以产生出许多意义和许多可能的建构;因此会有各种交错的或是交替的意义,但这必须始终在相同的陈述行为的基础上。同样,一个词语性能对另一个词语性能的抑制,它们之间的替换或是相互干扰都属于表达层次中的现象(即使这些现象在语言或者逻辑结构上有一些偶然的关系);但是,陈述本身不会受这种缩减或者抑制的影响,因为它是被实现的词语性能的存在方式。陈述不能被看作是好几个吐词模糊的、相互堆砌的、游移的陈述加以并合或者凝聚的结果。陈述没有被那些没有说出的东西,隐藏的意义和抑制的秘密在场所萦绕;相反地,这些隐藏成

分起作用的方式和它们能得以恢复的方式取决于陈述方式本身,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说出的东西"和"被抑制的东西"是不相同的——无论是它的结构还是它的效果——当这涉及到数学上的陈述和经济上的陈述时,当它是某一部自传或是某一暇想的叙述时。

然而,对于所有这些能在陈述范围中被识辨出来的没有说出的东西的各种不同方式,无疑应该补充上一点*不足*,这种不足不仅不是内部的,而可能与陈述范围相关联,它可能在确定其自身存在中发挥作用。实际上,可能存在着——无疑在陈述表露的条件中,一直存在着排斥、限制或者缺陷,它们分割着陈述的参照系,赋予方式的惟一体系以有效性,限定和封闭并存的群,拒绝某些使用的形式。但是,无论在它的地位中,还是在它的效果中,都不应把标志陈述规律性的这种不足与在已表达出来的东西中的那些隐埋的意义混淆起来。

3.不过,尽管陈述没有被隐藏,但它并不因此是可见物;它不能作为它的界限和它的特征的明显的载体而呈现给感官。想识别它和对其自身进行观察,需要转变看法和态度。可能它是一种极其熟识的东西,但它却总躲避着;也许它像那些熟悉的透明体,虽然在其深处并无任何暗藏物,却又不因此明澈见底。陈述的层次就在它本身的近似性中形成。

这里面有多种原因,第一个理由已经说过,即:陈述不是一个与句子或者命题相邻——上面或者下面——的

单位；它总是被纳入到这类单位之中，或者甚至被纳入到不遵循它们的规律（它们可能是单子，或许是系列、表格）的符号序列之中；它所标志的并不是表现在它们身上的东西，或者它们被划定的方式，而是标志出它们被给定的这个事实和它们被给定的方式。陈述具有的这种“有”的几乎不可见性，而这种几乎不可见性在我们能够说“有什么或什么东西”时便自行在其中消失。

另一种理由：这是因为语言的意义结构总是反射到它物上；对象在其中被确定；意义在其中得以确切；主体通过一些符号被反映，即使它并没有在场。语言似乎总是密布着它物、异地、间距和遥远；它是一个被掏空的东西。它难道不是一个自身以外的它物显现的场所？从这一功能上看，它自身的存在不会消失吗？不过，如果我们想描述陈述的层次，就应该考虑到这种存在本身；应该在产生语言的范围中，而不是在语言反射的方向上探究语言；应该忽略它的确指、命名、指明、显示以及作为意义或真实之地这种能力，而是相反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决定它的特殊和被局限的存在的时刻上——一旦被固定下来，立即就进入能指和所指的游戏中。这意味着在语言检验中，不仅要将所指的观点（现在人们已经有此习惯了），还要把能指的观点暂放一边，以便显示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在这儿还是在那儿，都存在着与对象范围和可能的主体相互关联的，与其他的表达和可能的再使用相关联的语言。

陈述的这种近乎不可见性的最后一个原因是：陈述是被语言的所有其他的分析假设出来的，而这些分析无需对陈述加以阐明。为了使语言成为对象，分解成不同的层次并得到描述和分析，就需要有一个总是可以确定的和非无限的"陈述的给定物"。因为语言的分析总是在话语和书面材料的素材上进行的；对那些暗含意义的阐释和揭示总是基于某一限定的语句群；某一系统的逻辑分析在重写中，在明确的语言中，包含着命题的既定整体。至于陈述的层次，它总是每每被中性化：它仅仅被确定为具有代表性的样品，这使一些不定地可应用的结构得以释放；或者它形成于一种纯粹的表面性中，而另一种话语的真实性将在它后面显示出来，或者它作为某种无关紧要的实体，用来作一些形式关系的支撑物。陈述层次每每都成为进行分析所不可缺少的东西，这对于分析本身来说，使它失去了贴切性。如果我们对此补充说，所有这些描述只有在它们自身构成陈述的确定的整体时才能进行的话，我们就会懂得为什么陈述的领域从各方面包围着这些描述，为什么描述不能从中解脱和为什么它们不能把它直接当作词干。对陈述本身的研究，并不是要超越这些分析或在某一更深的层次上去寻找可能被这些分析略去的语言的某个秘密或者某种根源，而是要使构成陈述的可能性成分的这个如此接近透明的东西变成可见的和可分析的。

陈述的层次没有被隐藏起来，但也不是可见的，它是

语言的极限，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投入到(即使非系统地也罢)直接经验中的符号整体，但是它也不是在其身后没有表达出来的神秘而无声的余迹。它确定自己出现的方式，即：与其说是它的内部组织，不如说是它的外围；与其说是它的内涵，不如说是它的表层。但是，我们能描述这个陈述的表层，这证明语言的“给定物”并不是对根本的缄默加以一般的揭示；证明词、句子、意义、断言、命题的连接不是直接依托在某一缄默的表层上，而是证明一个句子的突然出现，意义的闪现，名称的突然确指总是在陈述的某种功能发挥作用的范围里发生的；证明在我们所读和所听到的语言，另外还有我们说的话语与缺乏表达手段之间，并不存在几乎没说出的各种事物，各种半吐露的句子，各种只部分表达的思想和仅仅表达了只言片语的无穷的独自的密集堆挤现象；而首要的是——不管怎么说，先于陈述层次，(因为它依赖于条件)——陈述功能借以实施的条件。它表明想在语言的结构，形式或者解释性的分析之外，寻找主体的自由、人类的辛勤或者超越目的开放能在其中展开，并摆脱了一切实证的某个范围是徒劳的行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出来反驳语言学的方法或者逻辑分析：“你滔滔不绝地谈及了语言构成的规律，你把具有充满躯体，充满活力的语言本身用来做什么？你怎样处理这种自由，或者这种对一切意义都构成先决条件的内容，如果没有它们，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在他们离不开语言的工作中彼此和睦共处？你不知道吗，这

些使话语无限性成为可能，但又不能把这种无限性建立起来和对其进行阐述的系统一旦被超越，我们所发现的是某种超越性的标记，还是人的创作？你是否知道你只是描述了语言的某些特征，而这种语言的出现和存在方式从你们的分析看来是完全不可减缩的？"这些异议应该给予排除，因为如果说确实存在着一个既不属于逻辑又不属于语言的范围的话，那么它也不会因此成为重建的超越性，也不会是重新开辟的通向无法接近的渊源的道路，也不会是由人所完成的自身意义的构成。语言在它即将出现和将具有存在方式之时，便是陈述。作为陈述，它属于一种既不是超验的，也不是人类学的描述。对陈述作分析并不对语言或者逻辑分析规定它们应该否认和承认它们的无能的界限；对陈述的分析并不标志圈定它们领域的界限；它在另外一个与语言或者逻辑的分析交叉的方向上展开。对陈述分析的可能性，如果它已确立的话，则应能用来拆除先验的根基，因为某种哲学话语的形式以语言的存在和它可能渊源的基础的名义，用这个先验的根基，同所有的语言分析相对立。

二

现在我要转移到第二类问题上来，即这样确定下来的对陈述的描述怎样能够同我在前面简述其原则的话语的形成的分析相一致？反过来说，在怎样的程度上，我们可以按我刚才赋予这个词的意义认为，话语形成的分析

就是一种陈述的描述？对于这样的问题，十分有必要回答，因为我从事已久并曾经相当盲目地加以发挥的这项研究，而我现在——哪怕是重新调整这项研究，重新纠正它的许多谬误或许多不妥之处——试图重新把握整体轮廓的这项研究，正是应该在这一点上作定论。这一点已经可清楚看到：我不试图在这里谈及我过去在某个具体的分析中曾经想作些什么，头脑中曾有的设想，我所碰到的阻碍，不得不作出的放弃，以及我能够获得的那些多少还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不描述某个实际的过程以指出它本来该是什么样和今后又会是什么样；我试图在这个过程的本身上阐明——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提出要求——某种我曾使用过的，但又不十分了解它的约束性和来源的描述的可能性。与其研究那些我说过的东西和那些我本来可能说的东西，我宁愿力图在它本身特有的而我过去不能准确把握的规律性中，揭示那些使我说过的东西成为可能的东西，但是，人们同样可以看到，我在这里不对某种从严格意义上讲的理论进行发挥，即：从某些公理，从可应用于无数的经验主义描述的抽象的模式出发作出的推理。如果说这样建树有可能实现的话，现在时机显然也未成熟。我不是要从作为基础的陈述的定义中推论出话语的形成的分析，也不是要从话语的形成中推论出陈述的性质，正像我们能够从这样或那样的描述中对它们加以抽象化一样。我试图指出陈述，它们的组合原则以及它们所能构成大的历史的单位和用以描述它

们的方法有关系的范围怎样才能够无差错、无矛盾、无内在任意地被构成。我不使用线性演绎的方式而是用同心圆圈的方式。我时而指向最外围，时而又指向最内层，即：从话语中的不连续性和陈述的特殊性（中心议题）的问题入手，我曾试图分析外围的那些谜一般组合的形式，但是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些一致性原则不是语法的、逻辑的和心理的，从而它们不是针对句子、命题和表达的。这些原则要求我转向中心，转向陈述这个问题，要求我设法阐明陈述应该理解为什么。而且我将认为我没有建立某种严谨的理论模式，而是开释出一个结构严谨的描述领域，我如果不是建立了它的模式，至少也开创了并提供了它的可能性，如果说我能够"下这个结论"并指出话语形成的分析集中在陈述特殊性的描述上的话，简言之，假定我能够指出正是陈述特有的范围直接关系着测定话语形成的话。与其说要直接创立起一种理论——在有可能做到之前（我不否认我尚未达到这个目标）——毋宁说目前所要做的是建立一种可能性。

在检验陈述的时候，我们所发现的是关于符号的整体功能。这种功能既不能与语法的"可接受性"混为一谈，也不同于逻辑的矫正。为了得以实施，它需要：参照（这种参照不一定是事实，事物的状态，甚至也不是对象，而是一种区分的原则）；主体（不是说话的意识，不是表述者，而是在某些条件下可以由冷漠的个体填补的位置）；连结范围（不是表达的实际语境，即它被说出的境遇，而

是与其他陈述并存的领域);物质性(不仅是发音的实体或者支撑体,而是法则,书写的规则,使用的或者再使用的可能性),然而,我们在话语形成的名义下所描述的东西,严格地讲,是一些陈述群,就是说,是一些词语性能的整体,它们不是由语法关系(句法的或者语义的)彼此在句子的层次上连接起来,也不是由逻辑关系(形式的协调或者概念的连贯)彼此在命题的层次上连结起来,也不是由心理关系(意识形式的同一性,心理的恒定,或者某个设想的重复)在表达的层次上连接起来,而是在陈述的层次上连接起来。这意味着我们能够确定它们的对象所遵循的一般规则,有规则地分配它们所谈及东西的分布形式,它们的参照系统;这还意味着我们确定陈述的不同方式所遵循的一般规则,主观位置的可能分布;这意味着我们能够确定所有相连接的形式,所有可能的、相继的、同时的,确定并规定它们的那个体系;重复的形式的共同的,以及把这些共存的领域联在一起的体系;最后还意味着我们能够确定这些陈述地位所遵循的普遍规则,它们得以制度化,被接受,被使用,重新使用,并相互结合的方式,它们借以成为适应的对象,为实现欲望或者利益的工具及某种策略的成分那种方式。描绘陈述,描述它负载的陈述功能,对这种功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些条件加以分析,涉及这种功能所假设的各个不同领域,以及这些领域相连接的方式,这就是试图揭示那些像话语形成那样能被个体化的东西,或者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话语形成

是指某个词语性能群所服从的陈述的一般体系——这个体系不是独一地支配这个词语性能群，因为它在其他的范围中还服从逻辑的、语言的、心理的体系。那些被作为“话语形成”确定下来的东西强调在陈述的特殊的层次上被说出的事物的一般方面。我们在分析它时所涉及的四个方面（对象的形成，主体位置的形成，概念的形成，策略选择的形成）与陈述功能实施的四个领域相吻合，所以，如果说话语形成较之本文或者书上的重要的修辞单位自由的话，如果说它们无需把演绎结构的严密性作为法则的话，如果说它们不同于某一作者的作品的话，这是因为它们以那种标志陈述层次的规则性涉及陈述的层次，而不涉及句子的语法层次或者逻辑层次，或者表达的心理层次。

我们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一些属于所有这些分析核心的命题。

1. 我们可以说，话语形成的识别不受其他可能的统一原则的支配，它揭示出陈述的特殊层次，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说，陈述的描绘和陈述层次构成方式的描述通向话语形成的个体化。这两种作法同样都是可以解释的和可转向的。陈述的分析和形成的分析相辅相成，当建立这种理论的时机最终来到时，应当确定出一个演绎的秩序。

2. 陈述属于话语形成就像句子属于本文，命题属于

演绎整体一样。然而，句子的规则性是由某种语言的规律所确定的，命题的规则是由某一逻辑的规律所确定的，而陈述的规则性则是由话语形成本身所确定的。它的所属和它的规律是同一事物；这并不是悖论，因为话语形成不是由结构的原则标志的，而是由事实的扩散所标志的，因为它对于陈述来说不是可能性的条件，而是并存的规律，还因为陈述，反过来说不是可互换的成分，而是由它们存在的方式所标志的整体。

3.因此，我们现在能够赋予前面提到的“话语”的定义一个完整的意义。我们将把话语称为陈述的整体，因为它们隶属于同一个话语形成；这个语句的整体不形成某个修辞的，或者形式的，可无限重复的单位和我们能够指出（如果需要，还可以解释）它在历史中的出现或者被使用的单位；它是由有限的陈述构成的，我们能够为这些陈述确定存在条件的整体。这样理解的话语不是一个理想的和超越时间的，也许另有某种历史的形式。因此，问题不在于追究话语是怎样和为什么能够出现，并在时间的这一点上形成；它始终是历史的——历史的片断，在历史之中的一致性和不连续性，它提出自己的界限、断裂、转换、它的时间性的特殊方式等问题，而不是在时间的同谋关系中它突然出现的问题。

4.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准确地说明这个被称为“话语的实践”的东西。我们不能把它同表达行为混淆起来，个体通过这种表达行为来表述思想、愿望、形象；也不能同

理性活动混淆起来，这种理论活动可以被用于某个推理系统中；也不能同某个说话的主体在构造语法句子的时候所具有的“能力”混淆起来：说话的实践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这些规律总是被确定在时间和空间里，而这些时间和空间又在一定的时代和某些既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者语言等方面确定了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

现在，我还要做的是推翻分析，并且准备在把话语形成同它们描述的陈述对照之后，从另一个方面，从外围寻找这些概念的合理使用：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它们是怎样在其他的描述方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它们可以改变和重新划分思想史的范围。但是，在推翻这分析之前，为了更可靠起见，我还想在我刚刚开辟的领域赘述数言，并想说明陈述的范围以及强调它的形成的分析所要求和排斥的东西。

4　稀少性、外在性、并合性

陈述的分析注重稀少性的效果。

在大部分时间中，话语的分析被置于总体性和过剩性的双重符号之中。我们指出所接触到这些不同的本文是如何彼此关联，如何构成独一的形态，如何同规则和实践聚合，以及它们如何具有整个时代的共同意义。每一

个被考虑的成分都被作为某种总体性的表现接受下来，这成分属于这种总体性，并被这种总体性所超越。因而，人们用一种划一的从不曾说出的大本文替代那些被说出的事物的多样性，而这种大本文第一次把人们以前不仅在他们的言语和本文、话语和叙述中，而且还在他们创出的制度、实践、技术和物品中，"曾想要说的"东西加以阐明。同这个内含的、主宰的和共同的"意义"相比，陈述在激增中显得过剩，因为所有的陈述都归到这种意义，而且只有这种意义构成它们的真实性，即：同这个独一的所指相比，能指成分是过剩的。但是，由于这个最初和最终的意义是通过明显的表达产生的，由于这种意义隐藏在显现出来的东西之下，并暗中分解这些东西，所以，每个话语都具有言非所言和包含多层意义的能力，即：与独一的能指相比，所指过剩。话语经过这样的研究便成为既充实又具有不确定的丰富性。

陈述的分析和话语形成的分析开创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研究方向：它旨在确定已经表达出来的仅有的能指整体借以出现的原则。它试图建立一条稀少性的法则。这项任务包括好几方面。

——这项任务的基本原则是：说出的东西永远不是全部；同那些也许在自然语言中已被表述的东西相比，同那些语言成分的无限的结合相比，陈述（尽管其数量众多）总是欠缺的。从人们在某个既定时代中所掌握的语法和词汇的宝库看，总的来讲，只有比较少的东西已说

出。因此，我们要寻找这种稀少原则或者至少寻找这个由语言开创的可能的表达范围的不充满原则。话语形成既是作为话语错综复杂中的断裂原则，也是作为语言领域中的空亏原则出现的。

——我们要在使陈述与未说出的东西相隔离的界限上，在使陈述出现并排斥其他所有的陈述的审定中研究陈述。问题不在于让围绕这些陈述的缄默开口说话，也不意味着要找回所有在它们自身或在它们身旁早已不作声或被迫沉默下来的东西。也不在于研究那些阻止了某种发现，妨碍了某种表达，压制了某种陈述的形式，某种无意识的意义或是某种变化中的合理性的种种障碍，而是要确定一个有限的在场的系统。因此，话语形成不是一个正在发展着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具有自身的活力或者自己特殊的惰性，并把它不再说的，尚未说的，或者此刻同它唱反调的东西随身带进未表达出的话语中。它不是一个丰满的和难得的胚体，它是对空白、空缺、欠缺、局限和分割的分配。

——然而，我们不是要把这些“排斥”同某种抑制或者某种压制联系起来；我们不认为在这些表露在外的陈述下面存在着某种隐藏起来和隐蔽的东西。我们所分析的陈述不是那些占据着其他的处于表露线以下的陈述位置的陈述，而是那些永远处于自己位置上的陈述。我们把它们转移到另一个可能被全面展开，并且不包含任何重复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下，不存在任何本文，因此，也

就不存在过剩。陈述的范围完全在它的表层，其中每一个陈述都占据着只属于它自己的位置。因此，对于陈述来说不是要发现它占据的位置是属于哪个“没有说出的东西”，也不是怎样才能使它屈服在某一沉默的和共同的本文中；而是恰恰相反，它要发现陈述占据着什么样的特殊位置，什么样的分类在形成系统中能测定它的位置，它怎样在陈述的普遍的扩散中被区分出来。

——陈述的这种稀少性，陈述范围的这种欠缺而且割裂的形式，以及总的来说只有为数极少的东西能够被说出的事实均可以解释为：陈述不同于我们呼吸的空气，它不是一个无限的透明体；而是一些被转让和被保留的东西，一些具有某种价值，人们想方设法去占有的东西；是人们重复，复制和转换的东西；人们为它们预制轨迹，并赋予它们在机制中某个地位；它们是人们不仅用抄写或者翻译的方法，而且通过注释，评论和意义内部派生使其增量的东西。因为陈述是稀少的，人们在把这些陈述统一起来的总体性中搜集它们，并使它们中的每一个的意义更加丰富。

话语形成的分析不同于所有这些解释，这些解释的存在本身只有通过陈述实际的稀少性才成为可能，而这些解释又恰恰不承认陈述的这种稀少性，并且反过来把已说出的东西的高度的丰富性当作主题，而话语形成的分析将视线转向这种稀少性本身；把它看作是外在的对象；话语形成的分析试图确定稀少性的特殊的系统；并同

时阐明在这个系统中,可能得到某种解释。解释是一种对陈述的贫乏作出的反应和用意义的倍增来对这种贫乏作补偿的方式;也是一种基于这种贫乏而又不受它限制的说话方式。但是,分析话语形成是寻找这种贫乏的规律,测量它的程度,确定它的特殊形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衡量陈述的"价值"。这种价值不是由陈述的真实性决定的,不是由某一神秘的内容的在场来评定的;而它不仅在话语的节省上,而且通常还在稀少的来源的管理方面标志着陈述的位置,它们的流通和交换的能力,它们转换的可能性。对话语作这样的理解,它就不再是持解释态度的东西了: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人们总能够从中汲取新颖的,并且每次都是预料不到的财富,一种神明:它总是能预先把话说出,并使人们听到回顾的神谕,只要人们善于聆听;它像一笔财富——确定的、局限的、令人渴望的、有用的财富——它不仅有自己出现的规律,而且还有自己适应的和使用的条件,因此,从这种财富存在之时起(并不仅仅指在它的"实际应用"中),便提出了权限问题;本质上,这种财富是斗争的对象,而且是政治斗争的对象。

另一个特征是:陈述的分析把它们放在外在性的系统形式中来研究,一般说来,对那些已说出的东西所作的历史描述完全被内在和外在之间的对立所贯穿,并且完全服从于从这种外在性——它只是偶然性或者纯粹的物质的必然性,可见的实体,或者不确定的表现——回到内

在性的基本核心的任务。研究已说出的东西的历史，却是从另一方面上重作表达的形容工作，即使得在时光流逝中保存下来并散布在空间的陈述回溯到先于它们的秘密内在，这种秘密内在停滞在它们身上并被“表露”(从该词的各种意义上讲)。作为基础的主观性的核心正是这样得到解放的。这种主观性往往总是置于明显的历史的背后，并在各种事件掩盖之下发现另一种更严肃、更秘密、更根本、更接近起源、更紧密地连接着它的极限范围的历史(因而更能主宰规定性)。这另一种历史在历史的下面流动，不断地抢在它的前面，并不确定地搜集过去，我们完全可以——用社会学或者心理学的方式——把它描写为精神思想的演变，我们完全可以在逻各斯的追忆或者理性的目的论中，赋予它以某种哲学地位；我们最后还可以在对某一痕迹的盖然判断中将它澄清，这个痕迹可能先于所有话语，是笔录的开始和被推延的时间的间隔，被再次确定的永远是历史先验论的主题。

这正是陈述的分析试图超越的主题，以便在陈述本身纯粹的扩散上重建陈述；以便在显然是悖论的外在性中分析它们，因为这种外在性不参照任何一个内在性的逆反形式；以便在它们的不连续性中考察它们而不是通过某种使它们脱离轨道和使它们变成无足轻重的间距把它们归结于某一个起始或者一种更基本的差别；以便在它产生的地点和时间中重新捕捉它们介入的本身和重新找到它们的事件的偶然关联。显而易见，与其谈论外在

性，不如谈论“中性”。然而，这个词本身过分地容易同信仰的暂失，同一切存在位置的消失或把它置于题外联系起来，而问题所在是要发现这种外表，正是在这种外表上，陈述的事件分布在它们相对的稀少性中，在它们空缺的毗邻中，在它们展开的空间中。

——这项任务假定陈述的范围未被描述为行动的“体现”或发生在其他地方(在人类的思想中，在他们的意识中或在他们的无意识中，在先验结构的范围中)的过程的“体现”；而是陈述的范围在它的经验的朴实性中作为事件的、规律性的、建立联系的、确定的变化的、系统转换的场所而被人们所接受；简言之，假定人们根本不把它作为结果或者另外一种事物的痕迹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一个自律的(尽管是从属的)和人们可以在它自身的层次上对其进行描述的(尽管需要把它同它以外的事物连接起来)实际的范围来探讨。

——这项任务还假定这个陈述的范围既不参照个别的主体，也不参照像集体意识这样的东西，或者先验的主观性，而是人们把它作为某个匿名的范围来描述。这个范围的外形确定说话的主体的可能的位置。不应再参照主宰的主观性来安置陈述，而应当在说话的主观性和各种形式中来辨认陈述范围的特有效果。

——因此，这项任务假定陈述的范围在它的转换中，在它的连续中，在它的派生中，并不服从于意识的时间性，像服从它必须遵循的模式那样。

——不要希望——至少在这个层次中和在这种描述的形式中——能够写出一部被说出的东西的历史，这部历史可能同时在它的形式中和在它的规律性中以及在它的性质中成为某个体或者匿名的意识的，某项计划的，某个意愿系统的，某个目标的整体的历史。话语的时间不是思维的模糊时间在可见的编年史中的体现。

因此，陈述的分析是在不参照我思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并不提出诸如谁说话的问题，此人是表露还是隐蔽在他所说的话中的问题，他在说话时是否享有自主的自由的问题，或者他是否在不知不觉中服从于某些他没有察觉到的限制等问题。事实上，它处于"人们说"的层次上——由此，不应该理解为某种强加于每个个体的共同的观点、集体的体现；不应该理解为一个必须会通过每个人的话语而说出的匿名的响亮的声音；而是应该理解为已说出的东西的整体，能够从中观察到的关系，规律性和转换，以及某些形态、某些交错现象的领域，即它们指出说话的主体的特殊位置，以及能够接收某一作者的名字。"任何人都在说话"，但是，他所说的话，不是不顾场合的。他必然被纳入到某种外在性的游戏中。

陈述的分析的第三个特征是：它针对某些并合的特殊形式。这些形式既不同于回忆形式中的内在化，也不同于文献式的千篇一律的总体化。一般说来，当我们在分析那些已经使用的话语时，我们把它们看作带有某种根本无生气的话语：它们是被偶然性保存下来的，或者是

由于人们的精心安排和人们对自己言语的价值和永恒的威严给自己制造的幻想。但是,如今这些话语仅仅只是一些在图书馆的尘土下面堆积着的字迹,这些字迹自从它们问世以来,自从它们被遗忘和它们的可见的效果在时间中消逝以来,一直沉睡着,始终如此,它们至多有幸被读者发现,再次有人捡起,它们被发现是某些同它们的陈述有关的符号载体。这些符号一旦被辨读出来,至多可以通过某种久经时间考验的记忆解救某些被深埋的意义、思想、愿望和幻觉。这四个词:阅读—痕迹—识辨—记忆(不管人们赋予它们中的哪一个以多大的特权,不管人们赋予它以多大的寓意范围,这寓意范围能使它包含其他三个词)都确定着这样一个系统,即它可以根据习惯使过去的话语从它的惰性中解脱出来并在片刻间重新发现某些它已失去的活力。

不过,陈述的分析的本质不是要把本文从它们的现时睡梦中唤醒,以便在诅咒它们的表层上尚可看清的符号的同时发现它们诞生的光明,相反,是要随着它们的沉睡而去,或者更确切地说,除那些类似睡梦、遗忘、失踪的渊源这类主题,进而在陈述得以存在,被保存,重新具有活力,被使用,以及被忘却乃至被毁灭(并非由于初宗)的时间长河中寻找什么样的存在方式可以独立于陈述行为之外,来标志出陈述。

——这种分析假定陈述是在它们特有的暂留中被考察的,这种暂留不是那种使表述中的过去事件成为现时

的参照式的暂留。我们说陈述是暂留的，不等于说它们停留在记忆的范围里或者说我们可以重新找到它们当初想表达的东西；而是说它们得以被保存下来全在于一些载体和一些物质技术条件（书籍显然只是其中之一），一些类型的机构（图书馆便是许多类型中的一种），一些存在的方式（当涉及到宗教经书，法规或者科学真理时，是不相同的）。这还意味着陈述被置于那些应用它们的技术中，那些由它们派生出来的实践中，那些通过它们而得以构成，或者被改变的社会关系中。最后还意味着事物不再有完全相同的存在方式，没有与其周围的事物完全相同的关系系统，完全相同的使用模式，在它们被说出之后也没有完全相同的转换的可能性。这种历经沧桑的维持远非某种昙花一现的存在的偶然的或者幸运的延长，这种暂留完全属于陈述；因此，遗忘和毁灭只是这种暂留的零度。记忆和回忆的作用在暂留构成的背景上得以发挥。

——这种分析还假定人们是在陈述特有的可加性的形式中研究它们的。事实上，连续的陈述之间组合的类型不是在什么地方都是相同的，而且陈述也从来不是通过连续的成分简单重叠或者并列发展的。数学陈述不像宗教经文或者法律条文那样相互追加（它们各自具有相互构成、相互抵销、相互排斥、相互补充，以及形成几乎不可分离和具有特殊性能的特别的方式）。此外，这些可加性的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属于陈述的确定种类：今

天的医学观察资料汇编并不遵循与18世纪医疗病例集子相同的写作规定，现代数学也不是在与欧氏几何学相同的模式上积累它们的陈述的。

——陈述的分析最后还假定人们考虑循环现象。每个陈述都包含着一个同它所处位置相比先于它的成分的领域。但是，每个陈述都有能力根据新的关系重新组合和重新分布这个领域。陈述构建自己的过去，在先于自己的东西中确定自身的延续关系，再现那些使它成为可能或者必要的东西，排斥与它不能相容的东西。陈述把这种陈述的过去作为已知的真实，作为发生了的事件，作为可加以改变的形式，作为转换的物质，或者作为人们可以谈论的对象等等。与所有这些循环的可能性相比，记忆和遗忘，对意义的再发现或者压制，都远远不能成为基本规律，而只是一些特殊的形态。

因此，陈述的和话语形成的描述应该摆脱回归的如此频繁和如此固执的形象。它不试图超过一段可能只是直落、潜伏、遗忘、覆盖或者游移的时间，回到创世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里，言语尚未被用到任何物质性之中，尚不具有任何的坚韧性，它处于起始的未确定的范围之中。它不试图为已说出的东西建构第二次产生的反常的瞬间；它不祈求在回归点上出现光明，与此相反，它在陈述被使用，但却在不断地改变、危及、打乱乃至有时摧毁的并合的深度中探讨陈述。

描述一个陈述的整体不同于描述某一意义的封闭和

过剩的总体性，而是如同描述一个有欠缺的和支离破碎的形态；描述一个陈述的整体，不是参照某种企图、思维或者主体的内在性，而是依据某种外在性的扩散；描述一个陈述的整体，不是为了从中发现起源的时刻或者痕迹，而是为了发现某种并合的特殊形式，绝不是要发掘某种解释，发现某个基础，释放某些组成的行为；也不是要决定某种合理性或者通览某种目的论。它是要建立我称之为实证性的东西。因此，分析某种话语的形成就是在陈述和标志陈述的实证性形式的层次上探讨某一词语性能的整体，或者扼要地说，是要确定某一话语的实证性的类型。如果用稀少性的分析替代总体性的研究，用外在性的关系的描述替代先验基础的主题，用并合性的分析替代起源的探寻算是实证主义者的话，那么我就是一个幸运的实证主义者，我很乐于接受这个称呼。我对我多次（尽管还有些盲目）使用实证性这一字眼，来泛指我曾试图理清杂乱的脉络，丝毫不觉得不快。

5 历史的先验知识和档案

话语的实证性——诸如博物学，政治经济学或者临床医学的话语——标志着这个话语历经时间沧桑并超越个人的作品，书籍和本文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当然不能用来判定谁说的是真实的，谁的推理严谨，谁最符合林

内或者布封、魁奈或者杜尔哥[1]、布鲁塞或者毕沙的独有的假设，它同样不能用来说明这些作品中哪一种最接近初宗或者极终，哪一种最彻底地提出某种科学的总体规划。但是它所能够揭示出来的东西是布封和林内（或者杜尔哥和魁奈、布鲁塞[2] 和毕沙）借以谈论"相同的东西"的那种尺度，因为他们位于"相同的层次"或者"相同的距离"，他们展开的是"相同的概念的范围"，是在"相同的战场上"相互对峙；它反之揭示出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达尔文与狄德罗所谈是同样的事物，为什么不能说雷奈克[3] 继承了范·斯维顿，或者为什么不能说热冯[4] 也是重农主义者。这种单位确定交流的有限空间。这个空间之所以比较有限，因为它还远远不具备科学从其历史演变——即从渊源直至当今的成就——的那种规模。然而这个空间比起作者之间能够相互发生影响的游戏，或者比起那些明显的笔战的范围都宽广得多。各种各样的作品，各处流传的书籍，所有这类属于相同的话语形成的本文，——许多作者，他们彼此认识或不认识，相互批评、贬低、抄袭，而又在不知不觉中相互聚首，他们固执地将他们各自独特的话语交叉在不属于他们的，连他们自己也看不清它的整体并且难以测量它的广度的网络中——

---

① 杜尔哥(1727—1781 年)，法国经济学家。

② 布鲁塞(1772—1838 年)，法国医生。

③ 雷奈克(1781—1826 年)，法国医生。

④ 热冯(1835—1882 年)，英国经济学家。

所有这些形态和这些各不相同的个体性在传递时不仅仅通过他们提出的命题的逻辑的连贯，主题的循环，某一被转让、被遗忘、被重新发现的意义的固执性；它们通过话语的实证性的形式进行传递。或者更准确地说，实证性的这种形式（和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确定着某个范围，而在这个范围中，一些形式的同一性，某些主题的连续性，某些概念的转移，某些论战的游戏也许可能得以展开。因此，实证性起着我们或许可以称为历史的先验知识的东西的作用。

这两个词并列一起产生强烈的效果。我想就此指出某种先验的知识，它也许不是判断的有效性的条件，而是陈述现实性的条件。这不在于发现能够使某一论点成为合法的东西，而是要区分出陈述出现的条件，陈述与陈述之间并存的规律，陈述存在方式的特殊形式，陈述存在，转换和消失所依据的原则。先验的知识不是指那些可能从未说出的，或者从未真正地经过实验的真实性的先验的知识；而是指某个既定的历史，因为这是确实已说出的事物的先验的知识。使用这个有点不妥贴的词的理由是这种先验的知识应该在陈述的扩散中，在所有由它们的不协调性产生的裂缝中，在它们的交叉和它们的相互替代中，在它们的不可统一的同时性和在它们的不可演绎的连续中阐述陈述；简言之，它要阐述话语不仅具有某种意义，或者某种真实性，而且还具有某部历史，即一部特殊的，不把话语归结于某种与它无关的变化规律的历史。

譬如：它应该指出，语法史不是某一部一般来说可能是理性的或者精神风貌的历史，一部由语法同医学、机械学或者神学共有的历史在语言和语言问题领域中的投影；但是它包含一种历史类型，——在时间中扩散的形式，连续的、稳定的和重新具有活力的方式，展开或运转的速度——这种历史类型专属于语法的历史，尽管它与历史的其他类型不无关联。再者，这种先验的知识脱离不了历史性，因为它不能在事件之上并在静止的天空中构成超越时间的结构；它被确定为标志着某种话语实践的规则的整体。然而，这些规则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由它们建立起关系的那些成分，而是在由它们所联系的这些成分的本身中产生的；而且如果它们不随同这些成分中的最小的成分变化的话，它们就会改变这些成分，并同它们一起转变成为一些决定性的界限。实证性的这种先验的知识不仅是某种时间扩散的系统，它本身还是一个可转换的整体。

对于这些其权限并非偶然地扩展的形式的先验的知识来说，这个整体是一个纯经验的形态；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它能够使人们在话语的实际变化的规律中抓住话语，因此，它应该能够阐述这样的事实，即在一定的时刻，这样的话语能够接收和使用，或者与其相反，排斥、遗忘，或者不予承认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结构。它不能阐述（通过诸如心理的或文化的起源等东西）某些形式的先验的知识；但是它可以使人们懂得这些形式的先验的知识如

何可以在历史中具有连接点、契入、突入或者出现的地点，使用的领域或者时机，还使人们懂得这种历史如何可以不是绝对的外在偶然性，不是展开本身辩证法的形式的必然性，而是特殊的规律性。因此，也许没有什么比把这种历史的先验的知识设想为可能具备一种历史的形式的先验知识更有意思，然而也是更不准确的了。这种形式的先验的知识是一个博大的、静止的和空白的形态，它可能某一天出现在时间的表层，可能在人类的思维中提倡任何人都无法躲避的专横，然后它又可能一下子隐没，对此，任何事件都不会预示；即所谓先验的消失，闪烁的形式的游戏。形式的先验的知识和历史的先验的知识既不属于同一层次，也不属于同一性质。如果说它们相互交叉，那是因为它们占据着两个不同的维。

陈述的范围是根据历史的先验的知识确定的，是由实证性的不同的类型标志的，并且是由不同的话语形成强调的，它不再具有我在一开始谈到“话语的表层”时赋予它的那种单调的和无限延伸的平静的状态；同样地，它也不再作为无生气的、圆滑的和中性的成分出现，在这些成分中，主题、思想、概念、认识都纷至沓来，每种成分都具有各自的运动，或者由某种模糊的动力所驱使。我们现在碰到的是一个复杂体，其中异质的区域相互区分，不能相互重叠的实践依据特殊的规则展开。我们不但没有在历史的神秘的宏篇巨著中看到一行一行以清晰的字体表示出在以前和在它处所构成的思想，我们在话语实践

的深度中看到一些把陈述当作事件(因为它们具有出现的条件和范围)和看作事物(因为它们包含使用的可能性和范围)的系统。这些都是陈述系统(一部分是事件,一部分是事物),我主张把它们称为档案。

我用这个术语并不是指某种文化所拥有的全部本文,这些本文被看作是这种文化自身历史的文件或是久经考验的同一性的证明;我也不想用它来指在某一既定的社会中,使人们能纪录和保存那些人们愿意记住和任意支配的话语的所有的机制。与其相反,我想指的是几千年以来,由成千上万的人说出的无数的事物不是仅仅按照思维规律或者仅仅由于境遇的作用而出现的,这些说出的事物不仅仅是那些在词语性能层次上能在精神秩序或者事物秩序中展开的东西的符号。而是,它们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各种标志着话语层次的关系所起的全部作用;这不仅不是一些像是被偶然地移植到了静默的过程上的外来形态,它们是根据一些特殊的规律性产生出来的。总之,如果说有被说出的事物存在的话——仅限于它们——,那么,就不应该向那些已经说出的事物或者向那些说出它们的人们,而是应该向话语性的系统,向这个系统掌握的陈述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询问这些事物的直接原因。档案首先是那些可能被说出的东西的规律,是支配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出现的系统。然而,档案也是使所有这些被说出的东西不无限地堆砌在众多无定形性中,也不出现在无间断的直线性中和不消失在外在事件

的单一的偶然性中。而是，它们都聚合在不同的形态中，根据各种关系而构成，它们维持原状，或者根据特殊规则性逐步模糊。档案使它们不会与时间同步倒退，而是使它们发出明亮的光芒，就像看上去离我们很近的星星实际上是从远处向我们走来那样，而其它当代的事物已显得惨淡失色。档案不是那些把陈述的事件保存下来，尽管它是瞬间即逝，和为了未来的回忆保存它的消遁者身份的东西；档案是那些在陈述——事件的根源本身和在它赋予自身的躯体中，从一开始就确定着它的陈述性的系统的东西。档案也不是那些搜集重新变为无生气的陈述的尘埃，和使它们的复活成为可实现奇迹的东西；它是确定着陈述——事物的现时性方式的东西；是它的功能系统。它远不是那些在某一话语的一片杂乱的低语中统一所有已说出事物的那东西，远不只是那些保证我们存在于得以保持的那个话语的环境中的东西，它是在话语多种多样的存在中区分话语和在话语自身的持续中阐明话语的东西。

在确定可能的句子构造系统的语言和被动地收集说出的词语的资料体之间，档案确定着一个特殊的层次，即：某种实践的层次，这种实践使陈述出现多样性，就像同样多的有规则的事件，就像同样多的提供给研究和操作的事物那样。这种多样性没有传统的沉重包袱，而且不构成所有的既无时间也无地点的图书馆；但是它也不是一种讨人喜欢的遗忘，这种遗忘为每一个新的词语提

供它自由活动的场所;在传统和遗忘之间,这种多样性产生出既可使陈述存在,又可使其有规则地发生变化的那种实践的规则。这就是陈述形成和转换的一般系统。

显而易见,我们不能透彻地描述某一个社会、某一种文化或者某一种文明的档案;无疑也不能描述整个时代的档案。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描述我们自己的档案,因为我们是在它的规则的内部谈论的,是它为我们所能够说出的东西——和为它自己,为我们话语的对象——提供它的出现的方式,它的存在和并存的形式,它的并合的、历史性的和消失的系统。从档案的总体性上看,它是不可描述的;就它的现时性来看,它是不可回避的。它通过片断、区域和层次呈现出来,由于时间将我们同它隔开,所以它显得更为明确、清晰。由于资料的稀少性是有限的,所以在编年顺序上作最大程度的后退对于分析档案是必要的。然而,这种档案的描述如何能被验证并阐明使它成为可能的那种东西,识辨它自己说话的地点,检查它的义务和权利,检验和制定它的概念——至少,在这个只有在它被使用的时候才能确定出它的可能性的研究阶段里——如果它只是一味地描述最遥远的边缘的话?难道它不应该尽可能地接近它所服从的实证性和这个使我们今天可以谈及一般档案的档案系统?难道它不应该,哪怕只是拐弯抹角地,阐明它也是其中一部分的陈述的范围吗?因此,文献的分析包含一个特惠的区域:这个区域既接近我们,又区别于我们的现时性,是时间的边缘

围绕着我们的现时，凌驾在我们的现时之上并且在它的相异性中指明它；这是在我们之外限定我们的东西。档案的描述是在刚停止成为我们自己的话语的基础上展开它的可能性(和控制它的可能性)；它存在的界限是由把我们同那些我们不再可能说的东西和将我们同我们话语实践之外的东西隔开的那断裂建立起来的；它始于我们自己语言的外形；它的地点是我们的话语实践的差距，在这意义上，它对我们的判断来说是有价值的，这不是因为它使我们得以描绘我们的明显特征和预先勾勒我们未来的形象。而是，它把我们从我们的连续性中分离出来；它消除这种时间上的同一性，在这种时间上的同一性中，我们喜欢自我观察以避免历史的断裂；它中断先验的目的论的连续过程；正是在人类学思维研究人的存在或者人的主观性的领域里它使它物和外形显露出来。这样理解的判断不是通过区分的手段来证明我们的同一性。它证明我们就是差异性，我们的理性就是话语的差异，我们的历史就是时间的差异，我们的本我就是面具的差异。它证明差异远不是被遗忘的和被覆盖的根源，而是我们自身之扩散和我们所造成的扩散。

档案的这种从未完结的，从未被完整地获得的发现形成了属于话语的形成的描述，实证性的分析，陈述范围测定的总的范围，因此，词的权利——它并不与语义学家的权利吻合——准予所有这些研究以考古学的名称。这个词并不促使人们去寻找起始；也不把分析同挖掘或者

地质探测相联系。它确指一种在已说出的东西存在的层次上探究描述的一般主题,即:实施于它的陈述功能的层次,它隶属的话语的形成层次和档案的一般系统的层次。考古学把话语作为档案成分中特殊的实践进行描述。

第四章

考古学的描述

1 考古学和思想史

我们现在可以将思路颠倒一下，一旦我们浏览了话语和陈述的形成的范围，一旦我们勾画出它们的基本理论，我们就可以顺势而下，涉及应用的可能范围。我们看一看这个我命名为“考古学”(这也许过于严肃)的分析有什么用途。而且，也必须这样做：因为，坦率地讲，从现在看来，事情不免令人相当担忧。我的出发点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即：话语的断裂所依据的重要单位不是作品、作者、书籍或者主题等单位。而现在仅为了确立这些重要的单位，我建立了一整套的概念(话语的形成、实证性、文献)，我划出了领域(陈述，陈述的范围，话语的实践)，我试图揭示一种可能既不是形式化的，也不是解释性的方法的特殊性；总之，我使用的是一整套器具，它的累赘，还有它的古怪的装备令人困惑。其原因有两三点：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描述和分析语言的方法，再增添一种方法，也不至于有不知深浅之嫌。其次，我对诸如“书

籍”或者“作品”等话语单位已产生了疑问，因为我认为这些单位不像它们所表现的那样直接和明显：花很大精力，经过反复的探讨并根据用好几百页纸才能说清的费解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单位同它们对立，这是否有道理呢？所有这些工具最终限定的东西，即这些工具测定其同一性的闻名的“话语”同我凭借经验把它们作为出发点并成为我建立这套奇怪器具的借口的这些形态（所谓“精神病学”或者“政治经济学”，或者“博物学”）是否相同呢？现在我非常有必要估量我曾试图确定的概念的描述的有效性。我必须了解这部机器是否运转正常，以及它能制造什么产品。那么，其他的描述也许无法产生的这个“考古学”可能给予我们什么呢？如此艰巨的工作会有什么结果？

然而，我立即产生了这样一种猜疑。我的所作所为，就好像是发现了一个新的领域，而为了弄清这个领域，我必须使用全新的方法和测定手段。然而事实上，我不正是确实置身于这个尽人皆知的，长期以来一直被冠以“思想史”的空间吗？我难道不是一直在默默的借鉴着它，甚至在我几次三番试图同它疏远时也如此吗？如果说我曾想不把注意力从它身上移开的话，那么我是否在它身上就找不到我所要找的一切已准备好的和已分析过的东西？实质上，我也许只是一个思想史学家。然而，是一个自惭形秽，或者可以说是不自量力的思想史学家。一个要彻底更新他的学说的思想史学家；一个希望赋予他的

学科以其他许多相邻的描述最近获得的这种严密性的思想史学家；无力真正改变这种古老的分析形式，无力使他的学科跨过科学性的界限（也许这样的变化是永远不可能的，也许思想家本人没有能力从事这种变化），只好自欺欺人，声称他一直在做和一直想做与众不同的事。这团新的迷雾是为了掩饰大家仍处于相同的背景之中，被束缚在一个古老的并已被榨尽直至枯竭的土地上。只要我还没有辨识“思想史”，只要我还没有指出考古学的分析在什么方面不同于它的描述，我就没有权利心安理得。

描述像思想史这样的学科的特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的对象不确定，没有明确的界限，使用的方法东拼西凑，步骤上既无正确性，也无固定性。然而，我们似乎可以识别它的两个作用。一方面，它讲述邻近的和边缘的历史。它不讲述科学的历史，而是讲述那些不完整的、不严格的知识的历史，这些知识历经坎坷却从未能够达到科学性的形式（炼金术的历史而不是化学史，动物智能史和颅相学史而不是生理学史，原子主题史而不是物理学史）。讲述这些萦绕文学、艺术、科学、法律、伦理直至人的日常生活等领域中的影子哲学的历史；讲述数百年的主题史，这些主题从未在某种严格的和个体的体系中得到提炼凝聚，但它们却构成了那些不作哲学思考的人们的自发哲学。讲述的不是文学史，而是小道传闻史，街头作品史，由于它消失极快，所以从未取得作品的头衔，或是马上失去了这种头衔：例如，次文学的、年鉴

的、杂志和报刊的、瞬间的成功和不入流作者的分析。思想史被这样确定下来——但是我们马上会看到准确地划定它的界限是多么困难——它针对整个这种隐伏的思想,针对这种在人们中间匿名流行着的表述游戏。在一些话语的重大的建树的间隙中,它揭示出以话语重大建树为基础的脆弱地基。这就是漂移不定的语言,无定形的作品,无关联主题的学科。这是观点、谬误、心理类型,而不是知识、真理、思想形式的分析。

但是,另一方面,思想史的任务是要贯通那些现存的学科,研究和重新阐述它们。那么与其说它构成一个边缘的领域,不如说它构成一种分析的方式,一种透视法。它包揽科学、文学和哲学等历史领域:但是它在这些领域中描述的那些知识是为后来的形式化作经验的未加思考的背景;它试图发现话语记载的直接经验;它关注在固有的或者取得的表述的基础上将产生体系和作品的这种起源。反之,它指出这些建立起来的重要的形态是怎样渐渐地解体,即:主题是如何展开并继续它们孤立的生命,又如何被废弃或又在一种新的方式上重建的。因此,思想史是一门起始和终止的学科,是模糊的连续性和归返的描述,是在历史的线性形式中发展的重建。但是,它也同样可以由此描述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交换和媒介的全部活动,即:它指出科学知识是怎样传播的、怎样产生某些哲学概念的和怎样可能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形成的;它指出问题、概念、主题,怎样可能从它们得以形成的

哲学领域向科学的或者政治的话语转移;它在作品与机置、习惯或者社交活动、技术、需求和无声的实践之间建立联系;它试图在具体背景中,在话语形式从中产生的增长和发展的境遇中,复活话语最完善形式。因此,思想史已成为研究相互影响的学科,成为对同心圆的描述,这些同心圆把作品圈在中央,突出它们,把它们连结起来,并把它们插入所有并非它们的范围中去。

我们清楚地看到思想史的这两种作用是怎样相互连接的。就它的最一般的形式来看,我们可以说它不停地描述着——在这种作用发挥的各方面——从非哲学到哲学,从非科学性到科学,从非文学到作品本身的过渡。思想史是对暗中的诞生、遥远的关联、在表面变化之下滞留的持久性,借助于无数盲目的同谋的缓慢形成的分析,是对这些渐渐地衔接起来又突然凝聚在作品顶端上的全部的形态的分析。起源、连续性、总体化,这就是思想史的重要主题,也正是由于这些主题,它才同某种现在看来是传统的历史分析形式重新连结起来。在这些情况下,每一个对历史,以及它的方法、它的要求和它的可能性还持有这种从此之后有点过时观点的人不可能设想放弃像思想史这样一门学科,或者认为话语分析的任何其他形式都是对历史本身的背叛,这是很正常的。不过,考古学的描述却恰恰是对思想史的摈弃,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有系统的拒绝,它试图创造另外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有些人在这项研究中不承认他们童年的历史,他们为之

痛心并在根本不属于这种历史的时代中召唤过去的巨大的阴影，这恰恰证明他们的耿耿忠心。但是这种保守的热忱却使我坚信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并使我对我想要做的事情更有信心。

在考古学的分析和思想史之间的区分点是很多的。我想马上指出四种在我看来是重大的差异，即：关于新事物的确定；关于矛盾的分析；关于比较的描述；最后是关于转换的测定。我希望能够在这些差异点上抓住考古学分析的特殊性，还希望能够在可能的情况下测量它的描述力。但愿这种作法能够确定某些原则。

一、考古学所要确定的不是思维、描述、形象、主题，萦绕在话语中的暗藏或明露的东西，而是话语本身，即服从于某些规律的实践。它探讨话语，但不是把它们看作为资料，看作为它的符号，看作为那些本该是透明的成分，但却总要穿过这种成分的讨厌的不透明性才能最终在这种被保留下来的不透明性中找到本质的深度；考古学在话语本身的体积中针对作为建树的话语。它不是一门阐述性学科，因为它不寻找隐藏得更巧妙的“另一种话语”。它拒不承认自己是“寓意的”。

二、考古学不试图发现连续的和不知不觉的过渡，这个过渡缓和地把话语同它前面的、周围的和后面的东西联系起来，它不注意话语从它们原来不是的东西变成它们所是的东西的时机；也不关注话语由于松开了它们形态的稳固性而要渐渐地丧失它们的同一性的时机。相

反，考古学的问题是确定话语的特殊性；指出话语所发挥的规则作用在哪些方面对于其他话语是不可缺少的；沿着话语的外部的边缘追踪话语以便更清楚地确定它们。考古学不想缓慢地从观念的模糊领域走向体系的特殊性或科学的最终的稳定性；它不是一部“光荣经”，而是对话语方式作出差异分析。

三、考古学根本没有被排在作品的主宰形态地位上；它不试图捕捉这一形态从无名的地位中脱颖而出的时机，考古学不是要寻找个体和社会相互倒置的奥秘之处，它既不是心理学，也不是社会学，更不是一般所说的创造的人类学。作品对考古学来说不是一个适当的分割，即便是作品被重新移到它的整体的语境或者支撑它的因果性的网络中也罢。考古学确定话语实践的类型和规则，而这些话语实践横贯个体的作品，甚至有时完全支配和控制它们，不让它们漏掉任何东西，但是，有时它却也只支配它们的某一部分。创作主体这层次，作为一部作品的存在的理由和它的一致性的原则，对考古学来说是不相干的。

四、最后，考古学不试图重建人们在说出话语的一瞬间的所思，所愿，所求，所感受，所欲的东西；它并不自己去搜集这个瞬间即逝的核心，在这种核心中，作者和作品互换同一性，在这种核心中思维在尚未蜕变的同一形式中与其本身十分接近，语言在话语的空间和连续的扩散中还未展开。换句话说，它并不设法通过在已说出东西

的同一性本身中重新找回这些东西的方法来重复它们。考古学不会自行消失在阅读的模棱两可的朴实性中，这种阅读让遥远的、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一缕光明从其渊源返回。考古学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仅仅只是一种再创作：就是说在外在性的固有形式中，一种对已写出的东西调节转换。这不是向起源的秘密本身的回归；这是对某一话语——对象的系统描述。

2 独特性与规律性

一般地说，思想史把话语的范围当作一个具有双重价值的领域来研究，我们在这个范围里测定的每一个成分都可被描述为旧的或新的、从未提及的或重复的、传统的或独特的、符合一般类型或者异常类型的。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类表达：一类是增值的，而且数量相对较少，它们是初次出现，并无与它们相似的先前的种类，它们可能成为其他种类的模式，在这一点上，就值得把它们看作是创造。另一类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的、数量众多，对自身不负责的，然而是从已说出的东西中派生出来为了逐字逐句地重复它。思想史赋予这两个表达的种类以各自的地位，而且不用同样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分析。思想史赋予这两类表达中的每一类以某种地位；对它们并不作同样的分析。在描述第一类表达时，思想史叙述发

明、变化、变形的历史，指出真理怎样摆脱谬误，意识怎样从连绵的沉睡中觉醒，新的形式怎样一个又一个地涌现以提供给我们现在这样的背景。这该由历史学家从这些孤立之处、从这些层出不穷的断裂中发现一条演变的连续线。第二类表达却相反，它将历史表现为无生气的和沉重的，是对过去事情的缓慢积累和对已说出的事物的无声的沉淀。陈述在第二类表达中，将依据它们所具有的共同点大量地加以研究。陈述事件的特殊性能被中性化；陈述作者的身份，陈述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也随之失去了重要性。反之，应该得到测定的是陈述的范围，即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陈述相互重复？它们是通过什么途径得以传播的？它们在什么样的群体中流通？它们为人类思维勾勒出怎样的总的远景？它们强加给人类思想以什么样的界限，以及在描述一个时代的特征时，它们怎样能够使它区别于其他的时代？所以说，我们描述的是一系列整体形态。在第一种情况下，思想史描述一连串思维事件，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涉及的是效果的不间断层；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重现真理或形式，而在第二种情况中我们重建被遗忘的相互关系并把话语归结于它们的相对性。

诚然，在这两种类型之间，思想史不断地确定一些关系；我们从未在思想史中发现这两种分析中的哪一种是纯粹的：思想史描述旧与新的冲突，经验的对抗，经验对那些尚未说出的东西施加的压力，经验借以掩饰这些尚

未说出的东西的覆盖物，以及经验有时成功地使这些尚未说出的东西被遗忘。然而，思想史同样也揭示那些在暗地里和从远处准备未来话语的便利条件，描述发现的影响，发现的传播速度和范围，替换的缓慢过程，或者那些搅乱通俗用语的突然冲击，描述新事物介入到经验的已结构化的领域中，独特性在传统性中的逐渐衰退。或者还有已说出的东西的再现和对起源的重新揭示。但是，这种纵横交叉无碍于思想史对旧与新始终作两极分析。这是一种在历史的经验成分中和在它们的每一个时刻对起源进行判断的分析。因此，在每一部作品中，在每一部书里，在最短的本文中，问题是发现断裂点，以尽可能高的准确度建立起一条分界线：在已在东西的内含深度，对已经获得的意见也许并非情愿的忠实，话语的必然性的规律，与创造的活力，同不可缩小的差异的突变之间，建立分界线。这种对独特性的描述，尽管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却提出两个极其困难的方法论问题，即：相似的问题和相继的问题。事实上，这种描述假定人们可以建立某种巨大的独一无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一种表达都根据同质的编年标记来确定日期。但是，倘若我们作进一步的观察，格林[①] 的元音变化规律是否以同一方式和在同一时间线上先于波普[②]（波普引用并使用了元

① 格林(1785—1807年)，德国语言学家，作家。

② 波普(1791—1867年)，德国语言学家。

音变化的规律，对它作了实际应用并对它进行了一些修整)呢？还有科尔杜与昂克梯—杜贝隆(当他们发现希腊语与梵语相近似时)是否先于印——欧语系的定义并走在比较语法的创始者们前头呢？索绪尔[①]是否真的被皮尔士及其符号学，被阿尔诺德与朗斯洛及其符号的古典分析，被斯多葛派及其能指理论，在同样的体系中，和以同样的前后连结关系的方式"占先"了呢？谁先谁后不是必要的和首要的根据，它不可能发挥可以测定每一个话语，并把独特性与重复性相互区分的绝对的衡量作用。仅仅靠对前后关联的测定不足以确定话语的顺序。因为话语的秩序恰恰相反，它从属于人们分析的话语，从属于人们选择的层次，从属于人们确定的范围。按照日期的顺序来排列话语，为话语的每一个成分确定某个日期，这种作法不能分出先后次序和独创性的最终等级，这种等级从来只能与它所要赋予价值的话语的系统相关联。

至于说到两种或几种依次连接的表达之间的相似性，它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和依据什么标准我们可以认定："这个已经说过"；"我们已经在某篇本文中看到过同样的东西"；"这一命题已经非常接近于那个命题"等等？在话语的秩序中，什么是局部同一性或者整体同一性？人们都知道如果两个陈述行为完全一致，如果它们由同样意义的同样的词构成，这并不能把

① 索绪尔(1857—1913年)，瑞士语言学家。

它们绝对同一化，甚至当我们可能在狄德罗和拉马克[①]作品里或者在贝努瓦·德·马耶和达尔文作品里发现演变原则的同样的表述时，我们并不能认为这意味着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惟一的相同的话语事件，并且这个话语事件可能历经年华流逝而服从于某一个重复的体系。从根本上说，同一性不是一种标准，更不用说同一性是局部的，而词也不可能每次都在相同的意义上被使用，或者同样的意义核是通过不同的词被领会的。因此，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在布封，朱西约和居维叶[②]如此不同的话语和词汇中所出现的同一有机论的主题呢？或者反过来说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组织一词在多邦东[③]、勃吕芒巴克[④] 和热弗鲁瓦·圣—伊莱尔[⑤] 作品里包含着同样的意义？一般地说，我们在居维叶和达尔文之间以及在居维叶和林内(或者阿里士多德)之间测定出来的是否是同样类型的相似性？在各种表述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本身的，可直接识别的相似性。因为它们的相似性是我们借以测定它的话语范围的效果。

因此，向我们能研究的本文贸然地提出它们的独特性的资格和询问它们在无前人的情况下是否确实具有高

---

① 拉马克(1744—1827年)，法国博物学家。

② 居维叶(1769—1832年)，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

③ 多邦东(1716—1840年)，法国博物学家。

④ 勃吕芒巴克(1752—1840年)，德国医生，博物学家。

⑤ 热弗鲁瓦·圣—伊莱尔(1772—1844年)，法国博物学家。

明之处，这是不合情理的。这个问题只有在那些被极易准确地确定的体系中，在那些人们已经建立界限和范围的整体中，在那些划定基本同质的话语范围的测定之间才具有意义。[①]因此在已说出的东西的丰富的积累中寻找"预先"就同以后的某一本文相似的本文，在历史中发现超前或回响的作用，上溯到渊源或者下寻最近的痕迹，针对某部作品反复地突出它对传统的忠诚或者它的不可缺少的特殊性，抬高或贬低作品的特殊性的价值，认为保尔—罗瓦雅尔派的语法学家们没有任何发明创造，或者发现在居维叶以前已有比人们想像的更多的先驱者，所有这些，只不过是那些平庸的历史学家们玩弄的讨人喜欢的，然而却是过时的把戏而已。

考古学的描述针对着这些话语实践。如果人们不想用不正规的、天真的，就是说按价值来建立这些话语实践的话，那就应该参考连续的事实。因此，在考古学描述的层次上，独特——平淡之间的对立是不合理的。因为在最初的某种表述与在数年或数个世纪后或多或少准确地重复了这种表达的句子之间，考古学描述不建立任何的价值等级；也不作根本的区分，它只是试图建立陈述的规律性，这里所说的规律性不是不规律性的对立面，因为不规律性在通常的看法中或者在最常见的本文中标志着异

---

① M·冈纪莱姆正是以这种方法提出的其余的命题，这使威利斯至普洛沙斯卡得以为反射下定义。——作者注

常陈述(不正常的、先知的、过时的、天才的或者反常的)的特征。对于任何一种词语性能来说(非凡的,或者平庸的、独一无二的,或者被千百次重复的),规律性确定条件的整体,在这个条件的整体中,陈述功能发挥着保证和确定这种规律性存在的作用。如果对规律性做这样的理解,那么它并不对处于统计曲线的界限之间的某个中心位置作出标志——因此它也不可能具有像频率或者概率指数那样的价值,它标志出出现的实际范围。每一个陈述都是某种规律性的载体,并且不能与之相分离,因此,我们不要把某一陈述的规律性同另一陈述(它可能不易预料,更为特殊,更富有创新)的不规律性对立起来,而是应该把它同标志其他陈述特征的其他的规律性相比较。

考古学不是要寻找发明,而且它对这样的时刻(我希望这是个动人时刻)无动于衷,即某人首次肯定发现了某个真理。考古学不试图重现这些节日黎明的曙光,然而它也不是针对看法的一般现象和所有的人在某一时代所能重复的平淡的东西。它在林内,或者布封、贝梯或者李嘉图,比耐或者毕沙的本文中所寻求的,不是建立那些神圣的创始人的名单;而是揭示某种话语实践的规律性,这种实践是一种以同样的方式在那些神圣创始人所有的最缺少独创性的后继者们作品里或者在他们最缺少独创性的前人作品里所从事的实践,这种实践是一种不仅在他们的作品本身之中阐述最富于独特性的断言(在这以前,

任何人不曾想到过),而且阐述他们前人那里重复,甚至抄袭的断言。从陈述的角度上看,一项发明并不比重复它和传播它的本文更缺乏规律性;规律性在平庸中并不比在异常的形式中缺乏活动性、缺乏有效性和主动性。在这样的描述中,我们不能接受创造性陈述(它们呈现某些新的东西,传播新颖的信息,可以说它们是"主动的")和模仿性陈述(它们接收和重复信息,可以说是"被动的")之间存在性质上的差异的说法。陈述的范围不是一个被丰富的时间分割的无生气的平面的整体,而是一个自始至终活跃的范围。

这种对陈述规律性的分析,可以在好几个方面展开,也许在将来应该作细致的探索研究。

1. 因此说,规律性的某种形式标志着某个陈述整体。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那些可能是新的和可能不是新的东西之间作区分。但是,这些规律性——我们在下文中还会再讲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在图尔尼福尔和达尔文,或者在朗斯洛和索绪尔,贝迪和奎因那里发现的规律性并不是同一种,所以说,我们所面对的是陈述规律性的同质范围(它们标志着某种话语的形成),而这些范围本身又相互有区别。不过,这种向陈述规律性的新范围的过渡并不一定与适合话语的所有其它的层次的变化相伴随。从语法角度看(词汇和句法,或者一般说从语言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词语性能;从

逻辑角度上看(从命题结构的角度,或者从命题所处的演绎系统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的词语性能;但是它们在陈述却是不同的。因此,对价格和流通货币总额之间的数量关系的表达,可以用同样的词完成——或者用同义词——和由同样的推理来完成;在格雷尚[①] 或洛克[②] 作品里,和在19世纪的边际效用论者作品中,这种表达在陈述上是不同的;它不属于同样的对象的形成和观念的形成的系统。因此,我们应该区分语言的相似性(或可译性),逻辑的同一性(或相等性)和陈述的同质性之间的差异,这些同质性正是考古学所要彻底研究的东西。所以说,考古学可以看到一种通过语言上的相似或者逻辑上的相等的词汇表达而产生出来的新的话语实践。(保尔—罗瓦雅尔派语法学家们有时一字不差地重新使用句子表语和动词—系词的陈旧的理论时,便发现了一种考古学应该描述其特殊性的陈述规律性)。反之,如果考古学能够在这里或那里识别某种陈述的规律性,而不顾这种相异性的话(从这一点上看,行为语言的理论,语言起源的研究,和在18世纪所发现的语言的原始根源的建立,与兰斯洛所作的"逻辑"分析相比,不算是"新的东西"),它可能会忽视词语的差别,可能会忽略某些语义场或不同的演绎结构。

---

① 格雷尚(1519—1579年),美国金融家。

② 洛克(1632—1704年),英国哲学家。

因此，我们看到某些脱节和连接的现象出现。我们不能再认为一项发明、一种普遍原则的表达、或者一个方案的确定，在话语史上极大地开创新阶段。我们无需再寻找那个绝对的起源或者完全变动的点，以此为基础一切被组合，一切成为可能和必需，并且一切被取消后重新开始。我们面对的是被放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的不同类型和层次的事件。一个被建立起来的陈述的同质性绝不意味着人们在今后几十年，几百年之中将说和将想同样事情；它也不意味着确定某些清楚或者不清楚的其他一切后果由此而生的原则。陈述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同语言的连续性（和变化），同逻辑的同一性（和差异）相互交错在一起，它们并不步调一致，或互为主从关系。然而在它们之间必定存在着某些关联和相互依赖性，这些关联和相互依赖性的范围无疑是十分复杂的，并且值得我们研究。

2．另一个研究方向是陈述规律性的内在等级。我们已经看到每一个陈述都隶属于某一种规律性——因此，没有一个陈述可以被看作是纯粹的创造，或者是天才的美妙的无序。但是，我们也同样看到任何一个陈述不能被看作是无活力的，和具有某最初陈述的影子或者几乎失实的移印的价值。整个陈述的范围既是有规律性的，又是灵活的：因为它从不疲倦；哪怕是最小的陈述——最不引人注意的或者最平常的陈述——也可以调动起整个的规律机制，而陈述的对象、方式、它所使用的

概念和它所组成的策略也正是依据这些规律形成的。这些规律从不被限定在某一种表达之中，它们穿越各种表达并为表达构成一个并存的空间；因此，我们不可能发现那种为了表达而将表达连接起来的特殊的陈述。然而，某些陈述群却通过它们的最普遍的和最广泛的使用形式使用这些规律的；在这些陈述群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对象、其他的概念、其他的陈述方式或者其他的策略选择是怎样在那些不太普遍的，但其使用范围却是比较特殊的规律基础上构成的。由此，我们可以描绘出一棵陈述的派生树：树的根部，是在它们最广阔的范围中发挥形成规律的那些陈述，在树的顶端，在一些枝杈之后，是那些使同质的规律性发挥作用的陈述，但这种规律性被更巧妙地连接，更准确地确定并限定在它自身的外延中。

这样，考古学便能建造某话语的派生树——这也是考古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以博物史的派生树为例，博物史把下述陈述作为指导性陈述放在树的根部：那些关于确定可观察的结构和可能的对象范围的陈述，那些保留着描述的形式和它可以使用的感觉的规则的陈述，那些揭示特征化的最普遍的可能性和因此打开有待我们建立的整个概念范围的陈述，最后是那些在构成策略选择的同时大量地让位给以后的选择的陈述。而把“发现”（如化石体系的发现）、概念的转换（如种类的新定义）、新概念的出现（如哺乳动物或者有机

体的概念)、技术调整（如集合的构成原则，分类和术语分类的方法）置于树枝的顶端。或者至少把它们放在整个树丛之中。这棵以指导性陈述为基础的派生树不能同某种建立在一公理基础上的演绎法混淆起来；也不应该同某一普遍观点或者某种哲学核心的萌芽混同起来，因为观点和哲学核心的意义是在经验或者精确的概念化中逐渐发展而来的；最后它更不应该被看作是以某一发现为基础的心理学的起源，因为这种发现我是逐渐发展其成果和发扬其可能性的，既然它不同于所有这些过程，那么它就应该在它自身的自律性中得到描述。同样，我们可以描绘出博物史的考古学派生树，而不必以它的那些不可论证的公理或者它的那些基本主题（如自然的连续性）为起点，也不必以最早的发现或者最初的范围（如在林内的发现之前，有图尔尼福尔的发现，在图尔尼福尔的发现之前又有戎思东的发现）为出发点和主导。考古学的秩序既不是分类的秩序，也不是年代上的连续的秩序。

但是，我们看到可能问题的整个范围出现了。因为这些不同秩序虽然具有特殊性，每种秩序虽然具有自律性，但在它们中间，可能存在着某些关联和依附性。对于某些话语的形成来说，考古学的秩序与分类的秩序之间的区别可能并不很大，正如在其他情况下，它可能遵循年代上的连续性。这些相似性(反过来，我们可以另外找到一些畸变)值得我们进行分析。无论如何，重要的是不要

把这些不同的次序混淆起来，不要在某个最初的“发现”或在某个表达的独特性中寻找我们可以演绎一切和派生一切的原则；不要在某一普遍原则中寻找陈述的规律性，或者个人发明的规律；不要用考古学的派生法去重建时间的秩序或者揭示某种演绎的模式。

没有什么比在话语形成的分析中看到某种总体的分期化的企图更为错误的了。因为从某个时刻起和在某一时间里，所有的人可能都会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尽管表面上有区别，所有人可能会用多形的词汇说同样的事和创造某种可以普遍适用于所有意义的大话语的类型。与此相反，考古学描述陈述的同质性的某个层次，这个层次有着自己的时间分割，但又不抹杀可能在语言中测定出来的其他各种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形式；并且在这个层次上，考古学建立某种次序、某些等级和排斥多次数性的、无定形的和整个一成不变的共时性的全部分析。在这些如此模糊的，被称为“时代”的单位中，考古学以它们的特殊性揭示那些“陈述阶段”，这些阶段在概念的时间上，在理论上，在形式化的层次上和在语言发展的阶段上相互连接而又互不混杂。

3 矛 盾

思想史对它所分析的话语一般讲究一致性。有时，

它是否遇到词的用法的不规则性、某些互不相容的命题，某些彼此不能配合的意义的游戏，以及某些不能加以整体系统化的概念呢？思想史的职责是在比较深的层次上寻找内聚力的原则，这种内聚力的原则组织话语，并使它恢复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法则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规则，是程序的职责，几乎是研究的精神束缚，即不徒劳无益地增加矛盾，不被细微的差异所牵扯，不过分地重视变化、修改、复旧和争论的价值；不假设人类的话语永远是从内部被他们欲望的矛盾、他们所受到的影响，或者他们所处的生活条件损坏的；而是承认，如果他们说话或者他们彼此之间进行对话，无疑是为了克服这些矛盾和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然而，这种一致性同样也是研究的结果：因为它确定完成分析的终极统一性，它发现某个本文内部结构、某部个体作品的展开形式，或者不同话语之间相会合点。为了重建这种一致性，人们不得不假定它的存在，并且只有相当久远地跟踪它之后，才能肯定找到了它。这种一致性犹似最佳方案，即以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大数量的矛盾。

不过，所采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被找到的一致性可能会极不相同。我们可以在分析命题的真实性和对连接命题的关系作分析时，确定符合逻辑的不矛盾的范围：于是，我们将发现某种系统的分类；我们将从句子的可见的形体追溯到被语法的模棱两可，词意的超载掩盖的这种纯净的理想结构，这，正如同它们将这种结构

表现出来那样。然而我们也完全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在跟踪相似性和象征的线索的同时，发现某个更富于想像而较少话语，更富有感情而较少理性，更接近欲望而远离概念的主题。这种主题的力量使那些最对立的形态活跃起来，但随即便使它们融在一个可以缓慢地转换的单位中。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可塑的连续性，是某种意义在表达、形象和多种多样的隐喻中形成的过程。这些一致性无论是主题的还是系统的，可能是明显的或不明显的，因为我们可以在表达层次中寻找它们，这种表达的层次在说话的主体身上是有意识的，但说话主体的话语——鉴于某些境遇的原因，或者某种同语言形式本身有关的缺陷——难以体现这些表达。我们还可以在某些结构中找到它们，这些结构对作者的束缚可能要多于作者对它们的构造，并且这些结构在作者不知不觉中强加给他某些假设、操作模式、语言规则、断言和基本信条的整体，形象的类型或者整个幻觉逻辑。最终，它能关系到在某个个体——他的传记或他的特殊话语环境——层次上建立起来的一致性，但是人们同样可以根据更宽松的标准建立这些一致性，并赋予它们以某个时代的、意识的普遍形式的、某一类型社会的、传统整体的、整个文化共有的想像背景的集体和历史的范围。我们在这些形式下发现的一致性永远起着同一种作用，即指出呈现在眼前的矛盾上不过是表层的反射；并指出应该把这种游移的散光嬉戏重新归聚到惟一的渊源。矛盾是某种隐藏着的或

准备隐藏起来的单位的幻觉:它只存在于意识和无意识,思维和本文,理想性和表达偶然性的形体之间的差距中。总之,分析应该尽一切可能消除矛盾。

经过上述分析,仅还有一些残存的矛盾——事故、缺陷、缺点——,或者相反,基本的矛盾突然出现,就好像整个分析在不知不觉中和不由自主地走向这种矛盾上来似的:在体系起源上,不相容的假设起的作用,各种不可调和的影响的交错,欲望的最初的衍射,将社会同自身对立起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冲突,所有这些不是作为应该消除的表面的成分出现,而是最终作为构成原则,作为体现所有次要矛盾和给予它们以牢固基础的基本和秘密的法则出现,总之,是作为所有其他对立的模式。这样的矛盾不但不是话语的外表或者事故,不但不是应该使话语摆脱它的东西以使话语最终解放它的已展现的真实性,它构成话语存在的法则本身:话语产生于矛盾,话语正是为表现和克服矛盾才开始讲话的;话语正是当矛盾不断地通过它再生出来,为了逃避矛盾才继续下去并无限地重新开始;这是因为矛盾永远处于话语之内,因为话语由此而永远不能绕开矛盾,因为话语在变化,在变形、在自动地逃避它的连续性。矛盾作为它的历史性的原则随着话语进展而运转。

因此,思想史承认两个层次的矛盾:一是在话语深刻的统一中得以分解的表面层,一是产生话语本身的基础层。同第一个矛盾层相比,话语是应该从它们偶然的出

场，从它们过分显眼的形体中摆脱出来的理想形态；同第二个矛盾层相比，话语是矛盾可能采用的和人们应该摧毁其表面内聚力的经验形态，以求最终在矛盾的突然介入和它们的暴力中发现这些矛盾。话语是一个矛盾到另一个矛盾的过程：如果说它产生了我们看到的那些矛盾，这是因为它屈从于那个被它隐藏起来的矛盾。分析话语，就是使矛盾消失和又使它们再现；就是指出它们在话语中玩弄的把戏；就是显示话语怎样能够表达这些矛盾，赋予它们以形体，或者给予它们以某种瞬间即逝的外表。

对于考古学分析来说，矛盾既不是要克服的表面现象，也不是应该抽出的秘密的原则。它们是需要描述的对象，我们无需寻找它们可能在哪个方面消失，或者在什么样层次上被强化和从效果变为原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也是我们已经多次列举的例子：林内的物种不变原则在 18 世纪不仅由于甫洛利亚的发现而受严厉地驳斥，而这一发现只不过改变了物种不变原则的使用方式，而且还被一些我们可以在布封、狄德罗、波尔德、马耶和其他许多人那里发现的“进化论”的观点所驳斥。考古学分析不是要指出在这一对立之下，或在某个更基本的层次上，大家曾都接受某些基本论点（自然的连续性和它的整体性，新形式同环境之间的对应关系，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几乎察觉不到的过程）；它也不是要指出这样的对立在博物史的特殊的范围中反映一个更为普遍的冲突，这种冲突（有秩序，一劳永逸地取得的，毫无保留地展开的创造

主题与某一丰富的、富于魔力的、在历史中渐渐展开并且依据时间的巨大推动力打乱一切空间秩序的自然主题之间的冲突)包含着18世纪的全部知识和思想。考古学试图指出,物种不变论和"进化论"这两种理论如何在关于物种和类别的描述中有共同之点:这种描述把器官的可见的结构(它们的形式、大小、数量和它们在空间的位置)作为对象;并且可以以两种方式界限这个对象(在有机体的整体中,或者在它的某些成分中,这些成分的确定有可能根据其重要性,也有可能根据其生物分类);这样,在第二种情况中,我们展示出一张有规律的,有一些确定格子的图表,该表可以说构成了每个可能的创造物的程序(以至现在的、将来的、或者已经消失的物种和类别的次序最终得到确定),而在第一种情况中,我们展开的是一些亲属关系群,它们还处于未确定的和开放的状态,它们相互隔离,并在不确定的数量上容忍着非常接近前存形式的新形式。因此,我们靠在某个对象的范围,它的界限和它的区域划分的两种观点之间分解出矛盾的作法是不能够解决矛盾的,是找不到调和点的。然而我们也不把它转移到一个更基本的层次中去,我们确定矛盾所在的地点,揭示交替的交叉点,确定它的分歧点以及两个话语并列点。结构理论不是一个共用的假设,不是林内和布封所共有的一般信仰的基础,不是一个扎实的和基本的断言,这个断言可能会将进化论和物种不变论的冲突引入次要的争论层次之中;结构理论是矛盾不相容性的原则,是它

们的派生和并存的法则。当考古学分析把矛盾作为描述的对象时，它不试图在矛盾中发现共同的形式或者主题，而是试图确定它们间离的尺度和形式。同把矛盾融于整体形态的半暗的统一中，或者要把矛盾转变为释义或者解说的普遍的、抽象的和一致的原则的思想史相比，考古学描述各种有争议的空间。

因此，考古学拒绝把矛盾当作一种以相同的方式作用于各话语层次普遍功能，而分析将全部取消这种普遍功能或是把它带回到最初的和建设的形式中去。考古学用以替代矛盾的巨大游戏的——矛盾以种种形式呈现，然后被消除，最后又在更大的冲突中重现，并在冲突中达到顶点——是对矛盾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分析。根据这些不同的类型和层次，我们能测定出矛盾和它所具有的各种不同功能。

首先谈谈矛盾的不同类型。有些矛盾仅局限于命题或者论点之中而毫不影响使它们成为可能的陈述体系。因此，在 18 世纪，化石的动物特征的观点与比较传统的化石的矿物属性的观点是相对立的；诚然，人们从这两种观点中可以引出很多的后果，而且这些后果意义深远；但是，我们仍可以指出这些后果产生在同一种话语形成中的同一点上，而且依据陈述功能发挥作用的同样条件；它们是在考古学上派生出来的，并且构成最终的状态的矛盾。与此相反，另一些矛盾却跨越了某种话语形成的界限，并且使那些不属于同样陈述条件的观点相对立。因

此，林内的物种不变论便遭到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批驳，但这只发生在人们消除前者所属的博物史和后者所属的生物学之间差异的情况下，这些是外在的矛盾，它们反映不同的话语形成之间的对立。对考古学描述说来（在此不考虑程序的可能的活动），这种对立构成起始端（le terminus a quo），而那些被派生出来的矛盾构成分析的终极端（le terminus ad quem）。在这两种极端之间，考古学描述描绘出那些我们称为内在矛盾的东西，即那些在话语形成本身中展开的矛盾和产生在形成体系的某一点上的矛盾，这些矛盾导致一些次体系出现：我们仍用18世纪博物史的例子即"方法论"的分析与"系统论"的分析之间的矛盾对立。在此，对立不是终极的，因为它们不是关于同一对象的两个相矛盾的命题，不是同一概念的两种互不相容的运用，它们是两种形成陈述的方式，它们都以某些对象，某些主观性的立场，某些概念和某些策略选择为标志。然而这些体系也不是最初的，因为我们可以指出这两个体系在哪一点上从惟一的、同一种实证性即博物史中派生出来。对考古学分析来说，它们是合理的内在对立。

再来谈谈矛盾的不同层次。考古学上的内在矛盾并非是可以将其看成某种原则或者将其解释为某种效果的纯粹的事实。它是一个散布在话语形成的各个方面的复杂的现象。因此，对于在18世纪整整一段时间中始终对立的系统的博物史和方法的博物史来说，我们可以承认：

对象的某种不相适合性(在某种情况下,人们描述植物的普遍形态;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则描述某些预先确定的可变性;在某种情况下,人们描述植物的总体或者至少植物的最重要的那些部分,而在另外的情况下,人们则鉴于生物学分类的方便描述一些主观任意选择的成分;有时,人们考虑到植物的生长和成熟的不同状态,有时它们又局限于某一最佳可见性的时刻和阶段)。我们可以承认陈述方式的某种分歧(在植物的系统分析的情况下,根据常规范围人们便用某种严格的感觉和语言学的规约;而对于方法的描述来说,这些规约却相对自由,而那些测定的范围也可以变动);我们还可以承认概念的某种不相容性(在"体系"中,属性特征的概念是用来确指类型的一个任意的标记,尽管不是用来骗人的;在方法中,这同一概念却要包含类型的实在意义);最后,我们可以承认对理论选择的排斥性(体系的生物分类法使"物种不变论"成为可能,即使这种理论由在时间中延续的创造并且逐渐地展现图表成分的观点,或者从我们今天眼光来看,由干扰了自然环境的线性秩序的自然灾难观点所纠正,这种体系的生物分类法却排斥转换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被方法所接受,但又不被绝对地包含在内)。

谈谈功能。所有这些对立形式在话语实践中不起同样的作用;它们也不构成要克服的障碍或者构成生长的原则。总之,在它们身上寻找历史进程减慢或者加速的原因是不够的,时间并不是以对立的空洞的和普遍的形

式为出发点浸透到话语的真实性和理想性中去。这些对立永远是被确定的功能时刻，其中一些对立保证着陈述范围的补充发展，即它们打开某些增长的、经验的、验证的、各种推理的序列，它们能使人们确定新的对象，促使新的陈述方式产生，确定新的概念或者改变已有概念的应用范围，而丝毫不改变话语实证性的体系（18世纪的博物学家们掀起的关于矿物与植物之间的界线，关于生命或者自然和化石起源的界限的争论便是这样）；这些附加程序能否成为开放性的或者封闭性的，最终取决于反驳它们的论证或者取决于使它们不受牵连的发现。另一些对立促成话语范围的重新组织，即它们提出一个陈述群在另一个陈述群中的可能的表达问题，提出可能把它们相互连接的吻合点的问题，提出它们介入一个更加广泛的空间的问题（因此，18世纪的博物学家们之间的体系——方法的对立引起了一系列要把这两种方法重写在描述的惟一形式中，和要赋予这种方法以系统的严格性和规律性，以及要促成系统的任意同对方法作具体分析吻合的想法）。它们不是一些新对象、新概念、按线型在旧陈述方法基础上增添的新的陈述方式，而是属于其它层次（更普遍或者更特殊）的对象，是具有另一种结构和另一种使用范围的概念，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陈述而形成的规律没有发生变化。还有一些对立起着某种关键作用，即它们使话语实践的存在和“可接受性”发挥作用；它们确定话语实践的实际的不可能性和它的历史歧点（因

此，在博物史之中，对于有机体的牢固性描述和对于存在的确定条件下通过解剖学变数而发挥作用的功能的描述不再可能，至少作为自律话语形成，构成一部博物史，这部博物史是以种类可见的特征为基础的生物分类科学）。

因此，一个话语的形成不是理想的、连续的和表面平滑的，在矛盾的多样性下移动的，并在协调的思维的宁静的统一中解决矛盾的本文，它也不是一个可能总是隐藏着的，却无处不起主导作用的矛盾，在其中以多种形态呈现出现的表面。它更像是一个多种冲突的空间；一个应当描述其层次和作用的各种对立的整体，因此，考古学分析优先考虑在对同一的、惟一的命题同时作肯定和否定中具备自己的模式的矛盾，然而，这不意味着让所有这些对立在思维的普遍形式中居相同的地位，并生硬地用约束性的先验知识来说明它们，相反地，这意味着在某一确定的话语实践中测定它们的构成点，确定它们采用的形式，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和它们所控制的范围。简而言之，这意味着在话语的众多的凹凸不平的表面上把握话语，从而消除在逻各斯的未加区分的成分中被千篇一律地遗漏和再发现、解决和又产生的矛盾的主题。

4 比较的事实

考古学分析使话语形成个体化，并对它进行描述，这

就是说考古学分析应该在话语形成出现的同时性中对它们进行比较，对它们进行对照，把它同那些日期不同的话语形成区别开来，在它们具有的特殊性中把它们同围绕着它们和作为它们的一般成分的非话语实践联系起来。还是在这一点上，考古学研究与分析某一种理论的内部结构的认识论的描述或者"建筑学"的描述迥然不同。考古学研究总是多方面的：这种研究在多种领域里进行，遍及各种间隙和间距，它具有自己的范围，其各种单位相互并列，相互分离，确定着彼此的边界，相互对立并在它们之间勾勒出空白空间。当它涉及话语的某一个别类型时（《疯狂史》一书中的精神病的类型或者《临床医学的起源》一书中的医学类型），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建立它们的编年史界限，也是为了能够在它们出现的同时和在它们的对应关系中描述某个机制的范围，某个事件、实践、政治决策的整体、某种经济程序的连贯。在这些经济程序中出现人口的变动，援助的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失业的各种不同的程度等等。但是，考古学研究同样能够以侧面接近的方式（如在《词与物》一书中所采用的方式）使多种不同的实证性发挥作用，它在某个确定的时期中比较这些实证性的相伴状况，并且把它们同其他的在某个特定时期中替代它们的话语的类型进行对照。

然而，所有这些分析都与我们平时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极不相同。

1. 比较在分析中总是受局限和带区域性的。考古

学并非要显示某些一般形式，而是力图勾勒一些个别的外形。当我们拿普通语法、财产分析和古代博物史进行对照时，我们不是为了汇集可能是 17 和 18 世纪的普遍精神的三种表现——特别具有重大的价值，而至今却被莫名其妙地忽略——不是为了以某一已缩小的模式和某一特别的领域为基础，重建那些曾经在整个古代科学中运用过的合理性的形式；更不是为了说明某个我们曾认为熟悉的文化面目的最不为人所知的侧面。我们不想指出 18 世纪的人普遍对秩序、分类、符号比对历史、变化和因果机械论更感兴趣。问题在于显示一些话语形成的非常确定的整体，在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可以描述的关系。这些关系不越过毗邻的范围，因而我们不能把它们逐步地转让给当代话语的整体，更没有理由把它们转让给我们称之为“古典思想”的东西，因为这些关联被紧紧地固定在被研究的三段式上，而且只在被说明的范围中才具有价值。这种语际的整体也以它的群的形式同话语其他类型发生关系（一方面与表达的分析，符号的一般理论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与数学、代数分析和建立某种 Mathesis[①] 的企图发生关系）。正是这些内在的和外在的关系使博物史、财产分析和普通语法具有一个特殊的整体的特征，并且使我们得以认清它们身上的某种话语际的外形。

---

① 或可译成“数学理论”，但因无把握，未译。

一些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对宇宙论，心理学或者圣经解释学只字不提？倘若运用起拉瓦锡以前的化学或者欧勒的数学，或者维柯[①] 的历史，难道就不会使《词与物》一书中所有的分析变得一文不值？难道说在18世纪的有创造性财富中就不存在不进入考古学刻板的范畴的其他思想了吗？"对于他们，对于他们那种情有可原的冲动心情，对于他们会提出的所有的反证，我很清楚，我的回答是：一点不错。我不仅承认我的分析有局限性；而且我是有意并执意这样做的。对我来说可能是反证的东西，也许恰恰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你所描述的关于三种特殊形成的所有这些关系，所有这些赋予的、连接的、确指的和派生的理论在其中相互关联的网络，建立在不连续的特征化和秩序的延续性基础上的整个的生物分类学，人们毫不例外地并以同样方式在几何学，理性力学，性情和胚胎生理学，神圣史的批评和新生结晶学中找到它们，这可能恰恰证明我本来并不会描述实证性际区域，正如我所宣称的那样，我本来会描述某一时代的思想或者科学的特征——这正是我的整个研究所围绕的主题，我所描述的这些关系对于确定某种特殊外形是有价值的；这不是一些从整体上来描述某一文化面目的符号，

---

① 拉瓦锡(1743—1794年)，法国化学家。
欧勒(1707—1783年)，瑞士数学家。
维柯(1668—1744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

韦尔当斯荣格的朋友们一定会失望，我一定要使我所作的描述同他们的描述不是同一类型。在他们作品里，那些可能是缺陷的、被遗忘的、谬误的东西，对我来说则是坚决地、有条不紊地排除了。

然而人们也许会这样说：你将普通语法同博物史和财产分析进行对照，那么，你为什么不把它同一时代的历史，同圣经批评、修辞学、美术理论进行对照呢？你本来不是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实证性际的领域吗？那么，你为什么优先你所描述的那个领域？优先？根本谈不上，它只不过是可以描述的整体中的一种，如果人们真的重新命名用普通语法，或者试图确定它同历史学科和本文批评关系的话，人们一定会看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关系系统出现；描述会使这样一种话语际的网络呈现，这种网络不与它以前的网络重迭，而是与它在某些点上交叉。同样，博物学家们的生物分类也可能不同语法和经济相比较，而是同生理学和病理学相比较：在这里，出现了一些新的实证性际（请比较一下在《词与物》中作过分析的生物分类——语法——经济的关系和在《临床的起源》一书中研究过的生物分类——病理学的关系）。因此，这些网络不是预先确定数量的，惟有经过分析才能指出它们是否存在，和有哪些网络存在（就是说，哪些网络是可以被描述的）。再者，每一个话语形成不仅属于（不管怎样，并不必然属于）上述系统中的哪一个，而是同时进入到好几个关系的范围中，在这些范围中，它不占据同样的位置

和发挥同样的功能(生物分类——病理学的关系与生物分类——语法的关系不是同构的;语法——财产分析的关系同语法——解释学的关系也不是同构的)。

因此,考古学所涉及的范围不构成一门科学,一种合理性,一种精神状况,一种文化;而是实证性际的交错,这种实证性际的界限和交叉点不可能被一下子确定。考古学是一项比较分析,它不是用来缩减话语的多样性和勾画那个将话语总体化的一致性,它的目的是将它们的多样性分配在不同的形态中。考古学的比较不具有一致性的效果,而具有增多的效果。

2. 在对照 17 和 18 世纪的普通语法、博物史和财产分析时,人们可能会问在那个时代里,什么是语言学家、博物学家和经济理论家们所具有的共同的观念;人们可能问,尽管他们的论证多种多样,他们共同设定的“默认”的公设又是什么呢?什么是他们可能默默地遵循的一般原则;人们可能问语言的分析给生物分类带来了什么影响或者一个有条理的自然的思想在财产理论中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人们可能同样会研究话语这些不同类型的各自的传播,每一种类型的得到公认的威信,各种类型因其悠久(或者反之,因其新近出现)和因其最高度的严谨性而具有的价值,信息借以完成交换的传递渠道和途径;最后,当人们在把完全传统的分析汇合起来时,可能会想卢梭在什么样程度上把他作为植物学家的知识和经验运用到语言分析和语言的起源中去的;杜尔哥将哪些共同的

类别运用到货币的分析和语言及词源理论中；普遍通用的、人造和完善的语言的观点是怎样被像林内或者阿当松那样的分类学家们改动和使用的。诚然，所有这些问题可能是合理的(至少它们其中的一部分是合理的)。然而，上述这些问题都不合乎考古学的层次。

考古学要揭示的，首先是——在各种不同的话语形成的特殊性和间距中——相似性和差异性的作用，正像它们在形成规律的层次上出现的那样。这包含五种互不相同的任务：

a. 指出截然不同的话语成份如何能够在相似的规律上形成(普通语法的概念诸如动词、主语、补语、词根是在与博物史和经济学同样的安排的基础上和在陈述范围——即赋予、连接、确定、派生的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后者却与前者极不相同，完全异质)；指出不同的形成之间的考古学的同构性。

b. 指出在什么样的范围内，这些规律可以或者不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被应用，可以或者不可以在同样的秩序中连接，可以或者不可以根据同样的模式安排在话语的不同类型中(普通语法在本身的秩序中把赋予的理论，连接的理论，确定的理论和派生的理论彼此连接起来；博物史和财产分析则是把前两个理论同后两个理论连接在一起，但是它们各自把这些理论连接在一个相反的秩序中)，即确定每一种形成的考古学模式。

c. 指出完全不同的概念(如价值概念和特殊的特征概念,或者价格和同类特征概念)怎样在它们实证性的体系的分支中占据相似位置的——因此它们具有了一种考古学同位性——尽管这些概念的使用范围,它们的形式化程度,特别是它们历史的起源使它们彼此完全不同。

d. 反过来,指出惟一的同一的概念(可能由惟一同一的词表示)如何可以包含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成分(起源的、进化的概念在普通语法和博物史的实证性系统中既不起相同的作用,也不具有相同的位置和相同的形成);指明考古学间距。

e. 最后指出隶属或者补充的关系怎样从一个实证性到另一个实证性地得以建立起来(这样,同财产分析和物种分析相比,语言的描述在古典时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范围中,它是结构符号的理论,这些结构的符号增加,表示并代表语言自身的表达),即建立考古学的对应关系。

在所有这些描述中,没有任何东西依赖于影响、交换、转让信息和传递的确定。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它们,或者否认它们可能成为某种描述的对象,而更多的是要同它们相比,作适当的后撤,移动研究层次,揭示使它们成为可能的东西,测定某个概念可以对另一个概念进行投射的点,确定导致方式或技术转让的同构性,指出可以进行概括化的毗邻性,对称性或者相似性,简言之,意味着描述那个对媒介和带差异的感受性的范围(即渗透性

和不可渗透性的范围)。这个范围对于交换作用来说是一种历史可能性的条件。一个实证性际的外形不是毗邻的学科群;它不只是一个可观察到的相似现象;也不只是许多话语彼此之间的整体关系;它是这些整体关系传递的规律。我们不能说因为卢梭和同他一起的其他人相继对物种的安排和语言的起源进行了思考,所以在生物分类和语法之间就建立起了一些关系和产生了一些交换;不能说因为继劳埃和贝第之后,杜尔哥想把货币作为符号来研究,所以经济学和语法理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密切起来了,并且它们的历史具有了这些企图的痕迹。而是应该说——至少如果人们想要作考古学描述的话——这三种实证性的各自的安排是这样的情况,以至在作品、作者、个体存在、计划和企图的层次上能够发现这样的交换。

3. 考古学使话语形成与非话语范围(机构、政治事件,经济实践和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显示出来。做这些比较的目的,不是要揭示文化的长期的连续性或者区分出因果机械论。面对陈述事实的整体,考古学不自问什么是推动它的理由(这便是对表达的语境的研究);它也不设法发现那种在陈述事实中表现出来的东西(这是解释学的任务);它试图确定这个整体所隶属的形成规律——而且这些规律标志着这个整体所属的实证性——怎样能同非话语系统联系起来,即考古学力图确定连续的特殊形式。

以临床医学为例：18 世纪末，临床医学的建立与某些政治事件，经济现象和机构变动是同一时代的。在这些事实与医院医学的组织之间，至少从直观上我们很容易猜到某些联系。然而，怎样对它们进行分析呢？象征分析在临床医学的组织中和在曾伴随它的历史过程中，可能同时具有两种表达，这两种表达相互反衬，彼此为象征，互为各自的镜子，而它们的意义是从反射的不确定的作用中汲取，原因是两种表达只表示它们共有的形式而已。因此有机体的稳固性，功能的内聚力，组织的沟通等医学观点——以及放弃疾病分类原则以便于身体互相作用的分析——符合于(为了反映这些观点也为了在这些观点中反映自己)某种政治实践，这种政治实践在还属于封建的意识层下，在某些功能型的关系中，在某些经济的稳固性中，发现某种社会，这种社会的隶属性和相互性应在集体的形式中保证生活的基本相似。相反，因果分析旨在寻找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政治变化或者经济过程得以确定科学家们的意识——他们感兴趣的领域和方向，他们的价值体系，他们感知事物的方式，他们的理性风格；因此，在工业资本主义开始统计其劳动力需求的时代，疾病也就成了全社会性的了。因为保健、医疗、救济贫穷患者，研究病因和病源已成为集体的负担，国家一方面应该承担这种负担，另一方面，还应对其实行监督。由此，身体作为劳动工具而价值上升，人们注意使医学按照其他科学的模式变得合理，努力维持民众身体健康水平，

关注起医疗和保持疗效，以及对长期现象的记录。

考古学的分析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进行的：表达的、反映的和象征的现象对于考古学来说只是寻找形式的相似性或意义的转让所进行的全面阅读的结果。至于因果关系，它们只能被确定在语境的或者情境的以及它们对说话主体的影响的层次上；总之，只有在它们出现在其中的实证性和这些实证性的形成所遵循的规律一旦被确定时，它们才能被定位。标志着话语形成的关系的范围就是一个象征化和效果可以从那里被发现，被限定和被确定之处。如果说考古学使医学话语接近于某些实践的话，这是为了发现那些远不如表达“立即”的但比由说话主体的意识接替了的某种因果的关系更为直接的关系。它要指出的并不是政治实践如何确定了医学话语的意义和形式，而是要指出它是如何以什么名义成为医学话语出现、介入和起作用的条件的一部分。这种关系可以在多种层次上被确定下来，它首先可以被确定在医学对象的分割和界限的层次上：这当然不是因为政治实践自 19 世纪初以来强加给医学一些诸如组织病变或者解剖生理的对应关系等新的对象；而是因为它打开了一个新的测定医学对象的范围（这些范围大都是由在行政管理上根据某些生活和保健标准被划分、监督、测定出来的和依据某些文献和统计纪录的形式被分析出来的广大人口构成的。这些范围也是由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庞大的人民军队以其医学检查的特殊方式构成的，构成这些范围

的还有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根据那个时代的经济需求和社会各阶层的相互地位而确定的医院救护机构)。政治实践同医学话语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同样可以在赋予医生的地位中看到。在医生与住院病人或者他的私人求诊者之间可能具有的机构关系的形式中，在专为医学保留或者允许的教育和传播的方式中，医生不仅成为这种话语享有特权的，而且几乎是惟一的合法使用者。最后，我们还可以在赋予医学话语的功能中或者在要求它所起的作用中抓住这种关系，即在这种时候判断某些个体，采取某些行政决策，提出某种社会的准则，表现——为了"解决"或者掩盖它们——另外一类的冲突，为社会分析和与其相关的实践提供自然类型的模式。因此，问题不在于指出某个既定的社会的政治实践是怎样构成或者改变医学的概念和病理学的理论结构；而是指出医学话语作为针对某一对象范围的实践，掌握在社会地位确定的某些个体手中并要在社会中发挥某些作用，是怎样同外在于它并且本身并非话语性质的实践相关联。

如果说在这种分析中考古学避免涉及表达和反映的主题的话，如果说它拒绝在话语中见到位于它处的事件或者过程的象征性投射的表面的话，这不是为了发现某种人们可以逐点地进行描述的并可以把一种发现同一个事件，或者把一个概念同一个社会结构联系起来的因果连贯性。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考古学避免作这样的

因果分析，如果它要回避由说话主体所作的必要的接替的话，这不是为了保证话语的至上和孤寡的独立性，而是为了发现某种话语实践的存在和作用的范围。换句话说，话语的考古学描述是在通史的范围内展开的；它力图发现机构的，经济过程的以及话语形成可在其基础上相互连接的社会关系的整个范围；考古学描述试图指出话语的自律性和它的特殊性怎么没有赋予它以某种纯理想性的和历史的完全独立性的地位；它所要揭示的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层次，即历史能产生的某些话语确定的类型，这些类型本身具有自己的历史性的类型，并且同各种历史性的整体保持关系。

5 变化与转换

现在，考古学对变化的描述究竟达到什么地步？我们将完全可以对传统的思想史做一切我们想做和能做的理论批评，因为传统的思想史，对其自身来说，至少是把时间衔接和连贯的现象作为基本主题，按照发展的模式分析这些现象，进而描述话语的历史脉络。与其相反，考古学似乎只是为了固定历史才研究历史。一方面，考古学在描述话语形成的同时，忽略可能出现在其中的时间体系；它寻求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因而，各个时代皆有效的普遍规律：因此，它不强加给某个可能是缓慢的和感

觉不到的发展过程以某种共时性的约束性形态。那些从表面上看最稳定的形态瞬间即逝，相反地，无数的不规则性却应运而生，随后又获得最终的地位，未来总是抢先到来，而过去却总是不断地变化，在这样一个自身如此不稳定的"思想的世界"中，考古学难道不正是以静止的思维显示其价值的吗？另一方面，当它求助于编年学时，它似乎只是为了把两个固定点确定在实证性的界限内，即实证性出现的时刻和消失的时刻，就好像持续的时间只是被用来确定这个简陋的时刻表，然而却在分析本身的整个过程中被省略了一样；就好像时间只存在于断裂的空洞的瞬间之中，只存在于突来的形成替代另一个形成的空白和反常的无时间性的缺陷之中一样，作为实证性的共时性，作为替代的瞬间性的时间消失了，而且一种历史描述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了。话语摆脱了变化的规律，而且建立在一种不连续的无时间性之中。话语通过片段而被固定：一些永久性的不牢固的碎片。然而我们将是徒劳的：许多相互连续的永久性和接踵消逝的固定形象的活动既不能构成运动，也不能构成时间或历史。

纵然如此，还是应该仔细观察事物。

一

那么，我们首先观察话语形成的表面共时性。有一件事千真万确，即把规则界限到每一个陈述之中是徒劳的，因此，在每一个陈述中重新使用规则也是徒劳的，因

为它们并非每一次都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从分散在各时代中的陈述或者陈述群中发现具有活动力的这些规则。比如，我们已经看到博物史的各种不同的对象在近一个世纪中——从图尔尼福尔到朱西厄——始终遵循着同一种形成规则；我们已经看到赋予的理论在兰斯洛·孔狄亚克[①]和戴斯杜特·德·塔西[②]的著作中是相同的，也起着相同的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依据考古学的派生性，陈述秩序并不必然地再产生连续的秩序：我们能够在博泽的著作中，找到这样一些陈述，它们在考古学上先于我们在保尔—罗雅尔派的语法中遇到的陈述，所以，在这样的分析中，出现了时间连续的中断——更确切地说是表达的时刻表中断。然而这种作法的确是为了揭示那些标志着话语形成的时间性，并把它连接成系统的关系，系统的错综复杂并不妨碍分析。

a. 考古学确定陈述整体的形成规则。考古学通过它表明事件的连续性怎么能够在它所出现的秩序本身中，变成话语的对象，被记录，被描述，被解释，被确定为概念并提供理论选择的时机。考古学分析话语渗透性的程度和形式：它在一系列连续事件上制定自己的连结原则，它确定事件借以转移到陈述中去的操纵系统。比如，

① 孔狄亚克(1715—1780年)，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② 戴斯杜特·德·塔西(1754—1836年)，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考古学不否认财产分析和17世纪与18世纪初巨大的货币变动之间的关系；它试图指出在这些危机中可以被看作话语的对象的东西，指出财产分析和货币的变动如何从中被概念化，指出在上述过程中相互对立的利益如何能够从中使用它们的策略。再如，考古学认为1832年的霍乱是医学上的一个事件；因为它指出临床的话语如何使用了这样一些规则以至于医学对象的整个领域得以重新组建，以至于人们能够使用一整套纪录和摘录的方法，可以放弃炎症的概念和最终放弃陈旧的发烧的理论问题。考古学不否认新陈述同"外界"事件具有对应关系的可能性。它的任务是指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上述对应关系才能存在于新陈述和"外界"事件之间，和这种对应关系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它的可能性的界限、形式、规则、规律是什么）。考古学不回避话语的这种可动性，正是这种可动性使话语能够依照事件的节奏而变动，考古学试图解救产生话语这种可动性层次——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只叙述事件的连接层次（这种连接对每一个话语形成都是特殊的，而且不具有相同的规律，相同的操纵系统和相同的敏感性，比如它们在财产分析中与在政治经济学中不同，在古老的"体质"医学与在现代流行病学中不同）。

b. 再者，考古学对实证性所确定的所有形成规则并没有同样的概括性：因为有些规则极为特殊，它们派生于其他的规则。这种隶属性只能是等级的，但是它却可能

包含某个时间的媒介。因此，在普通语法中，动词一表语的理论和名词一连接的理论是相互关联的，而且第二种理论派生于第一种理论，但是我们却不能在它们之间确定某种连续的秩序（它与演绎或者修辞的秩序不同，这种秩序为陈述而设）。反之，补语的分析或者词根的研究只有在表语句的分析或者名词的概念被作为表达的分析记号展开后才能产生（或者再产生）。又如，在古典主义时代，生物的连续性原则被包容在以结构特征为依据的物种分类中；而且在这种意义上，它们是同时的；反之，这种分类一经采用，它们的空白和缺欠便能够在某个自然的、土地的和物种的历史的类别中得到解释。换句话说，形成规则的考古学分枝不是一个统一的同时性网络：因为存在着一些在时间上属于中性的关系、分枝和派生，还存在着一些包含确定的时间方向的关系、分枝和派生。因此，考古学采用的模式，不是同时性的纯逻辑上的图表，也不是事件的线性连续，而是试图指出存在于必然连续和不必然连续的关系之间的交叉现象。因此，不能认为一个实证性的系统，就是一个我们只有在强调历时性过程的整体时才能感觉到的共时性形态。考古学远非对连续性无动于衷，而是要测定**派生的时间媒介**。

考古学不是要把那些看上去是连续的东西当作同时的东西来研究，也不试图凝固时间和用某些表现为静止形态的对应关系来替代时间事件的流动。考古学避而不谈的是这个主题：连续性是绝对的，即存在着一种最初的

和不可分割的连贯，话语可能因这种连贯的完整的规律而从之，亦即在话语中只存在着一种形式和一个连续层次的主题。考古学用分析来替代这些主题，这些分析既展示重迭在话语中（而且对形式不应该只简单地理解为节奏或者起因，而应该理解为这些系统本身）的各种各样的连续形式，也展示这些特殊的连续相互联接的方式。与其追溯某一最初的时间过程，并为它建立相应的连续或者同时的事件的年代次序，短暂或者长期过程的年代次序，瞬间即逝和永恒不变现象的年代次序，不如试图指出连续性怎样产生和在什么不同的层次上能够发现不同的连续性。因此，为了建构话语的考古学史，就应该摆脱这样两种已给人留下印象的模式，一是言语的线性模式（在某一方面看至少也是书写的），在这种模式中，所有的事件相互连贯，除去巧遇和重迭的情况；一是意识流动的模式，这种意识流动的出场总是在未来出现时和在过去的保留中自行消逝。不管它们是否成立，话语的形成不具有与意义的流动或者语言的线性相同的历史性模式。话语，至少像考古学所分析的那样，就是说在它的实证性的层次上，不是某种把自己的计划纳入语言的外部形式之中的意识；不是一种语言，也不是讲这种语言的主体。它是一种具有本身的连贯和连续形式的实践。

二

同思想史相比，考古学更多地谈论断裂、缺陷、缺口、

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编写政治经济学史，从传统观念上看，就是寻找一切曾先于李嘉图的观点；一切曾预先表现出他的分析，他的分析方法和主要观念的东西；一切曾使他的发现成为更加可能的东西。编写比较语法史，就是重新发现——远在波普和拉斯科[①]之前——关于语言的前后关系和亲缘关系的预先研究的痕迹；就是确定安格迪勒—杜贝在印—欧语系范围的构成中所占的位置；就是进一步揭示1769年对梵文和拉丁文动词变位所作的第一次比较；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要追溯到哈里斯或者拉姆[②]。考古学的作法却与其相反：它更趋向分解由历史学家的不厌其烦编织起来的所有这些网络；它使差异增多，搅乱沟通的线路，并且竭力使过程变得更加复杂；考古学不试图指出生产的重农分析是为李嘉图的分析作准备；对考古学的分析来说，它不认为科尔杜的理论为波普作了准备的说法是合理的。

这种对不连续性的强调与什么东西相关联呢？老实说，它只是与历史学家们的习惯格格不入。正是他们的这些习惯——即关注连续性、过程、提前、预先的设计——才经常地不能自圆其说。从多邦东到居维叶，从昂安格迪勒到波普，从格拉斯林，杜尔哥或者福尔伯耐到

① 拉斯科(1787—1832年)，丹麦语言学家。

② 哈里斯(1909年—)，美国语言学家。
拉姆(1515—1572年)，法国人文学者、数学家、哲学家。

李嘉图，尽管在年代上相距十分有限，但差别却举不胜举，而且其性质也各不相同：一些差别已经定位，另一些是普遍的；一些差别涉及方法，另一些涉及概念；有时涉及对象的范围，有时却涉及所有语言工具。医学上的例子更令人吃惊：在从 1790 年至 1815 年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医学话语的变化比 17 世纪以来，肯定比中世纪以来，甚至可能比希腊医学以来都要深刻得多，这种变化产生了一些对象（机体的病变、深藏的病灶、组织的变化、有机物间传播的途径和形式，解剖——临床医学的记号和对应关系）；一些观察的、探测病理源的、记录的技术；一种新的感觉划分和几乎全新的描述用语；一些概念和新颖的疾病分类学的分配的规定（一些种类有时经历了百年，有时经历了千年，如发烧或者体质的种类已经不复存在，而一些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便有的疾病——如结核病——都最终被鉴别和确定）。因此，让那些由于忽略而可能从未读过《哲学疾病分类学》和《膜论》这两本书的人们，尽情地说考古学任意制造差异吧。考古学只是力图认真对待这些差别；力图理清这些差别，确定它们怎样分配，怎样相互包容，相互依附和相互隶属，它们属于怎样的不同的种类，简言之，就是要描述这些差别，并在它们之间建立它们的差别的系统。如果说考古学有什么异常的话，这不应指它增加差别这一点，而是指它拒绝减少差异这一点——即以此否定了习惯价值这一点。对于思想史来说，差别，正像它所呈现的那样，是谬误或者是圈套。分

析的洞察力不应为差别所迷惑，而应该试图分解差别，即在差别之下，发现更小的差异，而在这个更小的差异之下，再发现另一个更有限的差异，以此类推，直至找到理想的界限，这个界限可能是完美的连续性的无差异性，反之，考古学把人们习惯当作障碍的东西作为自己描述的对象：因为它不以克服差别为目的，而是要分析差别，准确地说出它们是什么，并对它们加以区分。考古学是怎样作这种区分呢？

1. 考古学不仅不认为话语只是由一系列同质的事件（个体的表述）构成的，而是在话语的深度本身中辨别许多可能的事件层，如陈述本身的特殊的出现层；对象的、陈述类型的、概念的、策略选择的出现层（或者是影响着已经存在的陈述的转换出现的层面），以已经起作用的规则为基础的新的形成规则的派生层但却总是在同一和惟一的实证性之中；最后是第四个层次，即一种话语的形成替代另一种话语的形成的层面（或者仅是某一实证性的出现和消失的替代层面）。这些事件是极少见的，但它们对考古学来说却是最重要的，不管怎么说也只有考古学能把这些事件呈现出来。但是，这些事件并不是考古学描述的独一无二的对象；如果认为这些事件强制性地支配所有其他的事件和它们在能区分出来的不同的层次上引发出相似和同时的断裂，那就想错了。所有在话语深度中产生出来的事件彼此不是垂直关系。诚然，某一

话语形成的出现常常同某些对象的、陈述形式的、概念的和策略的广泛更新有着对应关系(然而这个原则不具有普遍性:普通语法在17世纪建立起来,但没有在语法传统中产生许多明显的变更);但是要确定既定的概念或者突然出现的特殊对象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不应该依据能够适合于某一形成的出现,或者某一新词的出现的种类来描述这样的事件。针对这种事件提出如下的问题是无用的:"谁干的?谁说的话?在什么情况下和在何种语境中?有何种用意?有何种计划?"一种新的实证性的出现不是由一个新的——出人预料的,使人惊讶的,在逻辑上不可预测的,风格是异常的——句子反映出来,这个句子也许会进入某一本文中,可能预示某一新章节的开始或某一新对话者的介入。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类型的事件。

2. 要分析这样的事件,只观察一些变化并把它们立即归结于创造的目的论和美学的模式(连同它的先验性,它的独创性和发明的整个手段),或者把它们归结于意识觉悟的心理学模式(连同先前的模糊状态,它的超前、它的有利环境、它的调整能力),或者把它们归纳于演变的生物学模式都是不够的。应该准确地确定这些变化发生在什么方面,就是说,用转换的分析去替代不作区分地参考变化——它既包含所有事件的一般内容,又包含它们连续的抽象原则。一个实证性的消失和另一个实证性的出现包含着多种转换的类型。从最特殊的转换到最一般

的转换的过程中,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作这样的描述,即一个形成系统的不同成分是怎样相互转换的(譬如:失业率和求职的变化是怎样的? 有关公司和大学的政治决策是什么? 18世纪末救济的新需求和新的可能性是怎样的? ——所有这些因素均进入临床医学的形成的体系中);一个形成体系的具有特征的关系是怎样相互转换的(譬如:在17世纪中叶,感觉范围、语言规则、工具媒介和通过话语而对有生命的东西发生作用的信息等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并因此能确定博物史特有的对象);各个不同形成规则之间的关系是怎样转换的(如生物学怎样改变博物史在特征化理论和时间派生的分析之间建立起来的秩序和依附性)。最后,各种实证性之间的关系怎样彼此转换(语文学、生物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怎样改变语法、博物史和财产分析之间的关系;这三种学科的特有的关系所表现的话语际的外形怎样分解;它们各自与数学和哲学的关系是怎样改变的;其他的话语的形成,特别是名为人文科学的这种实证性际的位置怎样表现)。考古学与其要乞灵于变化的活力(犹似它是自身的原则),与其要寻找变化的因由(犹似它从来就是纯粹的结果),它宁要努力建立由"变化"构成的转换的体系;它试图制订这个空洞和抽象的概念以赋予它以转换的可分析性质。我们知道一些思想家对所有这些古老的隐喻坚信不移,而人们在近一个半世纪中正是通过这些隐喻想像历史(运动、流动、演变),他们在这里只看到历史的

否定和对不连续性草率的肯定，这是因为，事实上，他们不能接受人们清除所有这些外来模式的变化的作法，不能接受人们同时取消变化的普遍规律的至上地位和它的一般结果的地位，以及用各种各样的转换的分析替代它的作法。

3. 我们称一种话语形成替代另一种话语形成并不意味着一个对象、陈述、概念完全新颖的理论选择的整体突然地装备完善、组织良好地出现在某一本文中，这个本文对它作出一劳永逸的安置，而是意味着会产生关系的整体转换，但是这种转换不一定更改所有的成分；也就是说陈述服从于一些新的形成规律，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对象或概念，所有陈述或所有理论选择都消失了。相反，在这些新规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描述和分析连续性的、回归的和重复的现象，因为我们事实上不应该忘记一个形成规律既不是某个对象的确定，和某种陈述类型的特征化，也不是某个概念的形式或内容，而是这些成分的增加和扩散的原则。它们之中的某一种成分——或者几种成分——可能是相同的（即保留着相同的分割、相同的特征、相同的结构），但是它们属于分散的不同的系统并隶属不同的形成规律。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现象：一些成分始终存在于几种不同的实证性之中，它们的形式和内容相同，但是它们的形成却是异质的（因此，货币流通首先成为财产分析的对象，而后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特征的概念首先出现在博物史中，而后出现在生物学

中);一些在某一话语形成中构成、变更、组织起来,最终稳定下来便又出现在另一个话语形成中(因此,反射的概念、这个曾经由冈奎莱姆在从威利斯[①] 到普罗沙斯卡的古典科学中指出过它的形成的概念,后来又被引用到现代生理学之中);一些成分作为最后的派生在某一话语形成中出现得较晚,可它们却在后来的形成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有机物的概念是在18世纪末出现在博物史中的,而且被视为特征化的生物分类的全部研究的成果,但它却成为居维叶时代的生物学中的重要概念;因此,由摩尔卡尼[②] 发现的病灶的概念也成为临床医学中重要概念之一);一些成分在一段时间被弃之不用,被遗忘,甚至被取消之后又重新出现(因此,在生物学家居维叶那里才会出现向林内型的物种不变论的回归;在18世纪才会出现原语言的陈旧学说的活跃)。对于考古学来说,问题不是要否认这些现象,也不是要贬低它们的重要性;而是相反,要衡量它们,并且试图表现它们,即这些跨越时间的持久性或者重复性,这些长期的连贯或者这些曲线怎样能够产生?考古学不把连续看作是表达其余东西的首要和最终的材料;恰恰相反,它认为相同、重复、不间断所提出的问题并不少于断裂提出的问题;对考古学来说,相同和连续不是经过分析之后应该发现的东西;它们出现在

---

① 威利斯(1621—1675年),英国解剖学家,生理学家。

② 摩尔卡尼(1682—1771年),意大利解剖学家。

话语实践的成分中；它们同样服从于实证性的形成规律；它们远不能表现那种基本的、令人放心的惰性，那种人们喜欢用变化与之对照的惰性，它们本身以主动和有规则的方式形成。而且对那些欲指责考古学对不连续性作独特分析的人们，对所有那些患有历史和时间的恐怖症的人们，对那些混淆断裂和不合理性的人们，我的回答是："正是你们用你们使用的方法贬低连续性，你们把它当作支撑物，其余的一切都得参照它；你们把它变成首要的规律，变成每个话语实践的基本重心；你们要人们分析这一惰性范围中的每一个变化，就像人们分析万有引力场中的每一个运动那样。但是，你们只是在使它中性化和以时间的外在界线为限，把它推向起始的被动性时才赋予它们以这种地位。考古学意在颠倒这种安排，或者(因为这不在于将一直赋予连续性的作用赋予不连续性)力图将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彼此对立起来，即指出连续性是怎样根据与扩散同样的条件和同样规则形成的；并指出连续性进入话语实践范围时与差别、发明、新事物或者派生物并无两样。"

4. 实证性的出现与消失，它们所产生的替代的规则不构成到处以同样的方式展开的同质的过程。不要认为断裂是所有话语形成同时服从的普遍的重要的偏移形式。因为，断裂不是一个停滞的，无差异的，可能插入到——哪怕仅仅是一瞬间——两个明显阶段之间的时间，它不是隔离两个时代和从某个缺陷的两个方面开展

两个异质时间的无持续误差。断裂永远是存在于确定的实证性之间的由某些不同的转换说明的不连续性。因此，考古学断裂分析的主旨是在如此之多的变化中建立相似和差异、等级、补充、巧合和差距，简言之，是描述不连续性本身的扩散。

惟一的和同一的断裂在某既定时刻一下子分离所有的话语形成，一下子截断它们并根据相同的规则重构它们——这种观点可能不会被接受。多种转换的同期性不意味着它们在年代上的准确的吻合，因为每一个转换都可以具有特殊的时间“粘滞性”的迹象，博物史、普通语法和财产分析都是建立在相似的方式上，而且三者在17世纪一直并存着；然而财产分析的形成体系却与大量的非话语的（商品流通，用货币的效果控制货币、贸易和制造业的保护系统，货币金属份量的变动）的条件和实践联系在一起；由此造成了某种过程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缓慢发展，（从格拉蒙[1] 到冈蒂庸）而创立了普通语法和博物史的那些转换却只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多。反之，那些同时代的，相似的和相互关联的转换却不参照惟一的模式，这个模式可能多次重现在话语的表层，并可能强加给所有的话语以某种绝对相同的断裂形式。因为，当我们描述产生语文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考古学断裂时，是要指出这三种实证性如何联系起来（通过符号分析和表达理

---

① 格拉蒙（1796—1862年），法国政治家。

论的消失),考古学断裂可能造成怎样的对称效果(总体性和在有生命的物体中存在着的有机适应性的观点;形态的一致性和语言中被调节的演变的观点;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和演变界限的生产形式的观点);但是,这也同样意味着指出什么是这些转换的特殊差别(特别是历史性怎样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进入到这三种实证性之中,而它们与历史的关系又是怎样不尽相同,尽管这三个实证性与历史都有着某种确定的关系)。

总之,在考古学不同的断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且有时甚至存在于极其邻近的和具有许多关系的话语形成之间。所以,对于语言学科和历史分析来说,那个在19世纪初产生了历史比较语法的重大转换比历史话语的变化早了整整半个世纪:以至包括语文学在内的实证性际的系统在19世纪下半叶作了深刻修改,而语文学的实证性却没因此受到牵连。因此,出现某些"砖距现象",我们至少可以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在马克思学说中所见到的像剩余价值和利润率的下降趋势等概念可以在李嘉图学说中已使用的实证性系统的基础上来作描述;不过,这些概念(虽新颖,但其形成规则却不新颖)的出现——在马克思自己的学说中——似同时属于另外一种话语实践的。因为这些概念在话语中根据特殊的规则形成,它们在那里占据着另一种位置,它们不在同一连贯中出现,因为这种新的实证性不是李嘉图的分析的转换,也不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它是一个话语,这个话语的

建立渊源于某些经济概念的派生，但是它反过来又确定着经济学家话语的实施条件，因此，它可以具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批评的价值。

考古学分割断裂的共时性，如同分离变化和事件的抽象统一性一样。时代不是它的基本单位，不是它的范围，也不是它的对象，因为如果说考古学言及时代，它总是涉及特定的话语实践，并视之为它的分析结果，古典主义时代虽然被经常引用在考古学分析中，但它却不是把它的单位和它的空洞的形式强加给所有话语的时间形态；它是人们可以赋予一个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实证性内在的变化，出现又消失的话语形成的交错杂体的名称。同样，断裂对考古学来说不是它分析的基础，不是它从远处指明的界限，它既不能确定这个界限，也不能赋予这个界限某种特殊性：断裂是人们赋予那些涉及某一种或某几种话语形成的一般规则的转换的名称。因此，法国大革命——因为所有的考古学分析至今为止都是以它为中心——不起话语的外部事件的作用。我们应该在所有的话语中寻找这事件划分的结果以求得正确的思想方法。法国大革命所起作用就像一个复杂的，相关联的，可描述的转换整体。这些转换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一定数目的实证性，它们为其他的实证性确定了一些规则亦即我们至今遵循的规则，它们还建立了一些实证性，这些实证性在我们眼前刚刚解体或者正在解体。

6 科学与知识

我们对前面所作的分析已悄然划出了一条界线，而划分的原则却还没有确定，甚至连它的轮廓也不清楚。所有列举的例子无一例外地属于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不用说弄清话语的广阔范围，甚至探测这个范围也还差得很远。为什么忽略了一系列"文学"、"哲学"或者"政治"的本文？难道在这些区域中没有话语的形成和实证性的系统的容身之地吗？为什么在遵循惟一的科学秩序时，数学、物理或者化学却悄悄漏掉呢？为什么要使用如此众多的、模糊的、未定形的和可能注定永远处于科学性的界限之下的学科呢？一句话，考古学同科学的分析有什么关系？

a. 实证性、学科、科学

第一个问题：考古学使用"话语形成"和"实证性"这些有点古怪的术语，它是否仅仅描述一些伪科学（如心理病理学），一些处于史前状况中的科学（如博物史）或者一些完全被意识形态渗透了的科学（如政治经济学）？考古学是不是对永远接近科学的东西的专门分析呢，如果我们把这样的陈述整体称为"学科"的话，即这些借用一些科学模式的结构，以严密性和论证性为目的，并被作为科

学接受、制度化、转让、有时乃至被讲授的陈述整体，我们是不是能够认为考古学描述一些实际上不是科学的学科，而认识论却可能描述那些可以在现有学科的基础上（或者不在它们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考古学不描述学科。这些学科在明显展开时至多可以充当实证性描述的索引；但它们不确定实证性描述的界限：因为它们不规定这种实证性描述最后的分割；它们在分析之后与在分析之前形同两样；我们不能在已构成的学科和话语的形成之间建立某种双一单义的关联。

下面便是这种畸变的一个例子：19 世纪初出现的精神病学科便是《疯狂史》的兴趣所在。这门学科与 18 世纪的医学论文中的"脑病"或者"神经病"等传统章节相比，并无相同的内容，相同的内部结构，相同的医学地位，相同的实践功能和相同的使用方式。不过，在探讨这一新型学科时，我们发现了两种东西：在这个学科出现的时代中，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和在经济中决定了概念、分析和论证的巨大变化的东西，这是存在于住院、进精神病院，社会排斥的条件和程序、法学规则、工业劳动和资产阶级道德的标准之间的各种关系的作用，简言之，这是一个标志着这种话语实践的陈述形成的整体。然而，这个实践不只是表现在某一具有科学性的地位和科学目的的学科中，我们在司法文件中，在文学语言中，在哲学思考中，在政治性的决策中，在日常话题中，在意见中，同样可

发现这一实践在起作用。这个由精神病学科测定其存在话语形成同精神病学科不是同外延的，绝对不是，因为这种话语形成大大地超出精神病学科，并将它团团围住。然而，更有甚者，当我们上溯到 17 和 18 世纪，寻找可能先于精神病学创立的东西时，便可发现根本不存在什么预先的学科，因为被古典主义时代的医生认为是躁狂症、妄想症、忧郁症、神经疾病的东西根本没有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它们充其量不过是发烧、性情变坏或者大脑疾病分析中的一个分支。然而，尽管不存在任何已建立起来的学科，却存在着一个被使用的话语实践，它具有自己的规律性和持久性。诚然，这种话语的实践被局限在医学之中，但它同样被局限在行政规章中，文学或哲学的文章中、决疑论中、理论或义务劳动或者对穷人救济的计划中。因此，在古典主义时代，人们拥有完全可以进行描述的话语形成和实证性。没有任何一种人们能够用来同精神病学进行对比的确定的学科同这种话语形成和实证性相适应。

但是，如果实证性确实不是已有学科的简单对偶物的话，实证性会不会是未来科学的雏形呢？用话语形成这名称，是否指科学对自身过去的回射，科学是否指对其前身和似乎早已勾勒出它们那个东西的投影呢？譬如，人们所描述的像财产分析或者普通语法这些东西，在赋予它们一种也许完全人为的自律性时，它们是否仅是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建立起严谨的语言科学

前的阶段？考古学是不是试图通过逆向运动——它的合理性显然难以证明——将所有异质的和扩散的成分（其合谋性对建立某一科学将是必要的）组成为一个独立的话语实践？

对于这些问题，答案同样应是否定的。那些作为博物史而被分析的东西不会将所有在17和18世纪中可能具有生命科学雏形价值的和可能出现在其合理系谱中的东西全部限制在惟一的形态中。这种被揭示出来的实证性事实上正好表达了涉及生命物体之间的相似和差异，它们的可见结构，它们特殊和相同的特征，它们的可能分类，分隔它们的不连续性和连结它们的过渡的那些陈述。然而它却把与它同时代的和同它一样表现生物学早期形态的分析弃置一旁，如反射运动的分析（它对神经系统的解剖—生理学将是至关重要的），胚胎理论（它似乎比演变和生成问题还要早），动物或者植物生长的诠解（一般地说，它将成为有机生理学的重要问题之一）。更有甚者，博物史——一种与符号理论和秩序科学的设想相联系的生物分类话语——不仅不能出现在未来生物学之前，还依仗其稳固性和自律性排斥统一的生命科学的建立。同样，人们所描述的像普通语法这样的话语形成根本不阐明所有在古典主义时代已阐述的有关语言的东西，在以后的语文学中人们也许会找出这些东西的继承或摈弃，发展或批判，因为话语形成摈弃《圣经》解释的方

法和在维柯或者海德尔[①]的著作中的语言哲学。因此，话语形成不是在对自身尚无意识而悄然成型时期的未来科学。因为事实上，话语形成不同于科学的纵向演化，它不处于隶属目的论的状态中。

那么，是不是应该认为有实证性存在的地方，就没有科学，或者认为，在可以发现实证性的地方，它们总是排斥科学的？是不是应该认为实证性不存在于科学的时间关系中，而是处于某种交替的状况中？从而，认为它们是某种认识论缺陷的肯定形态。但是，同样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提出反例。临床医学肯定不是科学。这不仅因为它形式上不符合标准，并且没有达到人们所期待的像物理学、化学甚至生理学那样的严谨程度；还因为它包含着一个刚刚由凭经验的观察、未经整理的试验和结果、药方、医嘱、机构规章等几乎未组织起来的堆砌。然而，这种非科学并不排斥科学，因为在 19 世纪中，它同已完善地建立起来的诸如生理学，化学或者微生物学等科学之间建立了确定的关系；甚至它还产生出一些话语，如病理解剖学的话语，若对于这种话语冠之以伪科学的称号，这就有点太过分了。

因此，我们既不能将话语形成与科学，与几乎不具有科学性的学科等同起来，也不能把它与那些从远处描绘未来科学雏形的形态以及那些从一开始就排斥科学性的

---

① 海德尔(1744—1803 年)，德国作家。

形式等同起来。那么，在实证性和科学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b.知　识

实证性不标志知识的形式——即使是由历史逐个使其发挥作用的先天和必要的条件或合理性的形式。但是，实证性并不确定时间的某一特定时刻的知识状态，因为它们不总结从这一时刻起被论证的和取得最终成果地位的东西，不总结那些没有经过证实和充分地论证就被接受的东西，或者那些因共同信仰而被接受或者通过想像力取得的东西。分析实证性，是要指出话语实践根据什么规则可形成对象群、陈述整体、概念定义、理论选择体系。这样形成的成分不构成一门具有确定的理想结构的科学；它们的关系体系显然是不够严密的；然而，它们也不是来自经验、传统或者异质的发现和仅由支配它们的主体的同一性联结在一起，堆积而成的知识。它们是一致（或者不一致）的命题得以立足，相对准确的描述得以发挥，验证得以进行和理论得以展开的基础。它们构成诸如知识或幻觉，公认的真理或被揭穿的谬误，最终的成果或被克服的障碍那样起作用的东西的先决条件。我们清楚地知道分析这种先决条件不能够像分析论据，亲身的经验，或者像分析所有出现在想像或感觉中的东西那样，人类在他的历史进程中本应该在合理性的形式中重新研究这些东西，或者个人若想发现其中包含着的或

者隐藏着的理想的意义，应当为自身起见去经历这些东西。这不意味着在从直接知识发展为必然性的变动中的前知识或古老的阶段；这是这样一些成分，这些成分应由话语的实践形成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构成某种科学的话语，这些科学的话语不仅由其形式和严密性所规定，而且还由它所涉及的对象，它所使用的陈述类型，它所掌握的概念和所利用的策略来规定。因此，我们不能把科学归结于那些过去应该经历的或者现在应该经历的东西，以便科学特有的理想性意图得以实现，而是要把它归结于那些过去应该说出的——或者现在应该说出的——东西，以便使一个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符合科学性的试验或者形式标准的话语能存在。

这个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尽管它们并不是必然会产生科学，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知识是在详述的话语实践中可以谈论的东西：这是不同的对象构成的范围，它们将获得或者不能获得科学的地位（19 世纪，精神病学的知识不是我们曾信以为真的东西的总和，而是我们在精神病话语中能够言及的行为、特殊性和偏差的整体）；知识，也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可以占一席之地，以便谈论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临床医学的知识是医学话语的主体可以起到观察、询问、辨读、记录、决定等功能的整体）；知识，还是一个陈述的并列和从属的范围，概念在这个范围中产生、消失、

被使用和转换(在这个层次上,博物史的知识在 18 世纪便不是已说出的东西的总和,而是方式和所在的整体,我们能够依据这些方式和所在把每一个新的陈述纳入已说出的东西中);最后,知识是由话语所提供的使用和适应的可能性确定的(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在古典主义时代不是各种经过答辩的论文的论文,而是它在其他话语中的或者在其他非话语的实践中的连接点的整体)。有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既不是科学的历史雏形,也不是它经历过的部分)是独立于科学的,但是,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

考古学并不贯穿意识—知识—科学这条轴线(这条轴线不能摆脱主观性的指针),它贯穿话语实践—知识—科学这条轴线。所以当思想史在知识的成分中找到自己分析的平衡点时(因此,尽管违背其意愿,它也避不开先验论的问题),考古学则在知识中找到自己分析的平衡点——就是说,在主体必须置于其中并且独立自主的范围里,永远不能以拥有者的姿态自居(或作为先验活动,或作为经验意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懂得应该慎重区分科学范围和考古学领域,因为两者的分割和组织原则根本不同,那些服从于构成规则的命题只属于科学性的范围,那些可能具有相同意义,可能涉及相同事物,可能同这些事物一样真实,但不属于同样分类的断言却可能被排斥在外:《达

朗贝的梦》就物种变化所言可以很好地体现那个时代科学的概念或者假设;它甚至很可能走在未来真理之前,它不隶属博物史的科学性范围,而相反属于博物史的考古学领域,如果说我们至少可以在博物史中发现它使用的形成规则与在林内、布封、多邦东或者约西厄的著作中的形成规律是相同的话。考古学的领域可以像贯穿科学的本文那样,贯穿"文学"的本文或者"哲学"的本文。知识不只是被界限在论证中,它还可以被界限在故事、思考、叙述、行政制度和政治决策中。博物史的考古学领域包括《哲学的复生》或者《特雷阿米德》(*Telliamed*),尽管它们绝大部分不符合那个时代公认的科学标准,而且显然与以后提出的科学标准相差更远。普通语法的考古学领域包括法布尔·奥利凡[①] 的幻想(这些幻想从未获得过科学的地位,而被列入神秘思想之列),不亚于对赋予命题的分析(这种分析得益于事实的阐述而被接受,现在生成语法可以在这种分析中看到它所预示的真理)。

话语实践与科学的产生并不吻合,科学的构思产生于话语实践,而话语实践所形成的知识既不是已有科学的粗糙雏形,也不是它的日常副产品。科学——眼下存在于那些自称具有科学性或者具有科学性资格的话语和那些实际上显示出科学性的确实标准的话语之间的差别并不重要——它出现在话语形成的成分中,并以知识为

---

① 法·奥利凡(1768—1825年),法国诗人,剧作家。

基础。它揭开了两大类问题，即出现在考古学领域中的科学性区域的位置和作用是什么？科学性的区域遵循何种秩序和过程实现其在既定的话语形成中的出现？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目前尚不置可否，因此，我们只有指出我们可能在什么方向中分析它们。

c.知识与意识形态

科学一旦构成，便不重新将它呈现其中的组成话语实践的那些东西归于它的名下和它特有的连贯中；它也不摈弃它四周的知识——以便用这些知识研究谬误、偏见或者想像的史前史。病理解剖学没有使临床医学的实证性归纳到和引回到科学性的标准。知识不是这种将会在完成它的科学中消逝的认识论场地。科学（或者那些可以称为科学的东西，位于知识的某个范围中并发挥作用，这种作用视不同的话语形成而定，并随其变化而变化。在古典主义时代，那些视为精神疾病的医学知识的东西，在精神病的知识中占据极有限的位置，因为它只构成这种知识的外露表层之一，除此之外，尚有其他的表层（法学、决疑论、治安条例等等）；反之，19 世纪的心理病理学分析，虽然也曾是精神疾病的一种科学知识，但它在精神病知识中所起的作用却截然不同而且异常重要（模式作用和决策的审定作用）。同样，科学的话语（或者自称科学的话语）在 17 世纪和 19 世纪的经济知识中的功能相同。在任何一个话语形成中，我们都可以在科学和

知识之间发现某种特殊的关系;而考古学的分析并不是要确定它们之间排斥或摆脱的关系(即寻找那些躲避知识并抗拒科学的东西,那些因与知识毗邻并受到知识影响而受科学牵连的东西),而应该从正面指出科学怎样进入到知识的成分中和发挥作用。

勿庸置疑,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正是在这个作用的范围中建立起来并被确定。科学话语中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意识形态作用之间衔接不发生在它们理想的结构层次上(尽管它们可以从中或明或暗表现出来),不发生在社会中从技术上使用它们的层次上(尽管对它们的技术使用可以在社会中发生作用),也不发生在构成它的主体意识的层次上;它们之间的连结是在科学从知识中显现出来的地方。如果说可以向科学提出意识形态的问题,那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即:科学既不等同于知识,又不抹杀和排斥知识,而是置身于知识中,构造它的某些对象,将它的陈述系统化和确定它的概念和策略;只是在这种过程一方面区分知识,改变知识和重新分配知识,而另一方面又肯定知识,使之发生作用的情况下;只是当科学在话语的规律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因此得以在任何一个话语实践或非话语实践的范围中展开和发挥功能的情况下。简言之,向科学提出的意识形态问题不是科学或多或少自觉地反映出来的位置或者实践的问题;也不是可能使用科学和可能滥用科学的问题,而是它作为话语实践的存在问题和它在其他实践之

中的功能问题。

大体上可以这样说，而且不受任何媒介和任何特殊性限制；政治经济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某种作用，它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它为资产阶级所创立也为其所用，它甚至带有这个阶级起源，乃至它的概念和它的逻辑结构的痕迹；但是，任何一种经济学的认识论结构和它的意识形态功能之间关系的更准确的描述，都将必须通过产生这种经济学的话语形成的分析和它所制订和系统化的那些对象、概念、理论选择的整体分析；而且，我们还应该指出产生这种实证性的话语实践是怎样在其他的可能属于话语范畴，又可能属于政治或者经济的范畴的实践之中发挥其功能的。

它使我们能提出一些命题：

1. 意识形态不排斥科学性。只有极少的像临床话语或者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才如此重视意识形态，因此对它们的陈述整体挑错，指出其矛盾之处，缺乏客观性，这是没有足够理由的。

2. 理论的矛盾、缺陷和缺点完全可以显示出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或者称之谓科学话语的功能），它们可以使我们确定这种功能能够在结构的哪一点上收到效果。但是，这一功能的分析应在实证性和在形成规律与科学性的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层次上进行。

3. 一个话语在进行自我修正、纠正谬误、加速自身形

式化时，并不必然同意识形态脱离关系，而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不随着严密性的增长和差错的消失而减少。

4.研究一门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功能问题以便显露和改变这一功能，并非要揭示那些寓于其中的哲学前提；不是回到使科学成为可能并证实它的基础上来；而是把它作为话语形成重新提出来；不是要研究它的命题的形式矛盾，而是研究它的对象，它的陈述类型，它的概念和它的理论选择的形成体系。这是把它当作其他实践中的一种重新加以研究。

d.各种界限和它们的时间

就某一种话语形成而言，可以描述几种各不相同的出现。话语实践开始个体化和获得自律性的时刻，因此也是陈述形成的惟一和同一系统起作用的时刻，或者还有当这个系统被转换的时刻，我们将这些时刻称为实证性的界限。当陈述的整体在话语形成中被分割，欲使（甚至未能做到）验证和协调的标准发挥作用时，当这个陈述的整体对知识起某种支配作用（模式、批评或者验证的作用）时，我们便可认为话语形成超越了某种认识论化的界限。当这样勾勒出的认识论形态服从于某些形式标准时，当它的陈述不仅符合一些形成的考古学规律，还符合一些命题的建构规律时，我们便可认为这种认识论的形态超越了科学性的界限。最后，当这个科学的话语也能够确定它所必需的公理、它所用的成分、它的合理的命题

结构和它所接受的转换时，当它由此能够在自身的基础上展现它所构成的形式结构时，我们便可认为这个科学的话语超越了形式化的界限。

这些不同界限在时间上的分配、它们的连续、间距、可能的巧合，它们能够用来相互支配或者彼此包蕴的方式，它们轮番建立的条件，构成考古学开发的重要领域之一。事实上，它们的时间既不规律，也不同质。所有的话语形成并非同步并在同时间里超越它们，从而将人类知识的历史划分为不同的年代：在许多实证性已经超越了形式化的界限的年代时，另有许多实证性却还未达到科学性的界限，甚至尚未达到认识论化的界限。还有，每个话语的形成不是像通过生物成熟期的自然阶段那样连续地通过这些不同的界限。在生物成熟期，惟一的变项是潜伏的时间或是间隔的时间。事实上，指的是一些事件，这些事件的扩散不是可演进的：它们的特殊秩序是每一个话语形成的特点之一。下面是这些差别的几个例子。

在某些情况下，实证性的界限比认识论的界限的超越要早得多。因此，心理病理学作为一种自命为科学的话语，在 19 世纪初，被比耐、汉诺斯和埃斯齐罗尔等人将某个远远先于它存在的并早已具有自律性和规律性系统的话语实践认识论化了。但是，也许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这两种界限在时间中混淆，某种实证性的建立同时也是某种认识论形态的呈现。有时，科学性的界限在从一个实证性向另一个实证性的过渡中联系起来；有时，它

们又与这些实证性有别。例如,博物史(以它独有的科学性)向生物学(不仅是生物分类的科学,而且是不同的有机物特殊的对应关系的科学)的过渡若无从一个实证性向另一个实证性的转换就不会在居维叶的时代完成;反之,克洛德·贝尔纳[①] 的实验医学和后来的巴斯德的微生物学都改动了由解剖学和生理病理学获得的科学性的类型,而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临床医学的话语形成并没有被排斥在外。同样地,由进化论者在生物学科中建立起来的新的科学性没有改变在居维叶时代被确定下来的生物学的实证性。在经济学的领域中,这样的脱节现象尤甚。在17世纪,我们之所以能够识别实证性的界限,是因为它几乎与重商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相吻;但是它的认识论化却只是在不久以后伴随着洛克和冈蒂庸,产生在该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初。然而,随着李嘉图的出现,19世纪既标志着一个实证性的新类型,又标志着一个认识论的新形式,而后库尔诺[②] 和热冯又改变它们,同期,马克思又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推出一种全新的话语实践。

由于在科学中,我们只承认真理的线性并合或者理性的直向演化,而不承认在科学中具有自己的层次、自己的界限、自己的各种断裂的话语实践,我们只能够描述惟一的一种历史分割,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不断地复用着

---

① 克洛德·贝尔纳(1817—1878年),法国生理学家。

② 库尔诺(1801—1877年),法国经济学家、数学家、哲学家。

这种分割的模式，而这对于知识的任何形式都如此：这是一种尚未成为科学的东西和最终成为科学的东西之间的分割。脱节现象的整个深度，断裂的整个扩散，它们效果的整个差距和它们相互依赖的作用都被还原为一种必须始终重复的基础的单调动作。

勿庸置疑，只有一种我们不能够区分这些不同的界限也无法描述它们之间的这样一种差距整体的科学，即数学，它是惟一一种一下子超越了实证性的界限、认识论化的界限、科学性的界限和形式化的界限的科学。数学存在的可能性的本身意味着在历史进程中一直保持着扩散状态的东西从一开始就给定了。因为它们最初的实证性构成了一个已形式化的话语实践（尽管还有其他的形式化将在这以后实现）。从而产生了这样的事实，即它们的建立既是如此的神秘（极难进行分析，在绝对起始的形式中又极其狭窄），又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它同时起着起源和基础的作用）；从一位数学家的最初的行为中，我们已看到了一个理想性的，在整个历史中展开的建构，而这个建构之所以被提出来，只是为了得到重复和纯化。数学的起始与其说是作为历史性的原则不如说是作为历史事件被探讨；最后，对所有其他的科学也是如此，人们将对它们的历史起源的描述，对它们的探索和失败的描述，对它们迟缓的突破的描述归结于一种从测量的普通实践中突然出现并且一劳永逸的几何学的超历史模式。但是，把数学话语的建立看作是所有其他科学的产生和变化的原型，我们说有将

历史性的所有特殊形式同质化之嫌，就有将某一话语实践所能越过的所有的不同的界限归之于惟一一种分割的审定之嫌和每时每刻无穷尽地提出起源的判断之嫌。因此，历史—先验分析的权力也许会继续。对于大多数科学话语来说，数学，无疑是它们向形式的严谨和论证性方向努力的模式，但是，对于探讨科学的实际变化的历史学家来说，数学是一个不良先例，一个无论如何不能推广的例子。

e.科学史的不同类型

我们所测定到的多种界限产生了历史分析的各种不同形式。首先是形式化层次上的分析：数学在其自身的形成过程中不断讲述的正是关于它们自己的历史。在某一既定时刻的数学（它们的范围、它们的方法、它们限定的对象、它们使用的语言）从未被抛弃在非科学性的外域之中，但它们始终被重新确定（哪怕仅作为废弃的区域或者暂时毫无结果的区域）在它们所组成的形式结构中；这段经历是作为特殊情况，天然的模式，一种更抽象、更强有力或者更高层次的理论的部分和未归纳全的雏形呈现出来。数学把其真实的历史过程重新记录在邻近的、附属的、从属的渐进形式化的和被掩饰着的概括性的语汇中。对于数学的这个历史来说（数学构成的历史和它讲述的关于它自己的历史），迪奥方特[1] 的代数不是悬空

---

[1] 迪奥方特（约325—410年），希腊数学家。

的经验，它是我们自阿贝尔[①] 和伽罗瓦[②] 以后所了解的代数的一种特殊情况，希腊的穷举法不是一个必须绕行的死胡同，它是积分学的天然模式。每个历史的突变都碰巧有其自己的层次和自己形式的定位。这里就是循环分析所在，这种循环分析只能在已构成的科学内部进行，并且在其形式化的界限被跨越的情况下。

另一种是历史分析，它位于科学性的界限上并探讨它得以在不同的认识论形态的基础上被跨越的方式。譬如，要弄清一种概念——具有隐喻或者想像的内容——是怎样被净化和能获取科学概念的地位和功能的。弄清一个已经测定的和部分被连结起来，但仍被一些即时的实际的使用，或者真实价值的增长所贯穿的区域是怎样能够建立在科学的范围之内。更一般地弄清科学是怎样建立在前科学层次之上并紧贴着这个层次，这个前科学层次为科学作准备，同时又抵制它，弄清楚科学是怎样超越那些障碍和局限。巴什拉和冈奎莱姆已经展示出这种历史的模式。作为循环分析，这种历史无需处于科学之中，无需所有的情节重新置于它构建的总体之中，也无需用今天已属于它的形式语汇来讲述科学的形式化：再说它能这样吗？既然它指出科学从什么东西中解脱出来并且为了达到科学性的界限，它就不得不抛弃自身以外所

① 阿贝尔(1802—1829年)，挪威数学家。

② 伽罗瓦(1811—1832年)，法国数学家。

有东西。鉴于这个事实本身，这种描述以构成的科学为准绳；它所讲述的历史必然会突出真理与谬误，合理与不合理，阻碍与发展，纯净与不纯净，科学与非科学的对立，这就是科学的认识论的历史的所在。

历史分析的第三种类型，即把认识论化的界限作为着眼点由实证性确定的话语形成与不绝对都是科学（甚至永远不可能成为科学）的认识论的形态之间的区分点。在这个层次上，科学性不作为标准，因为，在这个考古学的历史中，我们试图揭示的东西是那些产生某种知识，而这种知识获得科学的资格和作用的情况下的话语实践。在这个层次上研究科学史，并不是描述话语的形成，而又不考虑到认识论的结构；而是要指出科学的建立，可能还有科学向形式化的过渡怎样能够在话语的形成和在它的实证性的变化中找到了它的可能性和它的偶然关联。因此，对于这样的分析，问题在于在描述话语实践的基础上勾划科学史的轮廓，确定科学史根据什么样的规律性和依靠怎样变化才能让位给认识论化的过程，达到科学性的标准和也许达到形式化的界限。在科学史的深度中研究话语实践层次时，我们不想把话语实践带回到一个深远的和起始的层次上，我们不想把它带回到亲身经验的土壤中（回到这块不规则的和支离破碎的，出现在几何学之前的土壤，回到这片穿过所有天文学的框框而闪闪发光的天空）；我们想在实证性、知识、认识论形态和科学之间，揭示差别、关系、间隔、差距、独立性、自律性的整个作

用和它们各自的历史性彼此连接的方式。

在话语实践、实证性、知识与认识论形态和科学的关系中，对话语实践、实证性和知识所作的分析，正是我们为使它同科学史的其他可能的形式区别开来把它称为知识型的东西。人们可能会猜想这种知识型是一些类似世界观，为所有知识所共有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强加于每一种知识以相同的标准和相同的假设，是理性的普遍阶段，是某一时代人们无法摆脱的思维结构，——匿名者写下的一劳永逸的大宪章那样的东西。事实上，知识型是指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是指在每一个话语形成中，向认识论化、科学性、形式化的过渡所处位置和进行这些过渡所依据的方式；指这些能够吻合，能够相互从属或者在时间中拉开距离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够存在于属于邻近的但却不同的话语实践的认识论形态或者科学之间的双边关联。知识型，不是知识的形式，或者合理性的类型，这个贯穿着千差万别的科学的合理性类型，体现着某一主体、某种思想、某一时代的至高单位。它是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性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

因此，知识型的描述呈现许多基本特征，它打开了一个取之不尽的领域，它永远不会是关闭的，它的目的不是重建某一时代中所有知识所遵循的公设的系统，而是要贯穿关系的不定范围。此外，知识型也不是一个在某一

天出现，又可能突然消失的静止的形态。它是由区分、差距、巧合组成的极灵活的整体，它们组建起来又拆散。另外，认识阈作为科学、认识论形态、实证性和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的整体，能使人们掌握在既定的时间内强加给话语的约束性和界限的规则。然而，这种界限不是那种用来对照愚昧与知识，想像与理性，忠于表象与实在的经验，幻想与推理和演绎的那种消极界限；鉴于技术的不足，思维习惯或者传统提出来的界限等因素，知识型不是那些我们在某一时代所能够懂得的东西，它是在话语实践的实证性中使认识论形态和科学成为可能的东西。总之，我们看到知识型的分析不是一种重新研究关键问题的方式，(像被确定的科学那样，它的权力和合理性是什么?)这是一项研究，只有在为了弄清对于这门科学来说什么是被构成时，这项研究才接受科学的论据。在科学话语这个迷宫中，它所揭示的不是话语成为科学的权利，而是它存在的事实。而且，它与所有其他的知识哲学的分界线是它不把这个事实归结于对某个可能在先验的主体中建立事实和权利的原初的馈赠的审定，而是把它归结于历史实践的过程。

f. 其他类型的考古学

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即我们能否设想一种考古学的分析，它揭示某种知识的规律性而又不朝着认识论形态和科学的方向进行分析？知识型的方向是否是惟一能

够通向考古学的方向？这个方向是否应当成为——而且是独一无二地——某种探讨科学史的方式？换言之，至此为止，考古学把自己限制在科学话语的区域中，它是否服从于某种它无法超越的必然性，或者在某个特殊的情况中勾划出一些能够获得另外一种外延的分析形式？

目前，对最终回答这个问题，我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但是，我情愿设想在不同的方向上发展的考古学——当然还必须进行许多论证和探索。以"性"的考古学描述为例。我清楚地看到人们如何将它引向知识型：人们指出在 19 世纪像生物学或者性心理学这些认识论形态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形成的，和科学类型的话语是通过怎样的断裂，随着弗洛伊德的出现而建立起来。然而，我还发现另外一种分析的可能性，即与其研究某既定时期里（在社会的结构中，在集体无意识中，或者在某种伦理态度中寻找它们的规律）人的性行为，与其描述人们对于性看法（人们对它作出的宗教解释是什么？人们对它作出什么样的褒贬，它能够引起什么样的舆论或者道德冲突），倒不如弄清一个完整的话语实践在这些行为中和在这些表达中没有被界限；倒不如弄清除了向科学话语发展的方向性之外，性是不是一个我们能够谈论（或者禁止谈论）的对象整体，一个可能的陈述范围（不管是激情的表达或者法律的规定）；一个概念的整体（它显然会以观念或者主题的基本形式出现）；一种选择的游戏（它能够出现在行为的一致性中或者规定的系统中）。如果说这样的考

古学能够完成它的使命的话，它会指出禁忌、排斥、限制、褒奖、自由对性的违抗，考古学的所有这些言语的或者非言语的表现是怎样与某种确定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它会揭示某种“说话的方式”，诚然，这种说话方式不作为有关性的最新真理，但它却作为我们能够据以描述性的范围之一；我们会指出这种说话的方式是怎样没有被界限在科学话语中，却被界限在禁忌和价值系统中。所以说，这种分析不会朝知识型的方向进行，而是朝着我们能称为“伦理”的东西的方向进行。

但是，下面的例子却是另一个可能的方向。为了分析一幅画，我们能够重建画家潜在的话语；我们能够期望发现画家意图的流露，当然，这些流露并不最终反映在词语中，而是体现在线条、外形和色彩中，我们能够设法弄清被看作是形成他的世界观这种不言明的哲学。我们同样有可能探讨科学，或者至少探讨时代的舆论和力图认识画家所能借鉴它们的东西，考古学分析可能还有另一个目的，即探寻空间、距离、深度、色彩、光线、比例、体积、轮廓在某个特定的时代是否在某种话语实践中被确定、陈述和概念化；探寻这种话语实践产生的知识是否没有被界限在理论和思辨中，在教育的形式和方法中，也没有被界限在手法、技术乃至画家自身的动作中。问题不在于指出绘画是一种表达或者“叙述”的方式，其特殊性在于它不借助于词语。必须指出绘画至少在它的某一范围中是一种在技术和效果中成型的话语实践。综上所述，

绘画不是一种应该记录在空间的物质性中的纯粹的视觉形象，也不是一个需要我们用后来的解释阐述其无声的和无比空洞的意义的赤裸的动作。绘画——独立于科学知识和哲学主题——贯穿着知识的实证性。

我以为对政治知识也能够作同样类型的分析。我们设法看看一个社会，一个团体或者一个阶级的政治行为是否没有贯穿一种确定的和可描述的话语实践。这种实证性显然与那个时代的政治理论，与经济的确定性相适应，因为，它确定那些能够由政治变成陈述对象的东西，确定这种陈述可能采用的形式，确定在这种陈述中使用的概念和策略选择。对这种知识进行分析——这总是可能的——，与其从它能产生知识型方向进行，不如在态度、斗争、冲突、决策和方针的方向上进行。这样，我们便可以揭示这样的政治知识，它既不是实践的间接理论化，也不是理论的运用。由于它是由在其他的实践中展开的话语实践以有规则方式构成，并且在其他实践上连结起来的，所以，它并不是较充分地"体现"某些"客观的论据"或者某些真实实践的一种表达。从一开始，它就出现在各种不同的实践的范围中，在此，它可以同时找到自己的特殊性、功能和自己的依附关系的网络。如果说这样的描述是可能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无需通过个体或者集体意识的审定便可以抓住某种实践和某个政治理论的连结处，无需探寻在怎样的情况下这种意识能够一方面表示无声的条件，另一方面表现出对理论真理的敏感。我们无需提

出觉悟的心理学问题，而要分析某种知识的形成和转换。譬如：问题不在于确定革命意识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经济条件和理论阐释工作在这种意识发生时各自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问题不在于撰写革命者完全的和典范的传记，或者发现他的事业的根基；而是要指出被界限在行为和策略之中，产生社会的理论并造成彼此干涉和相互转换的话语实践和革命知识是怎样形成的。

现在，来回答刚才提出的问题，即考古学是否只针对着科学？它永远只是科学话语的分析吗？现在我们能够得出答案：不是，绝不是！考古学试图描述的不是特殊结构中的科学，而是*知识*迥然不同的领域。此外，如果说考古学针对处于知识与认识论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知识的话，那么，它同样能够从不同方向探讨知识，并且在另一种关系的网络中描述知识。知识型的方向至今是惟一被研究的方向。其原因在于话语的形成由于某种无疑标志着我们文化特征的梯度而在不断地认识论化。只有在探讨科学，科学的历史，奇特单位，它们的扩散和断裂时，实证性的范围才能出现，只有在科学话语的间隙中我们才能掌握话语形成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的最丰富和最开放的领域是“古典主义时代”便不足为奇了，因为许多的实证性认识论化发生在从文艺复兴到 19 世纪这期间。话语形成和知识的科学规律性出现在最难达到的科学性和形式化的层次上也不足为怪了。然而，这里只是着手研究的优先点，对考古学来说，不是必然领域。

第五章
结 束 语

——您在写这部书的整个过程中，曾尽量避免“结构主义”这个字眼，或避免人们通常用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您声称不曾使用结构主义的方式和概念；不曾参考语言学描述的程序；并丝毫不关注形式化。然而，这些差别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您在使用结构分析中可能存在着的实证的东西，使用结构分析能够包含着的严密性和论证的有效性的东西方面遭到了失败？是不是意味着您所试图研究的领域是对结构主义研究的反叛，而这种研究的成就却又不断地从您欲封闭它的模式中摆脱出来？然而，您竟能十分自然地将您在方法上的无能掩饰起来；现在，您把不可逾越的距离作为一种明确规定下来的差别介绍给我们，而这种不可逾越的距离使您现在和将来总是与真正的结构分析分道扬镳。

因为，您没有能够迷惑我们。事实上，在被您弃置一边的方法留下的空白中，您抛出了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看上去与描述语言或者神话、文学作品或者故事的人所

接受的概念毫不相干,您谈到了形成、实证性、知识、话语实践:您引以为荣的正是这一大堆术语,并且时时都在阐明它们的特殊和神奇的功能。但是,如果说您所从事的不是在这些术语必不可少的范围中强调结构主义的某些基本主题的话,——乃至构成结构主义中那些最有争议的公理,最含糊的哲学的基本主题的话,那您有什么必要杜撰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呢?从始至终您就像是通过现代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事经验的和严肃的工作,而是研究两个或三个主题,这些主题更像现代分析方法的外推法,而不是它的必要原则。

因此,您想缩小话语独有的范围,忽视它特殊的不规律性,掩藏它能够包含的创造性和自由性的东西,补偿它在语言中建立的不平衡性,因为您要重新关上这种开放!您尽力模仿语言学的某种形式,使自己摆脱说话主体;您相信人们能够把话语从它的所有人类学的参照中剥离出来,而后,再对它进行研究,好像它从未被任何人提到过一样,好像它从未在特殊的条件中产生过一样,好像它从未被表达贯穿过一样,好像它不针对任何人一样。总之,您对话语使用了一个同时性的原则:你拒绝正视 ,话语也许同语言不同,它基本上是历史的,它不是由可拥有的成分构成,而是由人们不能在话语展开的时间范围以外对它进行分析的真实和连续的事件构成。

——您言之有理,因为我不承认话语的超验性;在描述它的时候,我拒绝用它对照主观性,我没有首先强调它

的历时性特征，似乎它就是话语的普遍形式，但是，所有这一切不是旨在语言范围之外继续使用那些已经在语言中证实的概念和方法。如果说我谈到了话语，这并不是为了指出语言的结构或者语言的过程完整地保存在话语中；而是为了在词语性能的深度中显示分析可能层次的多样性，为了指出除去语言构成的方法（或者除去解释的方法），我们可以建立陈述的，陈述形成的和话语独有的规律性的特殊描述。如果说我曾把对说话的主体的参照束之高阁的话，这并不是为了发现由所有的话语主体以同一种方式使用的构成规律或者形式，不是为了使某时代所有的人所共有的普遍的大话语讲话。恰恰相反，问题在于指出差别何在，人们如何能够在相同的话语实践中谈论不同的对象，如何会有分歧意见，如何会作出矛盾的选择；也是为了指出话语实践在什么方面相互区别；总之，我不想排斥主体的问题，我想界定主体在话语的多样性中所占据的位置和功能。最后，您能够发现我没有否定历史，我暂时不谈变化的一般和空缺的类别，是为了揭示不同层次的转换；我拒绝时间化的千篇一律的模式，是为了描述每一个话语实践的并合、排斥、重新活跃的规律，描述它们独特的派生形式和它们在各种各样的连续性上连接的特殊方式。

因此，我不想对结构主义研究超过它合理的范围。而且，你们不难对我作出公正的评价：我在《词与物》中一次也没有使用过结构主义这个词。但是，如果你们愿意

的话，就让我们到此为止，中止关于“结构主义”的论战。关于结构主义的论战，在研究者们已放弃的一些领域中，已几乎偃旗息鼓了，这场曾经具有活力的争论如今只是由滑稽演员和流浪艺人继续着。

——您想逃避这场论战是枉费心机，您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怪罪的不是结构主义。我们心甘情愿地承认它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当涉及分析语言、神话、民间传说、诗、梦、文学作品，可能还有电影时，结构主义的描述揭示一些没有它就不可能剖析的关系；它使我们能确定循环的成分和它们的对立形式，以及它们的个体化的标准；它还使我们建立构成的规律、相等性和转换的规律。尽管在开始时我们曾表露出迟疑，但是现在我们毫无困难地接受这样的观点：语言、无意识、人的想像力都服从于结构的规律。然而，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是您的所作所为，即人们能够在科学话语的连续性上分析科学话语，而不参照诸如构成活动的东西，不从科学话语的闪烁中去识辨最初的计划或基本目的论的起因，不去发现连接它们和把它们引向我们能够捕捉到它们的地方的深刻连续性，即人们因此能够把握理性的变化和使思想史摆脱主观性约束。让我们来概括这场辩论：我们承认人们能够用成分和构成规律这样的术语从总体上谈论语言——这种它处和过去的语言，即神话的语言，或者是我们的无意识或者我们事业的语言，尽管它有一点陌生，但是我们知识的语言，即我们此时此地使用的语言，这种

使我们能分析许多其他语言的结构话语在它的历史深度中，我们把它看作是不可缺少的。然而，您不要忘记我们正是在这个话语的基础上，在它的缓慢的生成的基础上，在使它成为今天这种状况的模糊变化的基础上，才能够用结构的术语谈论其他的话语。正是它为我们提供了谈论其他话语的可能性和权利。它形成一种盲点，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我们周围的事物以这个盲点为起点，得以安排。当人们分析印—欧传说或者拉辛的悲剧时，就让他们玩弄成分、关系和不连续性这些词汇，我们很乐意。若人们尽一切可能放弃对说话的主体的研究的话，我们也接受。但是我们反对利用这些成功的尝试使分析倒退和退回到使这些尝试为可能的话语的形式并对我们今天谈论的出发点提出质疑。这些不带主观性的分析史拥有自己独特的先验性。

——我觉得，事实上，这就是争论和你们的对抗的焦点(它远远超出了再三重复的结构主义的问题)。请允许我，当然是出于玩笑，向你们讲述我是怎样理解你们刚才发表的宏论，因为正如你们所知，我对于阐释从来没有特殊偏爱。当然，你们会私下说，尽管我们发动了所有的后卫战，但我们今后不得不接受形式化演绎话语，当然，我们应该容忍人们宁可描述哲学的系统结构，也不愿描述心灵的历史，生存的计划；当然，而且无论我们怎样想，我们都应该宽纳这样的分析，这些分析将文学作品不归结于某个个人的亲身经验，而是归结于语言的结构。当然，

我们应该放弃所有那些我们过去曾归结于意识主宰的话语。然而，目前我们竭力想从间接的角度，通过对所有这些分析的分析或者至少通过我们对它们进行的基本的研究，来挽回我们在一多半世纪中所失掉的东西。我们要问这些分析，它们来自何处？贯穿它们的而又不为它们感知的历史终端是什么？怎样的天真导致它们漠视产生它们的条件？它们的基本实证性论被封闭在怎样的形而上学的束缚中。如此一来，无意识正像我们认为和确信的那样，并不是意识不外露的边缘，这一点将最终毫无意义；一部神话不再是一种对世界的看法，一部小说不是亲身经验的外部斜面，而是别的什么，这也将变得毫不重要；因为，我们对建立所有这些新的"真理"的理性十分关注：无论是理性本身，还是它的过去，无论是产生它的东西，还是使它成为我们的理性的东西，都不能逃脱先验的确定。现在，我们正是向它——我们已决心永不放弃它——提出起源、最初的建构、目的论的界限、时间的连续性等问题。我们正是要把这种我们今天所接纳的思想保留在历史—先验的范围中。所以，如果说我们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接受所有这些结构主义的话，我们将不会同意触动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的思想史，我们将不会同意人们解开自19世纪以来将思想史同起源和主观性的判断连结起来的所有这些先验的线索。对于那些接近我们栖身躲难而且想牢牢地守住堡垒的人，我们要以制止亵渎的姿态重申：切勿轻举妄动。

不过，我还是锲而不舍。这并不是因为我胜券在握，或者坚信我手中利器。而是因为我以为此刻重要的是：使思想史摆脱其先验的束缚。对我来说，问题绝对不在于将在语言范围中已经验证的各门类运用到知识的变化或科学的起源上，以此来使思想史结构主义化。问题是要在没有一种目的论能预先限制的不连续性中分析思想史；在没有一个预先的范围能封闭的扩散中测定思想史；要让思想史在无名之中展开，任何一个先验的结构都不能强加给它以主体的形式；要思想史向不预示任何黎明归返的时间性中开放。问题在于剥离思想史的一切先验的自我欣赏的成分；必须把它从这个它被封闭在其中的失而复得起源的循环中解脱出来；必须指出，思想史只有在自康德以来理性力学不再具有胡塞尔以后的数学的理想性，自梅洛·庞蒂[①] 以后不再具有被感觉到的世界的意义时才能够具有显现先验时间的功能——不管他们为了发现思想史而作出了多少努力。

此外，我认为尽管关于结构主义的表面争论引起了误会，在实质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我想说我们彼此完全明白各自所要做的事情。你们捍卫一种连续的，既对目的论的成果开放，又对因果性的不确定过程开放的历史的权利，这是十分正常的。但是，这不应该是为了保护它以防某个不承认它的运动、偶然性和内在活力的结构

① 梅洛·庞蒂(1908—1962年)，法国哲学家。

的入侵；的确，你们想保证某种建构意识的权利，因为人们正是对这些问题产生疑问。不过，这种捍卫的举动应该发生在别的地方，而根本不应发生在争论之点上。因为，如果说你们承认经验主义的研究，微不足道的历史研究有怀疑先验范围的权利的话，那么你们就忽略了最基本的东西。由此产生一系列错位。把考古学看作是研究起源、形式的**先验知识**和奠基行为，简言之，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学（对考古学来说，则恰恰相反，它将历史从现象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当它在研究中遭到挫折和当它只发现一系列经验的事实时，对它提出反驳。然后，又将历史学家们旨在指出连续性的真正工作（然而，近几十年来，历史的主题并不是这种工作）同考古学的描述，同它热衷于建立界限、断裂和转换对立起来；以便谴责它对经验性的疏忽。接着，再将它视为一种旨在描述文化的总体性，使最明显的差别同质化和发现约束形式普遍性的一项研究（而考古学的主题是确定话语实践独特的特殊性），然后反对它的差别、变化和变动之说。最后，将它说成把结构主义输入历史范围（虽然它的方法和它的概念无论如何都不会造成混乱），并指出考古学不能够具有像真正的结构分析那样的功能。

这一系列错位和不承认是十分协调而且必然的。它包含着它的间接的利益，即能够暗指所有这些应该容忍的和早就应该对它让步的结构主义的形式，并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去碰尚属于我们的这些领域，就会看到你们会

招致什么危险；你们的方法在别处可能行之有效，可在这里很快就会遇到麻烦了；它们将放过你们想要分析的整个具体内容；你们到头来还得摈弃你们谨慎小心的经验主义；而且你们还会，尽管你们不愿意，陷入到结构的古怪本体论中去。因此，你们要放明智些，留在确属由你们征服的那些地盘上，然而这些地盘我们将装作让给了你们，因为它的界限是由我们自己划定的。”至于主要的利益，当然旨在掩饰我们已长期陷入其中，而且其规模有增无减的危机，这种危机涉及到康德以来的哲学所归属的先验的思考；涉及到起源的主题和我们用来勾勒我们现时差别的那个归返允诺；涉及到安排所有对人类存在问题的研究并使我们能避免实践分析的考古学思考，涉及到所有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涉及到——最后也最为重要——主体的地位。我认为，你们希望通过玩弄起源和系统、同时性和变化、关系和因果、结构和历史的有趣的花招来掩饰这场争论，并希望转移人们的视线。你们敢说你们没有玩弄理论的换位吗？

——假定这场争论确实在您所说之处，假定问题在于捍卫或者攻击先验思维的最后的堡垒，咱们承认今天的讨论大部分涉及您所说的危机，那么，您长篇大论的名目是什么？它来自何处又是从何处取得说话的权利？它如何能够使自己合法化？如果您除去做了有关话语的出现和转换的经验调查以外而没有做别的事情，如果您是描述陈述的整体，认识论化形态，知识的历史形式，您又

如何能够逃脱所有实证主义的天真幼稚呢？您的研究对于起源的问题和必须求助于构成主体又有何价值呢？然而，倘若您欲作彻底的研究的话，倘若您想把您的话语置于我们自己所处的层次的话，那么，您应该十分清楚这种话语将进入我们的领域，它将拓展这个它尽力想从中抽身出去的范围。或者您的话语触及不了我们，或者我们索求您的话语。总之，您应当对我们说明您近十年来坚持不懈地从事研究而又从未考虑详细介绍的话语究竟是什么。一句话，它们是什么，是历史还是哲学？

——我承认这个问题比你们刚才的反驳更让我为难，然而也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我本来还是想暂不谈论它。因为，目前我还不能为我的话语确定一个字眼，远不能确定它说话的出发点，勾划它可能依附的土壤。它是关于话语的话语。但是，它并不想在话语中寻找隐藏着的规律，被掩盖着的、它揭示即可的起源；它也不想依靠自己和在自身的基础上建立普遍理论，而那些话语可能是这一理论的具体模式。问题是要展开一种永远不能被归结到差别的惟一系统中去的扩散，一种与参照系的绝对轴心无关的分散；要进行一种不给任何中心留下特权的离心术。这样一种话语不起如下的作用：消除遗忘，在已说出的东西的最深层，在它们沉默的地方，发现它们生成的时间（不管是它们的经验创造，或产生它们的先验行为）；它并不试图使自己成为起源的追忆或者真理的回想。恰恰相反，它要制造差别，即把差别作为对象来构

建,分析这些差别和确定它们的概念。这种话语为自身而重建中止了的总体化,它不但没有领略所有话语的范围,不但没有在已说出的东西中寻找另一个隐藏着的却又始终如一的话语(所以说,不但没有不停地玩弄寓意和同语反复这类东西),它不断地进行着区分,这种话语是诊断器。如果说哲学是起源的追忆或者回归的话,那么,我所作的一切无论如何不能算作是哲学,同样,如果说思想史旨在重新赋予那些已一半消失的形态以生命的话,那么,我的所作也不算是历史。

——从您刚才说过的话中,至少应该抓住这样一点,即您的考古学不是一门科学。鉴于考古学描述的不确定地位,您便任凭它摆动。当然,还有它想使自己被当作是萌芽状态中某门学科的那些话语中的一种;这就为它们的创造者提供了双重的好处:既不用建立这些话语的明确和严格的科学性,也不用使考古学面向一个将把它从诞生的偶然性中解脱出来的未来的普遍性。还有,它是那些总是把它们的基本任务,它们验证的时间和它们的一致性的最终确定向后推迟,以证明自己并非某物的计划中的一种,此外,它是自 19 世纪以来所宣布的如此众多的建树之一,因为,谁都清楚,在现代理论范围中,人们热衷于发明的,不是那些可论证的体系,而是一些人们揭示它的可能性,描绘它的程序并将它的未来和命运交托于他人的学科。不过,一旦我们勾勒出它们的草图,这些草图便连同它们的作者一起消失。而它们本应该耕耘的

园地便永远地成为不毛之地。

——确实，我从未把考古学当作科学，甚至把它当作某一门未来科学的最初的基础来介绍。我并没有把它当成未来重大建树的计划，我致力于记载我在作具体调查时所做的工作，——哪怕做大量的修改。考古学一词没有丝毫的超前价值；它只是指在分析词语性能中某一条着手研究的线路，即详述某种层次，如陈述和档案的层次；确定和阐释某个范围，如陈述的规律性、实证性；运用诸如形成规律，考古学派生，历史先验知识等概念。但是，几乎在它所有的范围里和在它所有的界限中，我的研究都同科学，同科学类型的分析，或者同符合严密性标准的理论有关，我的研究首先关联到那些正在构成以及在从考古学角度描述的知识中建立自身的标准的一些科学：对于我的研究来说，这同样是科学—对象，正如病理解剖学、语文学、政治经济学、生物学已成为科学—对象那样。我的研究还关系到分析的科学形式。它与这些形式的区别，或反映在层次上，或反映在范围上和方法上，它还依据特征分界线使它们靠近。我的研究工作，在众多说出的事物中，把确定的陈述作为实现词语性能的功能来探索，这项研究没有落入把语言能力作为特权范围来研究的俗套。当这种描述为确定陈述的可接受性而构成一个发生模式时，考古学却试图建立形成规律以确定实现这些规律的条件。由此，在这两种分析方式中，可以找出一些相似点，还可以找到一些差别（特别是涉及形式

化可能的层次的东西）；总之，对考古学来说，生成语法具有某种边缘分析的作用。另外，考古学描述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和它们遍及的范围中与其他一些学科相关联。因为，当考古学试图不参照心理的或构成的主观性的情况下确定陈述所能包含的不同的主体的位置时，便与今天由精神分析学提出的问题相交叉；当考古学试图揭示概念的形成规律、陈述的连续、连贯和并存的方式时，便遇到认识论的结构问题；当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形成，研究它们出现和被限定的范围时，同样，当它研究话语的适应条件时，便碰上社会形成的分析问题。这些同样是考古学的对应空间。总之，在可能构成生成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考古学作为各种不同的话语实践特有规律的分析，将会找到被称为包容理论的那东西。

如果说我把考古学置于如此众多的已经构成的其他话语之中，这不是为了通过邻近和接触使它享有它本身无力赋予自己的地位；并不是为了给它在这静止的人类精华中最终地提供一个确定的位置，而是为了通过档案、话语的形成、实证性、陈述、陈述形成条件来展现一个特殊的范围。这个范围还没有成为任何分析的对象（至少在解释和形式化中存在着的特殊的和不可缺少的东西这方面），但是，任何东西都不能预先保证这个范围——在我所处尚属简陋的测定这一点上——将是稳定的和自律的。总之，考古学也许只起某种工具的作用，这种工具能使人们比以前更准确地连接社会形成的分析和认识论的

描述；或者它有助于把主体位置的分析与科学史的理论联系起来；或者它还能使人们把交叉的地点置于生成的一般理论和陈述生成的分析之间。从而，这最终表明考古学，便是给理论领域，即今日的理论领域的某个部分所起的名字。不管这个领域会产生某门可个体化的学科，并且这个学科最初的特征和全部的界限在此可能显现出来，还是它造成成堆的问题，这些问题目前的一致性不妨碍它们今后可能在它处换个花样，在更高的层次中或以不同的方法被重新提出，所有这一切，我目前不能决定。老实讲，也绝对不是由我来做出决定。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我的话语正如把它带到这里的形态那样正在消失之中。

——您离奇地使用了您指责别人使用的这种自由。因为，您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自由空间，而您却拒绝对这个空间作任何的定性。但是，您是否忘记了您为了把其他人的话语封闭在规律的体系中而做出的精心安排？您是否忘记所有这些被您小心翼翼描述的局限性？您是不是已经否认个体有权利以个人名义介入到他们的话语所处的实证性中？您把他们最少的言词同义务联系起来，而这些义务把他们的微乎其微的创新指责为墨守成规。当涉及您个人时，您可以随意变革，倘若涉及他人，却是难上加难。无疑，您最好还是对您说话的条件有一个更清醒的意识，反过来，也要对人类的现实行动和人类的可能性更有信心。

——我担心你们会犯双重错误，即在我试图确定的话语实践方面和你们自己所保留的人类自由方面。我试图建立的实证性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从外部强加于个体思维的或者预先存在于内部的全部规定性；其实，这些实证性构成了全部的条件，实践依据这些条件展开；依据这些条件实践产生部分的或者全新的陈述；实践依据这个条件还可以得到修改。这里指的是实践被连结的范围（无需构成实践的中心），实践使用的规律（实践无需创造和表达这些规律），为实践作支撑的关系（实践无需成为这些关系的最后的结果或者它的汇合点），而不是指为主体主动性划定的界限。问题是要在话语实践的复杂性的深度中显示话语实践：指出说话意味着去做某件事情——除了表达人们所思，表达人们所知之外的其他事情，除了使语言结构发挥作用之外的其他事情；指出将一个陈述增添到一系列先存在的陈述中，是一项复杂而且代价高昂的行动，这个行动包含着条件（不仅是环境、语境、各种动机），还包含着规律（与构成的逻辑和语言学的规律不同）；指出话语秩序中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新思想"，一些发明和创造性和一种不同的精神状况，而是意味着在实践过程中的转换，也许还有在与这个实践相邻的其他实践中和它们共同的连结中的转换，我不曾否认，也不可能否认改变话语的可能性，因为，我从主体的主宰权中取消了话语独有的和瞬间即逝的权利。

最后，在结束前，我想该由我给你们提一个问题：对

于至少在科学秩序中和在话语范围中的变化，姑且称它变革吧，如果你们将它同意义的、计划的，起源的和归返的、构成主体的主题，一句话，同所有确保逻各斯在历史中无所不在的主题相联系起来的话，你们对这种变化有何想法？如果你们根据动力学、生物学、进化论的隐喻来分析变化的话，而在这些学科中，人们通常分解历史变动的疑难和特殊的问题，你们会赋予它何种可能性？更确切地说：如果你们在话语中只看到在事物和思维的界限上瞬间闪烁的微薄的透明，你们给这个话语以怎样的政治地位？两个世纪以来变革话语实践和科学话语的实践在欧洲还没有使你们抛弃这样的看法，即词是风，是外界的低语，是振翅的声响，在历史的严肃性中是难以听到它们的？或者，是否应该这样想像：为拒绝汲取这个教训，你们执意不承认话语实践本身的存在，你们为了反对它而故意保留精神、知识、理性、思想或者舆论史？当人们对你们说到实践、它的条件、它的规律、它的历史转换时，促使你们用意识的术语作答的恐惧心理究竟是什么？促使你们在所有的界限、断裂、震动、划分之外寻找西方先验历史的伟大命运的恐惧心理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这个问题只能有政治的答案。不过今天，我们暂不谈它。可能我们会很快地通过其他的方式重新解答这个问题。

本书的立意只是为了扫除初步的障碍。我同其他人一样，知道我这十年来所谈论的和从事的研究会带来什

么“徒劳无功”的结果——从这词的严格意义上说。我知道在研究话语时不从体现在话语中的和缓的、沉寂的和深刻的意识开始，而从无名目的规律的笼统总体开始，可能遇到的麻烦事情。我知道在人们已习惯在纯净的透明中看到天才和自由的作用充分展开之处，显现实践的界限和必要性会遇到的令人讨厌的事情。我知道，当人们把这个一直由生活的令人宽慰的变化或经历的有意的连续性所推动的话语史，当作是一系列转换来对待时，所遇到的令人恼火的事情。最后，我知道当每个人在说话时，都要或想要把“自己”的东西放进他自己的话语中时所遇到的令人不能接受的事情，在分割、分析、安排、重构所有这些现在又沉默的本文，而作者改观的面目又不表现在其中时，所遇到的令人不能容忍的事情：这是怎么啦！这么多堆积的词汇，用这么大量的篇幅记载这么多的符号，还要供无数人阅读，这是何等的热忱，把这些词保持在连接它们的行为之外，把它们保存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表现出如此虔诚——所有这一切都是为让这只曾经描绘过这些符号的可怜的手，让这种曾试图在它们之中获得平静的忧虑，让这个已经完结，从今后只靠它们得以残喘的生命，不留下任何的痕迹吗？话语，就其最深层的规定性而言，是不是“痕迹”？它的低语是不是没有实体的不朽之所在？是否应承认话语的时间不是专为历史范围而设的意识的时间，或是意识形式中的历史现在时？是否应假设在我的话语中并无我的残生？是否应假设当我说话

时，我不是在避免我的死亡，而是在建立我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否应当在这个对我的生命如此无动于衷，并且如此中性的外表中取消一切内在性呢？以至它在我的生与死之间不造成任何的差别。

我十分理解这些人的苦衷，他们无疑难以承认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经济，他们的社会实践，他们讲的语言，他们祖先的神话，甚至他们童年时所听到的寓言所遵循的并不都是给予他们意识的规律；他们并不希望自己被剥夺这样一种话语，即他们用它能直接地无间距地表达他们所思所考、相信、想像的东西的那种话语。他们宁可否认话语是一个复杂的和有区别的，服从可分析规律和转换的实践，而不愿意被剥夺这种温柔的，并且是如此令人欣慰的信念，即如果不能改变世界，不能改变生命，至少也能通过来自它们自身并始终最接近起源的言语的新意来改变世界和生命的"意义"。许多事情从他们的语言中已悄然溜走，他们不愿再放过他们所讲的东西，这些零星的话语——口头的或者书面的都一样——而这些话语脆弱的和不可靠的存在将把他们的生命延续得更远和更久。他们不能容忍(我们略有所知)别人说："话语不是生命：它的时间不是你们的时间；在话语中你们不会同死亡和解；你们说出的所有的事情很可能使上帝致命，但是，你们别以为能够用你们所说的一切造出一个比话语生命更长久的人。"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知识考古学
作者=（法）米歇尔·福柯[M.Foucault]著
页数=272
SS号=10165456
出版日期=